

晉

仲



第二輯

歷代賢豪



潘公展
印維廉

主編
王毓瑚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歷代名賢
故事集第二輯

管仲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運費)

主編者 潘公展·印維康

編著者 王毓瑚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羊子巖一八號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經售處

中華書局

正中書局

大東書局

開明書局

史學書局

各地分支局

重慶總經理 文信書局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渝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0001-6000

6001-8000



第二輯

歷代賢豪

管仲

王叔師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作者小傳

王毓瑚先生，字連伯，現年三十七歲，河北高陽人。初卒業於舊制中學，已而去德，負笈於波次達米高中；畢業後，復入燕尼黑大學肄業；歲餘赴法，轉入巴黎大學，以遠竟業。先生專攻經濟，而雅嗜史學，治經濟史尤精邃。歸國以後，歷任教職。抗戰軍興，應國立編譯館之聘，參與整理中國經濟史料工作，以迄今茲。已成著作有桑弘羊及劉晏兩傳（載顧頡剛先生主編之「中國名人傳」）。本書敘述管仲因應時勢、創造霸業之始末，及春秋戰國時代霸政制度與變法運動發生之背景經過，極為精到，為歷來傳述法家始祖——管仲生平事功者僅見之力作。現任國立編譯館編審，兼國立復旦大學教授。

勝利出版社編印組謹識 三十四年二月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由懼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冀，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為自尊自信的崇高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為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驚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斃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10
847
35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種，去變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遠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第十一章	從春秋到戰國……	一三一
第十二章	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	一四三
第十三章	法家的學說和著述……	一五九



管仲

王毓瑚編著

第一章 時代背景

距離現在三千年以前，正是殷朝的末年，就在如今陝西省的西部地方，有一個名叫周的部族強盛起來，把殷朝推翻，建立了周朝；部族的首領做了其他一切部族的共主，號稱天王，就是那有名的周武王了。不過周朝的天下，當時還沒有真正把得牢穩，盤據在各地的大小無數的部族都擁有實力，根深蒂固，周族祇算是那些部族當中比較最強大的一個，由其他部族公認為領袖罷了，事實上各個部族仍然保持着獨立狀態，尤其是那新被征服的殷族，人口衆多，歷史悠長，殘餘的勢力仍然很大。以渭河流域為基礎的周族，爲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就採取了一種新的建國策略。這種策略稱做「封建制度」，實在說來，就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殖民。原來那時文化比較最發達的地方是

時代背景

封建制度
侵略性武裝殖民
結果
方式
目的

黃河的中游和下游一帶，可是這一帶的農業，還在很粗疏的階段上。周族卻是一個善於耕種的部族，他們關於農業的知識和技術都比較高明，因此他們就利用這種優勢，來作擴展勢力的資本。周天子憑藉武力為後盾，把自家的子弟和一些功臣封到東方各地，建立起許多個侯國，在廣大的土著部族的勢力範圍內，形成許多個據點，預備從那些據點出發，推展比較進步的農業，憑藉優勢的經營技術去壓倒土著，再進而加以同化；將來各據點的勢力範圍彼此銜接起來，合成一個，就完全是周族的天下了。這種策略推行的結果，很為成功；周族的勢力逐漸滲透到東方各地，隨了各地農業的進展，周王朝的基礎也就越加牢固起來。

封建制度是周朝的建國策略，同時也就是它的政治組織方式。這種制度的本質，原是動的、進取的；在開國的初年，執政者運用這種策略的精神，也是如此。可是等到成功之後，原來的精神逐漸消失，制度的本質，也慢慢由動的、進取的，而化為靜的、呆滯的，再沒有應變的機能。當時天下各地大小無數的侯國，在上面共同擁戴周王，

對他稱臣納貢，可是侯國的君主在自己的國內，則是自作主張，特別是各國都有大小不同的兵力。在這種情勢之下，必須是上面的王朝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然後纔能夠維持和平。一到了王朝的實力虛弱的時候，整個的政治組織就要開始解體，再加上外方敵人的攻擊侵襲，自然更加容易崩潰了。

提起外方的敵人，却要大概說明一下。原來當時的所謂天下，只是限於黃河和長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活動在這個範圍以內的部族，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個派別：一方面是所謂「諸夏之國」，另一方面則是種種野蠻部族。這兩派部族的分別，只是文化上的一種界線；彼此之間，並不一定有明顯的血統或種族上的差異。大體說來，諸夏各國是以農業爲經濟基礎，居住的地方有一定，建築的有城郭；野蠻部族則是些以射獵劫掠爲生的遊牧部落。諸夏之國的文化既然比較高些，因此它們就鄙視那些遊牧部族。事實上那些遊牧部族的語言以及生活習慣，也確是兩樣；他們的居住、飲食、衣服、裝飾、以及禮

節等等，都很特別；頭髮是披散着的，穿袍子只把左臂伸在袖子裏面，居住也沒有固定的地方，大概是住在帳幕裏的；遇到祭祀，就在野外舉行。在作戰的方法和軍隊的編制上，彼此也是不同。諸夏之國作起戰來，是以車爲主，稱爲「車戰」；軍隊的編制也是以車爲單位，每一輛兵車附有幾名甲士，若干名步兵，合起來組成一「乘」。遊牧部族因爲是居住在山地，所以不習慣駕車；他們作戰只用步兵，當然也有騎兵，行動是比較要敏捷的多。還有一點，當時諸夏和那些野蠻部族，是雜居的。大概平原和河谷之類宜於耕稼的地方，都屬於諸夏的勢力範圍；而那些山岳地帶，則是野蠻部族的活動區域。用現在的地名來說，山東東北部沿海和中部的山地，燕山、太行山和山西高原的大部，陝北和隴東高原，中條山、秦嶺和河南西部山地，都是由野蠻部族盤據着。他們分爲許多部落，諸夏的人因而給他們起了種種的名子：山東東北部的叫作萊夷，山東中部山地的叫作戎州己氏之戎，燕山一帶的叫作山戎或北戎，有一部分叫作無終氏之戎，太行山和山西高原的叫作赤狄，陝北高原的叫作白狄。另外還有一種長狄，據說那種人的身材

異常高大，根據地大約是太行山的南部。陝西西部和隴東高原上的叫作允姓之戎和姜姓之戎，也統稱為西戎；秦嶺一帶的叫作犬戎，河南西部山地的叫作楊拒、泉皋、伊維之戎和蠻氏之戎。這許多野蠻部族真是五光十色，和諸夏各國犬牙相錯的雜居着。除了北方這些遊牧部族而外，淮水、漢水和長江流域各地還有蠻族和夷族，乃是以森林和池沼地帶為根據地，以採集和捕魚為生的異種部族。他們的文化也和諸夏各國不很相同。那時候的黃河，是從現在的鄭州附近流向東北，到天津附近入海的。也就在鄭州附近的地方，從黃河分出來一支水流，大體上是沿了現在黃河的河道東流入海；這一條水，當時名叫濟水。這條濟水通過黃河和西方的渭水接連起來，大致形成一條東西的直線；這條直線，可以說是古代諸夏文化集團發展的軸心。以這個軸心為骨幹，分頭向其他適於耕種的河谷和平原去開拓，諸夏的活動範圍也就隨着擴展。也就在這同時，自然和那盤據在山岳和湖沼地帶的種種夷狄部族越來接觸越多；爲了爭奪活動範圍，相互間的衝突也越來越激烈。這種情形，在北方尤其厲害。在這相互衝突的時候，諸夏方面十九是吃虧

的，原因很顯然：農業社會的生活各方面，都是呆滯的，行動自然也太緩慢。在另一方面，游牧部族的行蹤無定，來去飄忽，行軍作戰，有如狂風暴雨，所以總是能夠保持主動，進退自如。他們可以隨時出動進攻，可是諸夏國家徵調一次隊伍，卻很費些手脚；等到軍隊徵調齊了，開始出動的時候，往往敵人已經是帶了搶掠的東西轉回山裏去了。幸而諸夏國家建築了許多城郭，散布在各地，游牧部族不容易攻打進去；但是居住在鄉野的農人，就沒有方法防禦，時常要遭受侵擾，飽嘗防不勝防的苦頭。

自從周族建國以來，始終是同各方的野蠻部族在不斷的鬥爭。能夠抵擋得住夷狄的攻擊，也就能夠保持太平，否則就是一個衰弱時期。王朝威望的大小，就全看它的力量是不是足以領導起來對夷狄的抗戰。在開國的初期，王朝的勢力正在強盛，自然壓制住了各方面的夷狄。尤其是在東方，周族系統的国家，向夷狄勢力範圍以內還大大的擴展了領土。可是到了周朝的第四個君主昭王的時候，王朝已經顯出衰弱的徵象，夷狄又漸

漸蠢動起來。昭王有一次到南方漢水一帶去巡遊，遭了蠻人的暗算，一去沒有回頭，死的不明不白；朝廷因為沒有力量，對於這樣一件大事，竟然沒有敢追究。各方的野蠻部族看到王朝衰弱，也就一個個的置張起來。昭王的兒子穆王，倒是很振作了一下，幾次興兵討伐內侵的敵人；王朝的威望，因而又增高了許多。只是他去世以後，情形又變更了。夷狄部族隨了王朝的衰弱越來越加猖獗，時常跑來侵擾；諸夏的人必須輪流拋下工作，離開家庭，去到邊界地方守衛，戰死的自不必說，能够轉回家的，往往會發現他的鄉里已經改變了樣子，家人星散，田園荒蕪，真是說不出的淒慘。當時的詩人也會有詩描寫這種景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不遘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卷之五 227-708 = 35 年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裏面所說的獫狁，正是北方的遊牧部族。當時諸夏國家的人民，直接間接的也不知道受過多少煩擾和苦痛。又過了一百多年，到宣王做了天子，一力勵精圖治，選賢用能，對各方的夷狄部族，大張撻伐。他派遣召穆公平定東南方的淮夷，尹吉甫遠征東方的徐戎，方叔討伐南方的蠻荆，又命尹吉甫和南仲連次出兵攻擊北方的獫狁，每次都是取得

勝利；並且隨了每次的軍事勝利，又新封建了許多侯國，擴展諸夏文化的勢力範圍。各國諸侯看到王朝這樣的強盛，又都表示畏服，彼此之間，再也沒有甚麼紛爭，漸趨衰弱。周室，就這樣中興起來。可惜宣王的武功，有始無終，到了他在位的末期，討伐姜氏之戎，吃了敗仗；從那時起，王朝的威望就又降低了。他的兒子幽王，又是一個無道的君主，諸侯已是漸漸離心，偏偏他又爲了廢后的事，惹惱了王后的母家申國。於是申侯就借了犬戎的兵，進攻幽王，打敗了王朝的軍隊，把幽王也殺了，王朝首都遭了一次洗劫。三百五十多年的西周王朝，終究斷送在遊牧民族的手裏。

幽王的兒子平王卽位之後，把首都遷到洛邑，就是如今的洛陽。那時王朝的威望，已經一落千丈，所擁有的實力，也是有限得很，甚至還比不上一個普通的侯國。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既然失掉了權威，各地的諸侯於是乎一個個亂動起來，各結同盟，互相攻擊；今天是友，明天是敵，彼此亂戰的結果，自然是大大的削弱了諸夏集團的實力。散布在各地的夷狄部族，乘此機會，就大肆活動，對諸夏各國不斷的侵擾。北方山岳地帶

的遊牧部族本已十分猖獗，而在南方長江中游又興起了一個荊蠻族的楚國，勢力一天天的強大，在很短的期間內，降服了漢水流域和淮水上游一帶屬於諸夏系統的許多侯國；更向北進，一直伸展到黃河的南岸，差不多要和北方遊牧部族的南侵勢力接連起來。像這樣內部紛亂而外患又一天急迫一天，諸夏文化集團確實是岌岌可危。面對了這種嚴重的局勢，要想維繫諸夏系統的文化，就必須設法制止夷狄的侵略；而爲了抵抗外來的侵略，構成諸夏集團的那些侯國也就必須停止內鬨，並且進一步互相團結起來。但事實上完全獨立的許多國家，又祇有在一個共同擁戴的領袖領導之下纔能團結一致。可是原來的共主周王，已經失去領導的能力，那些諸侯卻又實力相差不多，互不相下，沒有一個能夠出頭來做新的共主。就在這種情勢之下，纔產生出來一種霸政的體制。這種體制，乃是由諸侯當中比較最強大的一個做霸主，作爲事實上的諸夏領袖，名義上卻仍舊擁戴周王爲天下的共主，故意的加以尊崇，提高他的地位，這就是所謂「尊王」。霸主打動天子的旗號，領導一般諸侯合力抵抗夷狄部族的侵擾，這就是所謂「攘夷」。攘夷是動

機，尊王是手段；假借周王的名號來團結諸夏各國，憑藉各國聯合的力量去對抗夷狄的侵略，這就是霸政的本質。這種政治體制延續了差不多三百年之久，在這長時期裏，雖然經了不少次的挫折，但綜起來說，諸夏的文化集團確是藉此抵住了夷狄們的攻擊，並且大大的擴展了自己的勢力範圍，而創立這個體制的人，就是本傳的主人公——管仲。



管仲



三

第二章 管仲的出身

管仲另外的一個名字叫夷吾，有的書上也稱他爲管敬仲。據說他是潁上人，又說他是姬姓的支屬，和周天子是一姓。他的父親名喚管莊，是齊國的大夫。潁上不知道是在那裏，如果是因了潁水而得名，那就應當在如今的河南省內。周朝初年在如今河南省鄭縣地方封了一個管國，乃是周天子的宗室。古代的貴族除了姓之外還有氏，姓爲全部族的人所共有，以後支系越分越多，每一支系又都各有一個氏，以便互相分別。氏的名稱或是用支系開創人的別字，或是用那人的官職，或是用所封的地名。管仲或許是管國的后裔，所以就以管爲氏。管國後來亡掉，管氏的子孫大概有的逃往齊國，取得貴族的身分，也就成了齊國的人。關於管仲早年的身世，我們知道的很少。戰國末年人編的一部分呂氏春秋上面，記載着一段管仲早年經商的故事。經商在封建時代是一種賤人的職業，管仲既是貴族子弟，一定不會做那種營生的，因此有人認爲那種傳說出於後人的附會。

不過管莊是齊國的大夫的話即使不假，他的氏族也必然不是怎樣的顯赫；因為除去管仲而外，關於管氏在齊國的情形，史書上差不多一點沒有記載。尤其是在管仲執政之後，他的氏族按理應當強大起來，可是史書上並沒有顯示出他的子孫在齊國的政治上占有怎樣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假定：管仲即使不是出身於平民的階級，也很可能是一個微末的貴族子弟，屬於士的階級。封建時代的士，差不多都是卿大夫們的支庶子弟以及他們的後代，同時也就是卿大夫們的臣屬。每個卿大夫屬下都有許多的士，每個士都由他的主人分給一塊田產，所以大小都是個地主。年代一久，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卻是有限的，漸漸有的人就分不到手，自然不得不改就他業。齊國在當時原是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國家，沒落的貴族子弟改行經商，也許是有的。可是管仲總歸是屬於士的階級。當時的士，是要具有文武的才幹，早年時節，必須誦讀詩書，通曉文義，明習掌故和規章，以及祭祀、朝會、外交等等禮儀，此外還要學習駕車、射箭和戰鬥。他們在平時可以辦理行政事務，作起戰來就是甲士，也就是軍隊的中堅。管仲自然也是受過這種訓練的。

他在早年很不得意，他曾投過三次主人，結果都被主人逐了出來。他參加過三次作戰，卻沒有立下半點功勞，有幾次他的生活弄得很窘。不過在這期間，他卻交結了一個極好的朋友。他的這個朋友名喚鮑叔牙，同他一般是個微末的貴族子弟。據說他兩人合夥經商，到了結賬分財的時候，管仲就蒙混鮑叔牙，占他的便宜；鮑叔牙雖然明明知道，可是絕不同他計較，因為他知道管仲家裏很窮，又有老母要奉養，所以纔做出這種事來。管仲多少次失意，使得別人都看他不起，只有鮑叔牙始終諒解他。比如投奔主人有始無終，鮑叔牙就認爲是時運未到，並非管仲沒有本領；打仗的時候臨陣脫逃，鮑叔牙祇說那是爲了家有老母沒人侍奉，並不是管仲天生的怯懦。鮑叔牙就是這樣的諒解他，認識他。在他不得志的時候，替他辯解，給他安慰，真說得上是他的一個患難知己了。

那時屬於士一階級的人，照例是要投靠一個主人的，管仲在遊蕩了多時之後，終於投到一個公子糾的名下。在這同時，鮑叔牙卻投奔了另外一個公子名叫小白的，做了親

信
白

管仲

信公糾

糾一女兒：魯人
糾一女兒：魯人

信

684 670
4年

信。一雙好友，如今分道揚鑣。這公子糾和公子小白，都是齊僖公的庶出的兒子，同父而不同母。那時僖公早已去世，他的嫡親長子襄公在位。這襄公是個無道的君主，全國上下都不喜歡他，明眼人都料到齊國不久是會亂起來的。公子糾的母親原是魯國人，因此他就跑到魯國去，管仲自然跟了他走；同時去的還有一個人，名喚召忽，也是公子糾的心腹。他們希望將來齊國內亂一起，就藉魯國的幫助回去奪取政權。公子小白也是這樣打算，祇是他的外祖母家是衛國，距離齊國太遠了些。那時齊國的南鄰有一個莒國，論起路程來，比魯國還要近便；於是鮑叔牙就陪了公子小白投往那裏。這兩位公子各抱着野心，分頭準備，單等時機一到，就跑回去爭奪國君的寶座。

果然，過了沒有好久，齊國有人起來作亂，把襄公殺了，另立了襄公的一個堂弟名叫無知的做了齊侯。無知登位之後，不久出去遊玩，又為仇人所害。兩個國君接連死於非命，使得全國人心十分慌亂起來。當時最急迫的問題，就是誰來接着做齊國的君主。齊國的貴族當中最強大的，乃是高，國兩氏。那時高氏的首領高侯，和公子小白自幼交

侯

此

之

國

息

公

好，於是就聯合起國氏來，主張擁戴公子小白爲君。他們一面在國內部置，一面差人前往莒國，報知國內的局勢，要公子小白火速回國。公子小白得知之後，立刻動身，由鮑叔牙替他駕着車，帶了從人，連夜趕回。公子糾在魯國，也得到了國內的消息，他早已和魯侯莊公商議妥當，就由莊公派兵送他回國，預備用武力奪取政權。他也料到公子小白會趕回國內和他競爭的，深恐怕他跑在自己前頭，於是就派遣管仲帶領一小隊人馬，趕往莒國通達齊國的大路上，準備截着公子小白，結果了他，以絕後患，他自己則率領着魯國的隊伍，浩浩蕩蕩，直趨齊國的首都。

管仲得到命令之後，立刻登程。剛剛趕到，早見公子小白一夥人遠遠而來。管仲駕車當先迎了上去。兩下離得越來越近，雙方的從人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準備廝殺。這時管仲忽然催動了坐下車，飛也似的衝向公子小白的車前；看看較近，便拈弓搭箭，認準了公子小白，一箭射去，不偏不倚，剛好射中他腰間。這一來嚇壞了一旁持鞭御馬的鮑叔牙，心中暗想，主人這可完了。可是等他定睛一看，纔放了心，原來公子小白腰

白傳孔
間繫着一條皮帶，腰帶正中是一副銅鉤扣合起來，那枝箭恰好射在銅鉤的上面，因此不會傷着皮肉。論理這時公子小白和鮑叔牙都要回射管仲，可是鮑叔牙忽然靈機一動，踢了公子小白一脚；公子小白是個乖覺的，登時領悟鮑叔牙的意思，於是怪叫了一聲，身子往後一仰，跌倒在車上。鮑叔牙也假做慌張的模樣，一面蹲下身去扶公子小白，一面命令從人一齊放箭。管仲眼見敵人腰部中箭，料是不得活了，既已完成了使命，就不願再逼害他的好友，便把車掉回頭去，一聲號令，全部人馬飛奔而去。一路之上，想到這一趟馬到成功，做得乾淨俐落，心中十分高興，自不必說。等到遇上公子糾的大軍，把公子小白中箭身死的話說了；公子糾好不興頭，知道齊侯的寶位再也沒有人來同自己爭奪，多時以來懸着的一顆心就放鬆了，因此也就不再着急，只是緩緩而行。

鮑叔牙見管仲的人馬已經走去，這纔扶起公子小白；一般從人知道了主人並不會着傷，也都歡喜。鮑叔牙卻認爲雖然逃過了這一難，大事卻還沒有成功，於是催動人馬，比前更加快的向前趕路。他們的路又近，走的又快，結果自然是比公子糾先到了首都臨

城內的高偃等人早已布置妥當，等公子小白一到，馬上就擁戴他做了齊侯，這就是那鼎鼎大名的齊桓公了。

齊桓公即位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解決公子糾。那公子糾走在路上，得到桓公即位的消息，真是又急又氣，連忙差人轉告魯侯。魯莊公聽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添派了人馬前去接應，一齊殺奔齊國的首都，乘齊桓公剛才得國，根基未固，想把他趕走，好讓公子糾登上寶座。這時齊桓公也就點起人馬，迎上前來。兩下的兵在距離臨淄不遠的一個名叫乾時的地方相遇，大戰一場，魯莊公陷入重圍，幾乎被擒，慌的跳下戰車，駕上一乘小車，落荒而走。統帥一走，陣形散亂，軍隊被打的七零八落，四散奔逃；幾員大將，也都被齊軍俘虜了過去，真個是一敗塗地。鮑叔牙帶了大兵，乘勝追趕，直進入魯國的境土，紮下營盤；一面卻差個人給魯侯送去一封信。信裏面說，公子糾一派的亂黨一定是要消滅掉的，祇是公子糾本人和齊侯是手足弟兄，不忍親自下手，就請魯

管仲的出身

國把他殺死；召忽和管仲二人，乃是公子糾的死黨，一意同齊侯作對，就請魯侯把他們二人捉了活的送來，齊侯要把他們斬爲肉醬，好舒一口怨氣。齊、魯兩國，並無仇恨，只要魯國答應了上面的要求，齊國立即收兵回去，以後兩國依然親善；不然的話，就要繼續進兵，圍攻魯國的都城了。

魯莊公接到了信，沒有主意，就召集一般大臣會商。其中有個大夫名喚施伯，是個極聰明的人，上前說道：「管仲的才幹，世間少有，如果當了一國的權柄，那個國家就會強盛的。如今齊國要我們把他解送回去，據我推測，並不是要殺他，而是想重用他。齊國重用了他，一定會強大起來，那時魯國豈不是要感受威脅？我們現在應當殺死他，把屍首交給使人帶回，可以免去後患」。魯莊公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可是齊國的使人不肯答應，他說齊侯和管仲因爲是有一箭之仇，把他恨入骨髓，定要弄活的回去，明正典刑。如果把他在魯國處決，齊侯是絕不能甘心的。魯莊公是剛吃了敗仗的，不敢違抗齊國的意旨，只得令人去把公子糾殺死，再把管仲和召忽捉了起來。那召忽是個烈性的

人，看見自己的主人被害，心如刀絞，不等人動手捉他，就拔劍自刎而死。管仲卻只說不願使魯國爲難，自己甘願回國伏法；於是束手就縛，聽任來人打入囚籠，由魯侯送交齊國的使人，押解回去。

管仲此去，齊國究竟要把他怎樣發落？這倒真叫施伯給料着了。原來齊桓公當國之後，就叫鮑叔牙執掌國政。鮑叔牙說道：「叔牙是微倖投託到主君的名下，如今成了大功，可是自知才能有限，不會幫助主君做出什麼偉大的事業來的。如果主君的志願祇是把齊國治理得平安，那末只須用叔牙和高傒，也就滿可以的了；如果是想要做諸侯的領袖，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那就非用管夷吾不可。管夷吾的才幹，比叔牙高強萬倍，主君一定要重用他！」桓公道：「管仲險些把我射死，明是仇人，看在你的面上饒他的活命，也很夠了，怎能說到重用他呢？」鮑叔牙道：「他本來是公子糾的臣屬，替公子糾出力，也只是各爲其主。他既然忠心扶保公子糾，主君如果重用了他，他不是一樣的給主君盡忠効力嗎？」桓公到底是英明的君主，聽了鮑叔牙說得有理，立時答應下

來，所以打敗魯國之後，就派人前去，指名要管仲的正身，惟恐魯國認識了他的本領，不肯放他回來。管仲聽到齊國使人的說話，早已猜測到內中的意思，所以就自請解送回國，全無懼怯。走在路上，他還深怕魯莊公起了悔意，派人追他回去，於是心生一計，就對攔他的役夫們說道：「你們整天跑路，卻是無聊得很，現在我來教給你們唱歌，彼此一唱一和，倒可解些寂寞，豈不是好？」役夫們走得辛苦，聽說唱歌，都很高興。大家一遞一聲的唱和起來，脚下合了拍，精神上又鬆快了，不知不覺都忘了疲倦，所以走的就比以前加快許多，沒有多少時候，早已踏進了齊國的境土。進了齊國第一個地方，名叫堂阜，鮑叔牙早在那裏迎接，二人相見，快樂非常。鮑叔牙打開囚籠，替管仲脫去身上帶的刑具，又叫他沐浴更衣，着實休息了一下，同時就把桓公的意思告訴他，然後同他前往臨淄。比及到達，桓公親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叫人反綁了自己的雙手，又叫人手持刀斧跟在後面，趨上前去，伏地請罪。桓公連忙替他鬆了綁，再三撫慰，引了他進城。一番傾談，彼此都感覺到無限的愉快。桓公隨即封他做了大夫，把齊國的大權全交

海濱

晉
仲

黃口

黃
城
菜

野
回
古
河

臨
淄
(齊都)



P.39

鄭

有
譯

紀
昔

P.78

二
四

曹
宗

鄭

魯
邦

P.43

P.70

(P.37)

許
春
卷

吳
徵

蘇

第三章 建立霸權的預備

從歷史上看去，凡是建立一番偉大的事業，一方面固然要一班人才偶然的遇合；但另一方面，物質的憑藉也是不可少的。齊國霸業的創建，也是如此。春秋時代的齊國，大約相當於現在山東省黃河、膠濟鐵路和萊州灣三者之間的那塊地方，差不多全部是平原；土質很好，農業相當發達，因為靠了大海的緣故，無限量的海產，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尤其是鹽，本為人人所必需，更是一項絕大的富源。除此而外，齊國地方適於生長桑麻，因此很早就發展了紡織業。所出產的織品，不止供給本地的需要，而且經常的輸出到別的国家。這種情形，在當時是很特殊的。有這種大量的輸出，自然會增加齊國的財富。齊國屬於濟水流域，濟水是當時文化區域東部的交通幹線；這一條天然的運道，也大大的幫助了齊國對外通商的發展。總括起來說，當管仲取得政權的時候，齊國的農工商業都相當的發達，地方的天產也比其他的侯國們要豐富些。這些比較優越的

物質條件，本身已經潛藏着一種力量，只消有政治天才出頭加以利用，就能替齊國在國際間造成領導的地位。

姜太公

除了物質方面的憑藉之外，齊國還有一種優良的精神傳統，這對國家強盛，也是不可少的。原來齊國的第一個君主，是周朝的開國元勳姜太公（呂尚）。姜太公替周武王爭到天下之後，受封為齊侯。他是一個極有本領的人物，受封之後，他定下一條治理國家的原則，就是尊重賢能，崇尚功業；國家用人，並不完全以他的社會階級為標準；有本領的人，即使社會身分比較低微，也能夠升到上層的。本來在封建社會裏面，一個人的社會身分，一降生就已經是注定了的。社會的階級是呆板的，屬於某一階級的人，除去極少的例外不算，原則上是不能上升，也不會下降。在這種制度之下，自然有許多人，才因為社會身分低微而被埋沒，得不到機會施展他們的才能。齊國雖然也是封建制度之下的一個國家，但是姜太公遺留下來的傳統，卻多少能夠補救那種板滯的缺陷。也正虧了這一種傳統，所以管仲纔得由低級的貴族一躍而成為國家的執政。他當了國政之後，

自然也就能夠根據這同一的傳統去選拔人才，這一點確實是齊國建立霸業的憑藉之一。

x
x
x
x

管仲擔當了齊國的政事之後，大權在手，立即開始發揮他的政治天才。他對於當時的政治形勢，認識得非常清楚。周部族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因為年代已久，原來的精神差不多已經喪失淨盡；在上面是一個徒擁虛名而毫無實力的天王，下面則是一盤散沙似的許多侯國，不但不彼此關切，反而互相攻擊吞併，擾攘不休。那散布在各地的異族，乘機大肆活動，對華夏文化集團各國不斷的侵擾，許多的小國都作了這種局勢的犧牲。這種情形如果一直繼續下去，華夏各國遲早都將要被各個擊破，整個的中原將是夷狄的天下，華夏文化就要滅絕，華夏人民的前途命運，也自然不堪設想了。管仲看清楚了這種時代的危機，認定華夏諸國的團結，乃是自衛圖存的唯一出路。要想各國相互團結，就須有一個共同的領袖；而當時的周天子，已失去了領袖的威望，新的領袖必定須從一般侯國當中產生出來。管仲是齊國人，自然首先想到自己的國家；恰好齊國的情形，在

各方面都很優越，具備了成爲領袖國家的條件，因此他就決意負起時代的使命，替齊國造成在列國當中的領袖地位，號召華夏諸國，結合起來，抵抗異族的侵擾，保衛華夏的文化。

要想到列國的領袖，必須本身是個強國；因此管仲當政之後，所推行的政策，簡括的說，就是「富國強兵」。在開始經營國際政治之前，他首先以主要的精力整理齊國的內政，充實國家的力量，以爲強國的基礎。幫了他一同努力的，除去鮑叔牙和高傒之外，比較出名的，還有隰朋、甯戚、王子城父、賓胥無和東郭牙等人，都是當時齊國第一流的人才，經管仲選拔錄用，分別執掌了各方面的重要任務；政府的陣容，可以說是十分整齊。

管仲的意思，假設把國家比作一座房子，那末禮、義、廉、恥四者，就是國家的四根支柱；如果這四根支柱立不牢穩，國家就要歸於滅亡。同時他又認定了一個道理，昔

通的人，必須吃得飽，穿得暖，然後纔會有廉恥的心。知道怎樣是光榮，怎樣是恥辱；必須是手中有些積蓄，然後纔能希望他懂得禮節，遵守法度。更進一步來說，一般國民必須能夠安定而舒適的過活，纔肯服從政府的法令；如果大多數人都在飢餓線上掙扎，那樣的國家必然是不容易治理的。因此他治理國家的作法，便以開發經濟爲先。前面說過，齊國有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工商業也比較發達，原已有了很好的經濟根基；管仲就憑藉了這種根基，更加以開發推展。他使政府用種稻的方法鼓勵人民改良農業，開墾荒地，增加耕種面積。特別是那海內出產的魚和鹽，本來就是齊國的重要富源，如今更經政府有計畫的經營，就越加發展起來。單就鹽來說，乃是人人每天必要消費的一種東西，可是並非各地都有的出產，所以產鹽的國家就占有一項絕大的專利。齊國在當時雖不是唯一產鹽的國家，但卻是產鹽最多的一個國家，再加上有天然的水道可以利用向外輸運，因此我們可以推想，齊國的鹽很可能供給黃河下游和濟水流域，包括整個的東方各地。鹽要算是齊國對外通商的主要物品，其他紡織等等製造業的發達，也自不消

說得。除了積極的鼓勵倡導之外，管仲又取締種種擾民的政令，儘量減少賦稅和徭役的徵發，使老百姓都能安居樂業。在他這樣的治理之下，齊國整個的社會經濟自然突飛猛進，表現出高度的繁榮。整個社會生產提高，也就是整個國民收入增加，也就是整個國家的財富增加。國民既然富裕，負擔賦稅的能力自然隨着加大，因此國家的財政也就容易處理了。

商業一發達，交易的行爲自然大爲增加，於是充作交易價值標準的貨幣也就通用起來。這在齊國，自然是不會例外的。管仲對於貨幣在社會經濟生活上的作用，認識的非常清楚；他深知貨幣的流通和一切物品的價格相互之間具有怎樣的關係。他把貨幣的效用完全操持在政府的手中，憑藉了控制貨幣的流通來控制物價。這樣可以發生兩種作用：

一種作用是防止物價劇烈的變動。因爲在一個以農業爲主的社會裏面，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對於整個社會經濟所發生的影響極大，而農田收穫的豐歉，則決定於天時；可

是天時的好壞最沒有一定，所以收穫的豐歉也就不能固定，農產品的價格也就隨着或漲或落，變動極大。如果完全任其自然，勢必至於遇到荒年則穀價飛漲，演為饑饉；遇到豐年則又感到糧食過剩，價格慘跌，農民得不到絲毫的好處。像這樣子，不但人民的生活時常受到擾亂，農家也會減少工作的興趣，兩者對於國家都是不利的。管仲如今控制了貨幣的流通，豐收之年，就由政府大量收購，穀價可以不致跌的太低，遇到荒年，再把政府所儲存的糧食拿出來賣，可以制止糧價劇烈的上漲。一方面穩定了穀價，另一方面也是一種社會救濟政策，確實是一舉兩得。

控制貨幣流通所產生的第二種作用，是調劑社會的貧富。政府因為控制了貨幣的流通，也就能夠操縱一切貨物的價格；既然有了操縱物價的能力，也就防止私人利用物價的變動而進行兼併。政府能夠使那積在富人手裏的物品貶低價格，也便能夠使貧人的財富無形之中增高，這完全是藉了控制貨幣的妙用。本來封建社會當中，經濟階層是固定的，兼併的現象不容易產生；只是到了管仲的時代，社會的封建組織已經開始解體，

原來固定的經濟階層漸漸發生變化，私人兼併的風氣越來越盛，這在工商業比較發達的齊國，當然更爲猛烈。在封建制度之下，政治的權力是分屬於各階級的，列國政府本沒有很大的力量；等到封建制度開始瓦解，政府還不會造成集權的局面，可是原來勢力雄厚的貴族卻乘此機會擺脫了原來的束縛，儘力進行兼併。他們的勢力的擴展，對於政府自然是極大的威脅，同時也是構成社會紛亂的一個主要因素。管仲看清楚這種形勢，所以想經由管制貨幣的途徑來阻止私人兼併的趨勢。貴族的勢力發展受到限制，政府的權力就得以相對的提高，全國的意志和力量得以集中，然後纔能夠參與國際政治，並且進而加以領導。

這裏有一點要加說明：當時的經濟生活，還不會完全進到貨幣經濟的階段；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大部分仍然保持着以物易物的狀態，此外所使用的貨幣，並不是單純一種由政府法定的金錢，而是攙用種種實物貨幣，例如米、鹽、布、帛之類。因此管仲管制貨幣，當然也包括這種種實物貨幣在內。據說管仲當年設立過「九府」，有人說，就是

周官上所說的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那九種執掌財幣的官職。真正的解釋，我們現在自無從知道；不過單從字面上似乎可以猜想，所謂九府，也許是政府儲存種種貨幣和實物的機關或倉庫；政府經常保有大批的種種貨幣，按照市上物價的高低，隨時散出或者收進，藉以發生上面所說的那兩種作用。總而言之，關於管仲的經濟和理財政策，歷史上並沒有詳細的記載，只是說當時收到的功效是非常的大，我們只好從功效上去推想其中的原委了。

管仲一面開發經濟，整理財政；另一方面就組織國內的行政。組織的詳細節目，我們也是不得而知。後來戰國時代的人假託管子，寫了許多關於治國行政的文章，合起來編成一本書，取名為「管子」；在那本書上，說到管仲當年替齊國規畫的行政組織很是詳細。依據那種記述，當時齊國的行政組織是和軍隊的編制完全配合起來的。把國都及其四郊區域分為二十一鄉，其中六個算作工商之鄉，十五個則是士農之鄉。每一鄉包括

二千家人家，分層組織起來。每五家組成一個基層單位，叫作「軌」，設置一個軌長；十軌合成一個「里」，里的首長稱爲「司」；四里是一「連」，有一個連長；十個連是一鄉，由一個「良人」管轄，作爲行政區域單位。遇到作戰的時候，每家出一個兵。一軌是五個人，叫做一「伍」，一里是五十人，叫做一「小戎」；一連是二百人，叫做一「卒」；一鄉是兩千人，叫做一「旅」。每一級都由原來的行政首長充任指揮。五個鄉就是一萬人，組成一「軍」，由一個「帥」帶領。全國二十一個鄉，桓公本人直接統帥十一個，另外的十個，則分由齊國的世卿國氏和高氏的首長統帥。大概歸桓公統帥的那十一個鄉當中，包括六個工商之鄉在內；工匠和商人不參加作戰的，所以桓公直接指揮的，也只是五個士農之鄉，同國、高兩氏是一樣的。合計起來，桓公和國、高兩氏各領一個「軍」，共爲三軍，形成齊國的基本武力。

至於國都及其近郊以外的廣大區域，當時稱爲「都鄙」，行政的編制，另是一個樣子。基層單位也是由五家組成的「軌」，有一個軌長；六個軌是一「邑」，爲頭的稱爲

「司」；每十個邑叫作一「卒」，上面有一個「長」；十個卒合成一「鄉」，首長也叫「良人」。在軍事組織上，三個鄉合起來組成一「屬」，每個屬是九千人，由一個大夫統帥。都鄙一共分爲五個「屬」，就是四萬五千人。據另一種說法，鄉和屬之間還有一種「縣」的階層，是由三個鄉組成的；十個縣纔是一屬。依此計算，一屬就有九萬人，五屬就是四十五萬人了。

以上所說的，自然是後人的附會，因爲士、農、工、商所謂「四民」的說法，乃是戰國以後的事，春秋時代的前期裏是不會有的。還有一點，後人提到管仲的治國，非常稱道他的「作內政以寄軍令」。全國國民都服兵役，依行政的組織來編制軍隊，使同鄉鄰的人隸屬於同一隊伍，既便於召集訓練，同隊人的感情也容易融洽，相互之間比較更爲關切。這自然是很合乎理想的。不過這在後世雖然很難做到，在封建時代卻是輕而易舉，而且是本就如此。在封建時代，國家是上下分層隸屬的一種組織，國君之下是一些卿大夫，每個卿大夫又各有許多的士，他們都是大大小小的領主，各有一片封地，封地

上的居民，也就是他們各自的私屬，替他們種田作工，也替他們打仗。在軍事組織上，每個士屬下的農人，也就是他所統轄的隊伍；隸屬於同一個卿大夫的士們所統轄的隊伍合起來，就是那個卿大夫的隊伍；一切卿大夫所有的隊伍合起來，就是國君的隊伍了。這樣的組織，大體上正是上面所說的那種情形。管仲那時候，封建制度已經開始破壞，但還沒有完全消滅，他當時憑藉了舊有的組織形式曾有一番整頓，自然是極可能的事。到了戰國時代，封建的組織早已消滅了，可是關於封建時代的傳說還存在着；一般講求政治的人，大概就根據關於管仲治國的傳說加以附會，編造出來那末一套組織，叫當時的人看來，自然是很新奇的了。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這樣說，卻並不是有意貶低管仲的才能。他在當時顯然在內政組織上面確有很好的設施，所以後來的人纔就他身上附會出來一大套制度和政策；祇是關於這一方面的確實記載沒有留傳下來，我們無從詳說，這是事實。也正爲了這個理由，後人假託管子而編造出來的許多制度和政令，此處也就不加一一列舉了。

第四章 創霸的經過

管仲在國內做了一番整理建設工作之後，立國的基礎已經穩固，就轉而向外經營國際政治，替齊國創建霸權。在敘述他，的創霸經過之先關於當時的國際形勢，還有一加說明的必要。

從周平王東遷到齊桓公登位，中間一共是八十五年。在這個相當長的期間，國際政治的活動中心區域，只限於黃河下游和濟水流域一帶，範圍並不太大。那些侯國當中，比較有力量、在國際間占有地位的，除了齊國以外，就是魯、鄭、宋、衛、陳、蔡幾個國家。用現在的地名來說，魯國是在山東省的南部，鄭國在河南省的中部，宋國在河南省的東部，衛國在河南省的北部，陳和蔡都在河南省的東南部。其他的小國還有很多，因為並不關係重要，也就不需一一列舉。在最初時期，列國當中要數鄭國最為強盛。鄭國立國還不太久，纔傳到第三代，頗有新興的氣象。那時的國君莊公，又正是一代的好

雄，爲人足智多謀，很會用兵，在國際的鬥爭裏，他採取了遠交近攻的策略，聯結遠方的齊、魯兩國，專向鄰近的宋國和衛國進攻，幾次把它們殺得大敗。鄭國的君主一向是兼做周天王的執政大臣的，莊公自然也繼承了這個職位，他雖然同天王相處的很不好，而且還打過一次仗，把天王本人也射傷，可是他很會假仁假義，有時也把周天王搬了出來，假借共主的名義來征討別的國家。他的兵力既強，而且又是名正言順，所以每次的戰爭，最後總歸是他占到便宜。

論起鄭國的國力和鄭莊公個人的才幹，在當時確是具備了創立霸政的條件。那時北方各地的戎狄，已經常在譁動，且不用說犬戎滅掉西周那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卽就是齊國和鄭國自己，也都曾受過他們的侵擾。南方的楚國也開始強大，向中原伸展勢力，鄭國已經感到威脅，也曾同蔡國、鄭國會商過聯合防禦的辦法。這樣的環境正顯示出華夏文化集團以內的國際政治，實在需要開創一種新的局面。可是適當其會的鄭莊公，縱然是機警過人，在位又有四十三年之久，卻不會認識清楚這一政治演化的趨勢；他似乎不

會考慮過這個問題，只是想到利用王權衰落的機會混水摸魚，憑着個人的機巧，來找些便宜。他把一個橫在眼前的機會白白的放過了，他辱沒了他的時代的使命，他辜負了他所遭遇的環境。他的貪慾和自私，掩蔽了他的智慧。由於他個人識見短淺，使霸政的產生遲了幾十年，使以後管仲創霸遭遇到更惡劣的形勢。因為在這幾十年的期間，夷狄的勢力越加強大起來，而華夏集團諸國則由於不斷互相殺伐，或是國內紛亂的緣故，實力比較以前更加削弱了。

齊桓公登位之前十五年，鄭莊公死去，他的幾個兒子爭奪君位，時起內鬩，鄭國的國勢跟着衰落下去，失去了領導列國的資格。不久齊襄公就登了侯位，他一上來以替祖上報仇為理由，滅掉了他的東鄰紀國。那時候鄭國正鬧內亂，一個大臣名喚高渠彌的，謀殺了莊公的兒子昭公，另立了昭公的弟弟公子亯為君。齊襄公只說要和鄰國的新君會面，約會地點；他們君臣二人一齊赴會，襄公卻板起面孔，責備他們弑君之罪，殺了公

子甕，車裂了高渠彌。就在這同時，衛國也有內亂，衛侯惠公逃亡到了齊國；齊襄公又出頭邀了魯、宋、陳、蔡諸國，一同進兵討伐衛國的叛黨，把衛惠公送回國去，重登侯位。以上幾樁事，做的也很漂亮；齊國在國際上的聲望，因此就提高了，儼然是列國的領袖。不過齊襄公的才具究竟有限，他個人的品德也不太高；過了不久，本國也起了變亂，他被亂黨殺死，領導團結華夏諸國的機會，也就又一度成爲泡影。

齊襄公本人雖然是完結了，但是齊國的國勢卻在他的手裏增強了；桓公所繼承的齊國，在當時列國當中要算最強。那時鄭國是衰弱下去了，衛國和宋國也都振作不起來，幾個比較大一點的國家當中，只有魯國還算相當強盛。魯侯莊公正在少壯，而且很會用兵。前面說過，爲了擁立公子糾，魯莊公會和齊國打過一仗，結果是戰敗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齊桓公那時即位不過半年的光景，一切自然都還不會整頓，卻急於又對魯國用兵。那次進兵的動機，也許是對於魯國的擁護公子糾仍然不能釋忿，也許是恐怕魯莊公會同自己爭奪霸權，乘他新敗之後，再加以壓迫，使他早早屈服，以免後患。齊兵侵

進魯國的疆界，魯莊公也不肯示弱，起兵來迎，雙方的隊伍遇在一個名喚長勺的地方，擺下陣式，廝殺一場。桓公本來想着，魯國新吃了敗仗，對齊國不免懷有懼心，此番長驅直入，士氣高張，一定會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但他卻忘記了「兵無常勝」，「疆場之上，一此一彼」；交戰的結果，齊軍反被殺得大敗，棄甲丟盔，逃回本國。桓公敗了回去，又羞又氣，一心想報仇雪恥。過了不到半年，他又聯合了宋國，一同起兵，在魯國西南方的一個名喚郎的地方會師，向魯國挑戰。魯莊公新打了勝仗，膽氣越壯，立刻帶領大軍前去迎敵。宋國的兵力比較弱些，魯軍乘其不備，夜裏偷襲宋營，把宋軍打了個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宋國一敗，齊軍膽也怯了，不敢合戰，悄悄的收兵回國。到了第二年，宋國想要報復，又和魯國打了一仗，還是沒有占到便宜。等到回去之後，內部又鬧起內亂來，國勢因而也就越趨衰弱了。只有魯國連戰連勝，聲威越來越大，國勢也越來越強，在國際政治上，大有掩蓋了齊國的氣勢。

齊桓公原想打上幾次勝仗，振起兵威，那時就可以穩做諸侯的魁首，卻沒有料到接

連的受到挫敗，眼看着齊國的威望日減，反而還趕不上襄公時代了；他的內心鬱悶和焦燥，也就可想而知。管仲是桓公的靈魂，自然替他盡心籌畫。魯國既然不易屈服，還是避免和它直接衝突，另對比較容易成功的方向去發展；等到齊國的威望恢復之後，魯國的兵力和憑藉究竟比齊國差着一些，不怕它不低頭的。爲了重振兵威，必須找一個攻擊的對象。那時在如今的山東濟南附近，有一個譚國；齊桓公從前出奔在外的時候，一度走過那裏，譚國不會表示應有的禮貌，後來桓公回國作了齊侯，別的国家都照一向的成例派人前去致賀，只不見譚國的使人。封建社會是特別講究禮法的，像譚國這樣失禮的態度，就會受到旁人的責難。管仲抓到了這個題目，就建議給桓公，興兵問罪。譚國本來很小，力量有限，自然抵敵不住；齊軍沒有費多少事，就把它滅掉了。這一來，齊國的疆土向西伸展了很多，同時也是對魯國更逼近了一步。

齊國滅掉譚國之後，兵威果然重振起來。不過要做霸主，不能祇誇耀武力，而是必須有仁義的行爲表現出來，纔能使別的国家心悅誠服。這一點，管仲自然十分明瞭；他

成
遂
國

要另找一個表現仁義的題目。恰好這時宋國第二次對魯國交兵失敗，國內起了變亂，國君被亂黨所殺，許多大臣也同時遇害，亂黨另擁立了一個公子爲君。一般貴族聯合起來討伐亂黨，把他們的首領和他們所擁立的新君統統殺死，改立原來國君的弟弟爲君。這樣的變亂，鬧了有上半年，人心一時還是不得平靜。齊桓公正好利用這一機會，在他即位第五年的春天，邀請列國諸侯在齊國西南邊界上一個名喚北杏的地方集會，商討安定宋國的办法。這是他號召諸侯的第一次，算是一種嘗試。只因那時齊國在國際上的威望還不很高，大多數的國家或者因爲路遠，或者因爲自家有事，或者根本不願管別家的閑賬，對於桓公的號召，都是置之不理。除了宋國之外，應邀赴會的，只有陳國、蔡國和魯國南邊的邾國。這次集會的結果，雖然還算圓滿，但是場面卻不算大，還襯託不起一個霸主來。別的國家不到，也還罷了；魯國的北鄰，接近齊國疆界，有一個遂國，同鄰國是一般的弱小，距離集會的地點最近，竟也沒有派人赴會。管仲又抓到一個好題目，立即進兵討伐。遂國並不比譚國更強，因此也同譚國遭了一樣的命運。齊國滅掉遂國之

削霸的經過

後，就派了一支軍隊駐屯在那裏，它的西南方的疆土也就更向前推進了很多。這時齊、魯兩國已經接界，原在遂國地方駐屯的齊軍，對於魯國自然形成一種嚴重的威脅。據另一種記載，這一次是齊國進兵攻打魯國，魯莊公吃了敗仗，把本國屬下的一個名喚遂的城鎮割讓給齊國，纔得講和。兩種記載的孰是孰非，現在無從判斷。不過齊國這次占了上風，則無可疑。魯國決定改變態度，向齊低頭。就在那一年的冬天，魯莊公和齊桓公在齊國西部一個名叫柯的地方會面結盟，化敵爲友。關於這一次的盟會，有一種極有趣的傳說：那時代的結盟是要舉行一種很隆重的儀式的。在盟會的所在選擇一個地點，築起一座盟壇，各方隨從的人統統排列在壇下，只有參與結盟的國家的君主帶同自己的一個副手登上壇，行禮就位，繕寫盟書，當衆宣讀，大家依次歃血；然後在壇下掘一個深坑，把盟書埋在裏面，儀式纔算終結。這一次管仲自然是充當齊桓公的副手，魯莊公的副手名喚曹沫，是魯國的一員大將。他以前幾次參加對抗齊國的戰事，如今弄到喪師割地，君臣一同跑到齊國，低頭請盟，這使他十分傷感，心中充滿了悲憤的情緒。他想乘

了結盟的機會，用非常的手段替魯國爭取體面和利益。在舉行結盟儀式的時候，他在身邊暗帶了一柄短劍，跟隨魯莊公登壇。等壇上儀式結束，大家正要下壇，曹沫乘個冷不防，向前跳上一步，左手一把將桓公拖住，右手同時撩開錦袍，把短劍抽了出來，舉向桓公。光芒四射的寶劍，配上曹沫那副凶狠嚴厲的面孔，早把桓公嚇得呆了。壇下齊國的隨從人等雖然很多，因為事出意外，也都張皇失措；要想奔上壇去解救，又怕逼急了曹沫，對桓公先下毒手；只好繞在壇下，注視壇上的變化。管仲站在桓公一旁，怎奈身邊沒有武器，而且他也知道，在這種局勢之下，也萬萬動不得武，曹沫如此舉動，必有其所求，並非專意行刺。他問曹沫，究竟是什麼用意。曹沫回說：「貴國現在步步逼向敵國，敵國讓步，不知道什麼時候纔算終止，敵國的君臣十分惶恐，所以請求貴國給想辦法！」管仲聽他說話，知道是想要齊國歸還以往侵占魯國的地方，於是立刻請桓公答應他的要求。桓公只想活命，那裏還顧得許多，自然滿口答應。曹沫這纔放了桓公，把寶劍丟在地下，走下壇去，歸還原位，顏色不變，談笑自若。齊桓公這時驚魂纔定，思

前想後，不禁大怒，馬上要殺死曹沫，並且否認方纔歸還魯國割地的諾言。管仲卻說：「這事萬萬做不得！曹沫雖說無禮，不過方纔我們是沒法抵抗他的暴行，纔答應他的請求；現在危險剛過，就又依仗勢力殺害他，顯見背棄了剛纔所作的諾言，這只表示我們的小器，反而襯託出來曹沫的舉動光明。我們是想要做霸主的，要想做諸侯的領袖，就應當以信義爲先。如今爲了快一時之意，失信於人，我們所得到的實利，不過是以前得自魯國的那一點地方，可是天下諸侯都將因此而失去對齊國的信仰與同情；兩相比較，實在得不償失。我們應當把眼光放遠大些，一定履行我們的諾言。我們正好利用這一機會來表現出來霸主的氣度」。齊桓公究竟是個英主，他毫不遲疑的接受了管仲的意見，對於曹沫並不責罰，將以前奪得的疆土全部歸還魯國，盟會就這樣圓滿的結束。曹沫的冒險成功，魯莊公收復了失地，他們君臣歡歡喜喜的轉回國去。魯國從此死心塌地追隨齊國，自不必說；其他的諸侯聽說這事以後，也都深深感動，佩服齊桓公的寬宏大度，信守諾言，他們在心理上對齊國屈服了。齊國的霸業如今已經增添了精神上的配備。

做霸主就是做諸侯的領袖，齊國雖說國勢強盛，卻同其他的國家一般，是周朝的封國，到底還不能對他們發號施令，任意指揮。假使完全憑藉武力強迫諸侯接受自己的領導，固未始不可；不過當時齊國的力量未必容許這樣做，而且縱使能夠做到，那也是極笨的辦法。周天子雖然失去了實力，究竟名義上還是天下的共主；如果打着他的旗號來處理國際間的事務，豈不是省去許多麻煩？前面說過，鄭莊公也曾玩弄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只是他雖然發明了這個策略，自己卻不會有計劃的加以運用。管仲從他對於整個政治形勢的觀察上，認識出這一策略的高明，於是決意採用，作為實行霸政的主要方法。剛好宋國背叛了盟約，管仲就乘此機會作第一次的試演。

原來宋、魯兩國，一向就不和睦，好幾次動過干戈。齊國也曾和宋國聯合對付過魯國；後來宋國內亂，齊桓公使邀集了陳、蔡等國同宋國在北杏會合，解決宋國國內的糾紛，因此宋國對於齊國更加親近。可是如今齊國又和魯國結了同盟，宋國自然很為不高

宋國

與。齊、魯剛剛在柯地結盟，宋國就背叛了齊國。齊桓公正要創霸，當然不能容忍，立即出動大軍，又徵調了陳國和宋國北鄰的一個曹國的隊伍，合攻宋國；另外並派遣使臣前往天京，把宋國背棄信義，因此與兵問罪的原委，奏明天王，並且請求天王加派軍隊領導討伐。可憐周天王已經多年失去了威望，列國諸侯早已不大理睬他，自己既不依照規矩按時親去朝參，也輕易不派遣使臣前往問候，只當沒有這個共主一樣。天王受慣了冷落，倒也不很在乎。現在居然有個國家，而且是個強國，老遠的派了使臣前來覲見，並且請求天王領導討伐犯了過失的國家，這真可說是「雪中送炭」，連做夢都沒有想到的。冷落的天王朝廷，立刻增添了一些溫暖。受寵若驚的天王，對於齊國的請求滿口答應，自不用說。祇是一樣，天朝的兵力，依照最初的规定，是有六軍的，比最大的侯國還要大上一倍，可是那時卻是已經小的可憐，只比得上一個小的侯國。而且因為平時很少作戰，關於軍事的準備當然不夠，就連徵集兵丁車馬等一切，辦理起來，也都非常困難吃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算是編成了一支隊伍，由天王派了一個大臣單伯帥

宋伯

領，前去會師。可是他們趕到的時候，宋國已經對齊國屈服了。這一次周天王的軍隊雖然沒有當真臨陣，但究竟是出動了，而且是以堂堂正正的天王名義爲了討伐犯了過失的諸侯而出動的。這次的勝利，說起來也算是天王的勝利。天王能夠討伐諸侯，重新成了名實相符的天下共主，一般諸侯自然都要唯命是聽了。管仲的初次導演完全成功，從此以後，齊國的一切行動，就都有了法律上的根據。

本來當時東方的大國，除了齊國之外，只有魯、宋兩國，如今這兩國都已對齊國低頭。正在此時，鄭國因爲內亂而逃亡到外國的厲公打回國去，恢復了政權；他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必須聯結一個強國作爲外援，因此也對齊國極力表示親善。大河以北的衛國，也於此時表示好感。管仲看到局勢順利，正好利用時機提高齊國的地位。就在討伐宋國那一年的冬天，齊桓公邀請宋、衛、鄭三國的君主在衛國東部的鄆地會面，同時請求天王派人參加，表示這次的集會，乃是天王爲了平定宋國的內亂，宋國服從了天朝而召集的。管仲一力推行尊王的政策，用兵討伐是用天王的名義，召集會盟也是用天王的

名義；天王的威望越高，齊侯的地位跟着也越高。這一次集會，得到一個證明：當時比較強大的國家，大多數都應邀赴會，接受了齊國的領導，齊國已經成爲列國事實上的領袖。管仲知道時機已到，就在第二年，也就是桓公的第七年的春天，由齊桓公自己出名邀請幾個大國的君主重在鄆城集會。這次號召得到良好的回響，到會的除去上次的幾路諸侯之外，陳侯也老遠的跑來參加。集會的經過十分圓滿，大家公認齊桓公爲諸夏集團的首領。據那個時代的歷史家說，齊國自從那一次集會開始就做了霸主。同年的夏天，魯莊公的母親文姜到齊國去了一趟，她本是齊桓公的姊妹，這一次回娘家去，也象徵着齊、魯兩國的親善。諸夏集團的東部和中部的大國，如今差不多是完全順從了齊國，管仲創立霸政的心願得到初步的成功。

第五章 霸權的穩定

第二次的鄆地集會，雖然確定了齊桓公的霸主資格，可是到會的那些國家相互之間的感情，還不能一下子就達到融洽無間的地步。尤其是宋、鄭兩國，本是世仇，一時絕難和解。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本來附屬於宋國的一個鄭國突然叛變。齊桓公既然做了霸主，是主張維持現狀的；鄭國是一個附庸小國，照封建制度的規定是應當服從它的宗主的；如今忽然背叛，就是破壞了規矩，霸主不能容忍。齊國的軍隊出動了，聯合宋國的隊伍，還邀了鄰近的邾國的人馬，一同討伐鄭國。鄭國本是彈丸之地，在這樣大軍威逼之下，自然只得屈服。可是料想不到鄭國卻乘着宋國出兵討伐鄭國的機會暗地起兵侵襲宋國。這事齊桓公自然又是不能不管。就在第二年的夏天，齊國偕同宋、衛兩國對鄭國出兵。鄭國抵抗不住，只有低頭認罪。

管仲是利用每一個機會來表現齊國的領導能力的。就在同年的十二月裏，由齊國出

名，召集各國在宋國境內的幽地正式結盟。這一次應召到會的，除了鄭厲公而外，還有宋、陳、衛、許、滑、滕六個國家的君主，魯國也派有代表參加。許國在如今河南省的許昌縣，滑國在河南省的偃師縣，滕國在山東省的滕縣地方，當時也都算是比較出名的國家，現在都正式接受了齊國的領導。這一次集會的局面，比起以前幾次來，已經是大得多了。齊國的號召範圍，西面到達了滑國，接近了周天子的領域；北邊的衛國已鄰近狄人，南邊的陳國則距離荆蠻的楚國不遠；諸夏集團的東半部，整個歸到齊國的旗幟之下。又因為黃河上游的秦、晉等國，那時還沒有開始參與中原的國際政治；因此我們可以說，齊國當時的勢力，事實上已經是支配着整個的諸夏文化領域了。

不過齊國雖然做了列國的領袖，究竟還沒有造成統一諸夏的政權；接受了領導的那些侯國，並不是完全一心一德，精誠團結。特別是鄭國，距離齊國比較的遠，鄭厲公又是個奸猾之輩，對齊國始終不肯心服。幽地結盟之後，各國的君主都到齊國去朝參，向

設計
齊魯

盟主致駁，單單鄭厲公不去，只派了一個使臣代表。齊桓公大為不滿，就把鄭國的使臣拘留起來。緊接着齊國的威望又受到一次打擊。前面說到齊國滅掉遂國之後，就派了一支軍隊駐守在那裏。當地的人民很是強悍，不甘心服從齊軍的統治。他們設下一計，假作犒勞守軍，大擺酒筵，宴請他們，等到一個個喝的酩酊大醉，一聲暗號，動起手來，殺個精光，不會有半個逃脫。齊國那時好像內部裏有什麼困難，對於這些有傷顏面的事件，並沒有什麼嚴厲的表示。最奇怪的，魯國緊鄰齊國，但對於齊國卻不竭力追隨；上次幽地會盟，別國的君主都親自出席，魯國卻只派去一個代表。在齊桓公的第十一年的秋天，恰好魯國派遣一個公子結前往陳國參與婚禮，他半路上，遇到齊、宋兩國的君主結盟，順便就代表了魯國出席。這樣的輕率，使魯國老大的難堪；於是魯國邀了宋、陳兩國，與兵問罪，攻打魯國的西邊，算是整了一整面子。

就在這同時，周天王那裏發生了極大的變亂。大夫驀國等幾個人造起反來，聯結衛和南燕兩國，擁立周惠王的一個叔父名叫頹的為王，占據了天京；惠王抵敵不住，逃去

鄭國。這次事變，按說正是給做霸主的造了一個絕好的機會，霸主整天高倡「尊王」，如今王室發生了這樣的變故，他自然要出兵平亂，使天王能够復位纔是。可是齊國竟然把這個機會平空放過，對於這樣的事變，絲毫不曾有所表示；安定王室的大功，卻讓給了鄭國。周惠王逃到鄭國之後，鄭厲公竭誠招待，同時就出頭替雙方和解，沒有得到結果，只拘捕了南燕的君主。過了一年，鄭國纔聯合了成周鄰近的虢國一同起兵，擁護着惠王討伐叛黨，把王子頹和幾個禍首統統捉了正法，惠王重新登上天王的寶位。鄭厲公這一次風頭出了個十足。他本是世襲的王朝卿士，在國際上的地位原就很高；鄭莊公在世的時節，也曾打過多少次的勝仗，儼然是列國當中的魁首；厲公的豪猾兇狠，又很有點和他的老子相像，這次替王朝平定了禍亂，天王又割一塊地方賜與了他，包括著名的險要虎牢關在內，領土就擴大了許多。剛好在那幾年內，齊國不能有所作爲，憑了這些條件和機緣，鄭國當時很有出頭爭霸的資格。鄭國對於齊國，一向是貌合神離，不甘心服從它的領導，到了這時很可能是聯合起西方的諸侯，另外組成一個集團，獨樹一幟。

和齊國較量一下高低。在這樣的競爭當中，鄭國還有一種便宜，那就是周天王落到了鄭國的勢力圈裏，鄭國可以很自然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一切的一切拼合起來，對於齊國的霸業形成絕大的危機。上而所考慮的萬一真個實現了，齊國的霸業或許就會夭折，以後的歷史，也或許另是一個樣子。總算是齊國的運氣，鄭厲公剛剛平定了成周的變亂就死去了。他的兒子文公繼承了侯位，才幹平庸，沒有大志，鄭國的國勢就慢慢的減弱，再也不能出頭爭霸了。

齊桓公沒有了鄭厲公同他競爭，只算是一時的幸運。建立一番事業，是不能專靠幸運的，必須自家真正努力纔行。管仲君臣自然不敢怠慢。魯國距離齊國最近，抓不住魯國，就休想叫其他各國心服。鄭厲公去世一年之後，也就是齊桓公十四年的秋天，齊國派遣高偃前往魯國，同魯國的代表在防地結盟，重申舊好，兩國聯婚。當年冬天，魯莊公親自到齊國去行「納幣」之禮；第二年的夏天，又前往參觀社祭；剛剛回國，又和齊

侯在兩國交界的穀地相會；同年的年底，兩國的君主又在鄭國的扈地結盟；再過一年魯莊公就舉行婚禮，到齊國去「親迎」。從此以後，魯國纔決心隨順了齊國。

齊國抓住魯國之後，就進一步設法籠絡鄭國。齊桓公十七年，鄭國因為曼已和齊國疏遠，不能不另外結黨，就同楚國發生了友好的關係。還有南方的陳國，三年以前，國內有過政變，殺死了太子，太子的同黨公子完逃往齊國，齊桓公把他收留，加以重用；陳國因此頗為不滿，對齊國的態度，也有惡化的趨勢。管仲大約是運用了外交的手腕，纔把這兩個國拉攏住了。齊桓公十九年的夏天，齊、魯、宋、陳、鄭五國的君主又在幽地結盟，暗淡了將近十年的齊國的霸業，這纔重新振作起來，趨於穩定。周惠王看到齊國的號召力已經恢復，成為諸夏列國中唯一能做領袖的國家，於是在同年的冬天，派遣大臣召伯廖前往齊國，宣稱天王的旨意，正式任命桓公為「侯伯」。伯是首長的意思，侯伯就是諸侯的領袖，也就是霸主。從這時候起，齊侯的霸主資格，算是真正有了法律上的根據，桓公成為名實相符的諸侯領袖了。就在頒賜侯伯任命的同時，召伯廖傳了天

王的命令，叫齊桓公去討伐衛國，聲問他援助王子頹的罪狀。齊桓公當然聽從，過了年之後，就調動軍隊，直趨衛國，大戰一場，把衛國的軍隊殺得大敗，一直追到首都。衛侯只得遣使請和。齊桓公正顏厲色的數說衛國的不是，並着實責備了一番。衛國本來理虧，又加打了敗仗，只有低頭認罪。齊國這一次的舉動，十分冠冕堂皇，總算是彌補了不久以前周室變亂時未曾有所表示的缺憾。

管仲



五八廿

第六章 齊國霸業的全盛期上——攘外

齊國正式取得了「侯伯」的名號之後，管仲一手導演的霸政也就隨着大大的展開。可是那時野蠻部族對於諸夏集團的威脅，已經是很大了。先說那南方的楚國，在西周的時代已經很強，控制了整個的漢水流域，勢力一天天向北發展。周平王東遷之後，也在如今河南省南部的申、呂等國布置防線，準備抵擋，卻沒有什麼效果。南方那些接近楚國的小國，不是被它打敗，就是被它滅掉，統統對它屈服。就在齊國開始經營霸業的時候，楚國仍是不斷的向北侵略，接連吞滅了申、息、鄧幾個國家；又曾攻破了蔡國的郟城，把蔡侯活捉了去；並一度攻擊蔡國東南方的黃國；他的兵力，向北一直伸展到鄭國。這樣子，不但諸夏集團的南部大部淪陷，就連中原腹心之地，也直接感到威脅。在短短的六七十年期間，這南方的異種文化部族的勢力，竟從漢水流域發展到淮水流域，更推進到黃河流域了。當齊桓公五年召集北杏那次集會，蔡國也曾參加；可是自從息國

滅亡之後，他深感到楚國的可怕，再也不敢參加北方的國際會盟。那時齊國的力量還不夠充實，所以也就沒法對付。等到鄭國受到攻擊，局勢已是十分嚴重。幸而楚國的文王死去，國內起了變亂，成王即位之後，先要安定內部，暫時停止向北進攻，諸夏集團算是得以暫鬆一口氣。過了十二年以後，就在齊桓公奉了天王的命令討伐衛國的那一年，楚國的令尹子文又統領大兵進攻鄭國，一直攻進了鄭國的都城。齊侯聯合了魯、宋兩國起兵去救鄭國，楚國纔收兵回去。回去之後，就又起了一次內亂，楚國的北進因而就又停頓了幾年。

南方的荆蠻雖說暫時停止北進，北方的遊牧部族卻紛紛蠢動起來。齊桓公十年，他們曾襲擊魯國；十六年的冬天，又曾侵犯曹國；十八年，又同魯國打過一仗；活動的規模雖然都不很大，可也看得出他們是日益猖獗。到了桓公二十二年，北方的燕國又遭受山戎的侵擾，自己抵抗不住，求救於齊。齊桓公既是霸主，自然「義不容辭」，於是決定進兵討伐。他先和魯莊公會晤一次，商討用兵的策略，隨後就出動大兵向北遠征。山

戎抵敵不住，跑往深山裏去。齊兵跟蹤追趕，爬山越嶺，一直打到孤竹國，就是現在熱河省的東南一帶山地，山戎纔算屈服。後人傳說「老馬識途」的故事，就是出在這一次的遠征。據說在追擊山戎的時候，因為山嶺重疊，大軍迷失了路途；管仲叫放一匹老馬在前面引路，軍隊跟着馬走，居然走上正道了。齊桓公大獲全勝，奏凱而歸。燕君十分感激，親自送他，依依不捨，不知不覺，早已走進了齊國的國境。桓公說道：「依照周王的禮法，諸侯彼此相送，是不能出境的。我不應該錯了禮法」。就把燕君進入齊國之後所走過的那一段地方割給燕國，算是燕君不曾越出自家的境界。並且告訴燕君，要恢復燕國開國君主召公當年的治國方式，要向周天王按時進貢，謹守臣禮，像周朝初年成王和康王的時候那個樣子。齊桓公這一番舉動，比起實踐對曹沫的諾言那次，更是聳動聽聞，天下諸侯知道了以後，對於齊國更生好感；桓公霸主的聲望，也就越加增高了。

遠征山戎歸來之後，齊桓公會派遣使人帶了一部分俘虜前往魯國獻捷。關於這事，

後人也有一段傳說：齊桓公在遠征之前，曾邀魯莊公會談，據說是要求魯國一同出兵。魯侯沒有答應。齊桓公得勝回來之後，就要攻打魯國；管仲不以爲然，他說：「剛剛遠征回來，就又對鄰國用兵，不是做霸主的作法。如今從山戎那裏得來許多的寶器，都是中國不經見的東西，我們可以把一些寶器送給魯國，只說獻給周公的廟裏，這就等於向魯國示威，結果一定會使他服從我國的」。桓公依計而行，魯國果然害怕。後來齊國討伐莒國，魯侯得知之後，立即調發全國的壯丁，前往會師，正如管仲所料。據說孔子後來提起這件事，還稱贊他的作法是「轉禍爲福」，「以德報怨」呢！這段傳說是否確實，自然是很難說；不過依照當時的禮法，諸侯對夷狄作戰得到勝利，就把戰利品獻給天王，天王拿來警告四方的野蠻部族；但諸侯彼此之間卻不應當贈送俘虜。齊桓公正在極力講求禮法，如果不是別有用意，應當不會犯這種錯誤的。下一年的春天，魯國派人到齊國修築管仲私人封邑小穀城的城垣，也是要討好齊國的意思。從這種方面推測，上面所記的那種傳說，也許不是完全出於虛構。

齊桓公討伐山戎既然得到了勝利，就想轉面對付南方的楚國。他計畫邀請各方諸侯集會，商議進兵。就在這一年——桓公二十四年——的年底，太行山一帶的狄人忽然蠢動起來，侵犯邢國，形勢極為嚴重。諸夏各國的視線一時集中於北方，抵抗楚國的計畫也就因而暫時擱起。

抵制夷狄，本是管仲的一貫主張，這次狄人內侵，他自然不肯坐視。在齊國君臣集議的時候，大家議論紛紛；他對桓公說道：「戎狄的人，好比豺狼一般，貪得無厭，是沒有法子能夠使他滿足的。諸夏各國，彼此親近，算是一家，一國有事，別的國家不應袖手旁觀。安逸雖是人人所好，但卻如同毒藥，萬萬對它留戀不得。我們現在只有出兵援救邢國，纔是上策」。桓公聽了管仲的話，立即出兵。那時狄人已經退了回去，邢國暫時轉危為安。狄人雖然退去，卻沒有吃什麼虧，氣餒依然很盛，北方的威脅並沒有解除。過了一年之後，他們果然捲土重來，兵勢比上次還要凶猛。這一次的攻擊目標，卻是黃河北岸的衛國。衛侯懿公恰好是個荒唐的君主，一般臣民平時對他原就不甚愛戴，

懿公
在陣

所以這番出兵禦敵，士氣十分消沈。雨下的軍隊在葵澤地方遇上，廝殺起來。無精打彩的衛軍，那裏是生龍活虎一般的狄人的對手，只被殺的大敗虧輸，差不多全軍覆沒。衛懿公不曉得戰場上的利害，身陷重圍之中，仍然不去掉車上插的帥旗，目標始終暴露，所以吃了大虧，他自己也死在亂軍之中。衛國的敗兵逃回首都，聲稱狄人就來攻城；城中的貴族和一般居民只嚇得魂飛魄散，走得動的，一齊向東南方逃走，心想渡過大河，纔會安全。狄人到了首都，早已無人防守，毫不費力，就進了城，衛就算是亡了。狄人洗劫了全城之後，還不肯罷手，跟蹤追上前去；一路之上，把衛國的難民衝了個七零八落，直追到大河的西岸。衛國的人民一時不能渡河，只好硬着頭皮，回身拚鬥。這般難民已是驚弓之鳥，又沒有經過組織訓練，怎能抵得住狄人的鐵騎；廝殺的結果，自然又是敗了。正在危急的時候，宋國派來的救兵趕到，藉了黑夜的掩護，搭救了一部分難民渡過了河；沒有能夠過河的，差不多都做了狄人刀下之鬼。原來衛懿公有一個叔伯姊妹是宋桓公的夫人，這次聽說狄人侵犯衛國，就請求丈夫出兵助戰。宋軍到達大河，正趕

上衛國的難民被狄人所逼，就搶救了一部分渡過河的東岸。狄人不能渡河，也就收兵回去。宋桓公把難民集合起來，點一點數目，說來可憐！衛國當初也是一個比較很大的侯國，如今逃出的，連男帶女，只剩七百三十個人；加上河東領土的居民，也不過剛剛湊滿五千之數。懿公已經戰死，衛國不可一日無君，當時大家商議，擁立宋桓夫人的一個哥哥做了衛侯，稱爲戴公；暫時駐在名叫曹的一個小城，就在如今河南滑縣境內。新的君主雖然定了，可是衛國逃來的人，大都是兩手空空，身邊一無所有，沒法安家立業。恰好這時齊桓公派了公子無虧，帶領着三百乘兵車，三千名甲士，前來防戍衛國，並且隨軍帶來四疋馬和五套祭服，送給衛侯；另外牛、羊、豬、雞和狗，都是每樣三百隻，還有建築房舍用的木材等等。衛侯的夫人也得到一輛坐車和細錦三十匹。虧了這一批接濟，新的衛國纔算勉強成立起來；祇是當時的局面是怎樣的可憐，情形是怎樣的狼狽，都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了。

衛國剛剛救下，邢國的災難接着又來了。狄人的騷擾越來越大，打破衛國之後，轉過頭去，二次又攻擊邢國。邢國的首都，就是現在河北省的邢台縣城，距離太行山本來不很遠，最受山中狄人的威脅；兩年以前，已曾吃過狄人的苦頭，跟着看到衛國遭了蹂躪，情形十分淒慘，一提起狄人，個個膽戰心驚，那裏還敢對陣？遠遠望見塵土飛揚，知道狄人的騎兵就要到來，全軍立刻潰散，各自逃命；首都再沒有半個兵士守衛，輕輕的又陷落在狄人的手裏。齊桓公先已聽到狄人進攻邢國的消息，立即派人帶兵，聯合起宋、曹兩國的軍隊，前往救援。邢國的潰兵迎着聯軍，一齊投奔了去。聯軍救下潰兵，還是一直向前，攻擊狄人。狄人本來無意占領城郭土地，只把城中的房舍盡情焚毀，器物搶掠一空，並不戀戰，就又退回山裏去了。聯軍趕走狄人之後，收集了許多器物。可是邢國的首都，經過這次破壞，已經殘破不堪；同時邢國的君臣上下，懼怕狄人到了萬分，首都距離狄人的巢穴太近，再也不敢居留下去了；因此三國的軍隊就替邢國把首都遷移到濟水西岸一個名叫夷儀的地方。夷儀在現今山東省聊城縣的西南方，那塊地方當

狄人打

邢國

邢國

夷儀

時也是屬邢國的。封建時期的國家，領土不一定是一整塊，往往有零星的部分散在遠方各地，夷僮的情形正是如此。那塊地方就在齊國的左近，齊侯正是霸主，把首都放在那裏，在邢國人的心理上，自然會生安全的感覺。三國的軍隊把在故都收集的器物掃數交還邢國的人，沒有私自留下分毫，並還替他們修起了新都的城垣。一切安置妥當，然後開拔回國。這一次的舉動，總算是十分漂亮。

邢國總算是安置好了。衛侯駐在曹城，原是一時之計；故都已經殘破，既然不能搬回去住，終究要另建起一個新的纒行。就在替邢國遷都的第二年的春天，齊桓公邀集了幾路諸侯，共同派人替衛國在曹城附近一個名叫楚丘的地方建起一座新城，作為衛國的新都。以楚丘作為根據地，新的衛國慢慢又長大起來。後人記述這一段事蹟，形容兩國人民的歡快情緒，說道：「邢國人遷到新都，好像回了家似的；衛國的人也忘記了亡國的悲慘」。總算起來，齊國以霸主的資格，救濟了邢、衛兩國，而且是全始全終，不能不說是表現了領袖國家的風度。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講，卻沒有能夠用武力壓倒敵人，給

它們一種膺懲，擊退它們的攻勢，進而壓迫它們向後撤退，反而是諸夏集團的勢力範圍向內退縮，祇在防禦上面打主意，實在說不上是怎樣的成功。十年之後，幾路諸侯還替衛國首都楚丘城修築了一個外郭，仍是爲了防備狄人的襲擊。狄人始終不時前來騷擾，諸夏的人懼怕這種遊牧部族的心理，一直沒有改變。可是也正爲了這個理由，使我們更加認識攘夷的政策在當年是怎樣的必要和正確了。

邢、衛兩國遷都以後，北方暫時平靜下來；管仲不肯放鬆時間，接着就籌畫對付南方的楚國。前面說過，齊桓公二十四年，曾有邀集諸侯會商伐楚的計畫，因爲狄人的出動，暫時擱起。那時楚成王在位已有十年，年歲已長，內部的力量也已充實起來，又開始向諸夏各國攻擊，繼續推行歷代相傳的「北進」的國策。楚國的勢力，已經到達現在河南省的中部；首當其衝的，就是鄭國，所以鄭國就成爲楚國進攻的目標。從齊桓公二十七年，楚國接連三年進兵攻鄭，形勢很是緊張；齊侯也就接連三年約會諸侯，協謀

應付的辦法。二十七年參加會盟的，除去齊國之外，有魯、宋、鄭、曹、邢幾個國家，集會的地點是屬於宋國的榘地，在現今河南省淮陽縣的西北方。以後的兩次盟會，同盟的則都是齊、宋、江、黃四個國家；第一次是在宋國的貫地，第二次是在齊國的陽穀。江、黃兩國因為鄰近楚國，一向服從楚國的命令，如今居然接連很遠的跑來北方，和霸主結盟，不顧楚國的責難和威脅，足見它們對於齊國非常信賴，這不能不說是齊國在外交上面的成功。在第二次的會上，齊侯宣布了討伐楚國的計畫。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楚軍又威臨鄭國。鄭文公看到連年獨力抵抗楚國，損兵折將，全不見霸主出兵相救，心中未免有些懊喪，有意對楚屈服；但結果仍然聽從了大臣的勸諫，沒有真做出來。管仲也知道不能再延宕下去，好在北方諸國大體上都已歸到齊國的旗幟下面，連那遠在南方的江、黃兩國，也都從楚國手裏拉了出來，諸夏各國的團結，已經在齊國的領導之下實現了。這種情形，是多年以來所未有的，這正是向夷狄部族示威的絕好時機。管仲是何等聰明的人，豈能把它空空的放過？於是就在桓公三十年的歲首，出動了南征的大軍。

參加這次遠征的，除齊國以外，還有魯、宋、陳、衛、鄭、許和曹，乃是八個國家的聯軍，浩浩蕩蕩，向南進發。那時蔡國正在傾向楚國，離開了諸夏集團，它的領土，又是形成楚國的前衛，因此八國聯軍就首先向它進攻。蔡國本是弱小，當然不能抵敵，真好比泰山壓卵，立即全國崩潰。南征軍輕輕取了蔡國之後，並不停留，跟着就向楚國推進，闖入了它的疆界。楚國多年以來，利用北方國際的混亂局面，向北蠶食，每戰必勝，早已不把諸夏各國看在眼里，這一次沒有想到這些國家居然團結了起來，而且採取攻勢，軍隊開進了自己的大門，聲勢浩大，非同小可。楚成王雖然爲人凶暴，卻也不免有些膽怯，不敢立即出兵迎敵。他派了個使人前往聯軍的統帥部，晉謁齊桓公，探察情勢。會面之後，使人問道：「你們住在北邊，我們住在南邊，千里迢迢，彼此原沒有關涉的，沒有料到你們如今跑到我們這裏來了。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倒要明白一二」。使人的說話，十分狡猾，顯然表示楚國一向是安分守己的，卻把一項侵略的帽子送給齊侯。管仲在旁聽了，向前一步，代替桓公答道：「當初周朝開國的時候，太保召康公向

我國先君太公宣示天王的命令，說「給你特權，天下四方的諸侯，無論那個，如果犯了過失，你可加以膺懲，永遠輔佐王朝」。同時更指定了我國先君的支配範圍，東面直到大海，西面以到大河爲限，南面到穆陵，北面到無棣，在這個區域以內，齊國可以代替天王管制一切。你們楚國不遵規矩按時向王朝納貢，實在是有虧禮法。天王舉行祭禮的時節，缺少包茅一項，那件用品的供應，原是你們的責任。我們如今就是來向你們徵取這項貢品的。除此而外，當年昭王南巡，一去不返，究竟是怎樣死的？我們也要問個明白」。管仲這一番話，真算得義正辭嚴。可是楚國使臣的辭令，也很得體。他說：「多年沒有依照規矩進貢，確是楚國的不是，自當唯命是聽。不過昭王南巡，是溺死在漢水裏的；那段地方，當時卻不屬楚，楚國當然不能負責。你如一定要追究，就請到水邊去打聽罷！」話裏面有梗有硬，很是難聽。管仲知道楚國一向是強梁蠻橫，絕不會隨隨便便就向人低頭的，於是稟命齊侯，下令向前進兵；到達名叫涇的一個地方，就是現在河南省鄆城縣的南邊。楚國多年以來就是強國，在它的國境之內，聯軍不敢輕軍疾進，只

是一步步試着向前移動；到達陘地之後，又暫時停下，靜等楚國方面的反應。楚國雖然不弱，卻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大的陣勢，不敢遽然出兵迎戰，只是保着險要地點，採取守勢。雙方相持不下，不覺已是進了夏季。

楚成王見聯軍始終沒有退兵的樣子，就又派遣大臣屈完前赴齊侯軍前，接洽和議。當時的封建社會的習慣，一切都是講求禮法的；楚國既然出頭求和，齊侯爲表示禮貌，也就命令大軍稍稍後退，駐紮在召陵，就在現今鄆城縣城的東方。齊桓公想向屈完顯示顯示聯軍的軍威，在精神上給他一種壓迫，於是一聲號令，全軍齊起，擺成陣式，操演起來，卻帶了屈完一同觀看。一時車馬轉動，將士奔走，忽進忽退，或分或合，一個個威風凜凜，動作整齊，陣法變化無窮，令人眼花撩亂，真個是洋洋大觀。桓公指着他的隊伍，對屈完說道：「帶了這樣的大軍去打仗，有什麼人能夠抵擋？用這樣的軍力去攻城，任憑他怎樣的堅牢，還有攻打不破的嗎？」屈完答道：「君侯如果拿仁德道義來對待天下諸侯，那個敢不服順？如果只講武力，那麼楚國雖然不敢稱強，卻可以把方城山

來當作城垣，把漢水來當作壕溝，君侯縱然是兵多將廣，也還夠攻的呢！」這幾句話說的非常有力，楚國倒底不肯完全服輸，不過當時聯軍的聲勢雖然壓着了楚國的氣餒，究竟還不能夠打敗楚國的軍隊。楚軍既是不肯接戰，聯軍長期頓在那裏，總不是個辦法，而且極爲危險。反正出兵的目的，是在對楚國示威；如今楚王既然派來使臣求和，聯軍方面總算占了上風，就此收場，要算是上策。於是齊侯答應了楚國的請求，並且更進一步，和楚國締結盟約。屈完代表楚王，和齊桓公等八路諸侯，就在召陵地方舉行訂盟的儀式，楚國在表面上算是依從了諸夏集團。這就是有名的「召陵之盟」，也就是諸夏集團多年以來揚眉吐氣的一次對外勝利。所以魯僖公歸國之後，造了一所宗廟，大臣們替他做了一篇祭詩，當中有幾句，就是說的這次示威的成功。詩曰：

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丞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敢我承。

諸夏各國許多年來因爲內部紛擾不休，受盡野蠻部族的多少欺侮；如今大家團結起來，

居然能向敵人示威，迫使他們低頭，當然是一樁值得誇耀的事。魯國人的祭詩，很可以代表當時諸夏的一般情緒。

「召陵之盟」這一齣大戲，唱了個滿宮滿調，卻不料最後續上了一段使人不大愉快的尾聲。盟事已畢，聯軍準備班師北返；那時有一個陳國的大夫轅濤塗隨在軍中，想到了本國是大軍必經之路，辦理起給養來，不免要大大破費；因為鄭國也是同一情形，他就找到鄭國的一個大夫名喚申侯的，把這番意思告訴給他，並且說：「我們可以向霸王建議，大軍改取東路，順便向東方的夷族示一示威，然後沿了大海回國，豈不是一舉兩得？」申侯點頭贊成。轅濤塗就把這個計畫獻給齊侯，桓公很以為然，就答應了。那裏知道申侯是個專門撥弄是非的小人，他轉身去見桓公，說道：「轅濤塗的話，萬萬聽不得！我們的軍隊在外很久，已經疲乏不堪，萬一東方路上遇到敵人，打起仗來，恐怕沒有多少把握，那時豈不是前功盡棄嗎？還是走陳、鄭一線的大路妥當。一路的給養，有

他們兩國供應，也是很方便的」。桓公聽了這話，覺得果然有理，知道轅濤塗專為本國打算，全不顧及大軍的安危，不禁大怒，立刻下令把他拘禁起來，並且宣布陳國不忠於團體的罪名，指令魯侯帶兵同了江、黃兩國的軍隊去討伐。也許是這一次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同年年終的時候，除陳國以外，所有參加南征的七個國家一齊出兵，指向陳國。陳國只有低頭認罪，表示完全屈服，各國這纔罷兵而歸，禍首轅濤塗也放回本國；一場風波，纔歸平息。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兩點來：一點是當時諸夏各國的團結，雖然能夠表現出很大的力量，但是各國對於結盟的必要，仍然沒有認識清楚，各打各的主意，談不到的一心一德，精誠無間；霸主的聯絡領導工夫，實在不容易做。再一點是齊國方面極其重視團結，對於破壞團結的分子絕不輕饒，所以連着兩次對陳國用兵。陳是一個小國，殺雞原不需要牛刀，可是齊國一定拉了所有參加南征的國家一同與師問罪，正是爲了表明破壞團結是怎樣一樁嚴重的事體。越是大家同床異夢，越是表示領導團結是怎樣的困難，也越是證明建立霸權並非輕而易舉，而是需要一個意志堅決和手段高明

的政治家來完成的。

必
桓公

桓公

夫

哀姜
桓公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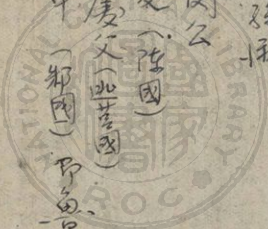
仲孫秋
大夫

文公

友
(陳國)

慶父
(北莒國)

申
(邾國)
即魚台侯公



第七章 齊國霸業的全盛期下——安內

周朝的封建制度原是建立在家族精神上而的，天下諸侯彼此有如一家，周天王就是這一個大家族的首長。盟主在諸侯當中，是居於代理家長的地位。他的責任，不止於是應付外來的困難，而且須要解決家庭內部的糾紛；諸夏各國國內如果發生什麼變亂，盟主應當出面干涉，設法恢復秩序。在霸政的前期裏，齊國也曾邀同幾路諸侯平定了宋國的內亂，不過那次還只是一個形式；宋國的亂黨已經由本國的人消滅，齊國不過聯合起幾個國家正式承認宋國的新君，在精神上予以支持罷了。那一次舉動的用意，除了藉以表現盟主的威嚴外，也是要乘這機會降服住宋國，減少建霸的阻力。真正替別的國家解除內部的紛亂，還要算對魯國的那一次做的比較漂亮。

那是在狄人第一次進攻邢國的時候，魯莊公去世了，幾個貴族爭奪政權，公子慶父指使人刺殺了太子；那一力擁戴太子的公子友，逃往陳國。魯國的新君閔公不敢信任慶

父，請求齊桓公出面，叫公子友回國執政。桓公答應了閔公的請求，並且派遣大夫仲孫湫聘問魯國。仲孫湫從魯國回來，對桓公說，依他的觀察，慶父是個禍亂的種子，他一天不死，魯國也一天不會安定的。魯國本是東方的大國，莊公又是一個相當有才幹的君主，齊桓公當初創霸的時節，最感覺難於對付的就是他；後來莊公雖然放棄了反齊的態度，可是對於霸主，始終不大心悅誠服。這時莊公死去，國內政局不定，潛伏着很大的危機，桓公頗有意思利用這一機會，把魯國滅掉，也算了卻一大心學。仲孫湫認爲不可輕動，還是相機替它平定內亂，纔是正理。桓公聽了他的話，纔把原意打消。果然過了沒有多久，慶父又謀害了魯閔公，公子友帶了莊公的另外一個兒子名叫申的逃往邾國。慶父也因為國內的空氣對他不和，逃到莒國。他走了之後，公子友卻又轉回來，擁立公子申即位，就是魯僖公了。公子友派人同莒國交涉，請求解送慶父回國治罪；慶父在半路上自殺了，禍根纔算除去。這時齊國派遣上卿高侯前往魯國，代表霸主同魯侯結盟；僖公的地位因而穩定，國內兩年以來不安的局面，於是也告結束。魯莊公的夫人哀姜，

本來是齊桓公的妹妹，這幾次政治上的陰謀，都有她參與在內；僖公即位之後，她心中害怕，逃往邾國。桓公爲了表示霸主的正直，派人前往邾國把她接回，一進到魯國的境內，就殺死了她。這一次平定魯國的內亂，總算是做的極爲得體。自此以後，魯國纔完全依隨了齊國，成爲諸夏集團當中的中堅分子，這是以前的話。

惠王
右
叔
世
節

自從聯軍南征歸來以後，齊國的霸主地位更形鞏固，齊桓公的威望又提高了許多。剛剛這時，王室內發生了一樁事故，又給霸主一個絕好的機會。原來周惠王因爲寵愛後妻，自然也溺愛後妻所生的兒子，就想廢黜太子，改立幼子太叔帶作自己的繼承人。這件事是違背禮法的。齊侯做了霸主，一向是標榜維持禮法的，既然以尊王爲號召，當然不肯讓天王做出不合禮法的事來。不然的話，天王的偶像在天下諸侯的心目中，就會發生動搖，那對霸主的面上，也將減少光采，霸政跟着也就要不易維持了。爲了這個問題，便由齊國出面，聯合了魯、宋、陳、衛、鄭、許、曹七國，一共是八國的君主，齊

築在衛國的首止地方，邀請王朝的太子相會，當着太子面前，八國訂結同盟。這樣做的用意，是表明天下諸侯已經認定了現在的王太子爲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不容隨便廢黜；暗示給惠王，叫他打消原來的念頭。惠王對於這次齊國的舉動，極爲生氣。他知道鄭國和齊國的感情一向比較淡薄，鄭侯又是世襲的王朝卿士，和王室的關係本很密切，於是私下派遣宰孔去對鄭文公說，由天王作主，鄭國可去和楚國親近，再拉上西北上的晉國幫襯，楚、鄭、晉三國聯結起來，就能抵制住齊國；那時鄭國就不會感受齊國的壓迫，又免去了楚國的侵犯，可以安如泰山了。鄭文公聽了這一番話，覺得很有道理。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也使他對齊國發生惡感。原來在上年南征回來，齊桓公因爲申侯獻計有功，將鄭國的虎牢地方賜與他作采邑，鄭文公本就不大高興。這一次諸侯在首止集會，恰好申侯和陳國的轅濤塗都隨在會所；轅濤塗懷恨在心，想法報復申侯，他假作不知道申侯說過他的壞話，只當舊友重逢，閑談起來，就勸他好好修築虎牢的城池，將來留給子孫，作爲光榮的紀念。申侯聰明一世，這次卻着了道兒；轅濤塗又幫了他向齊侯

請求疏通，果然成功。這時韓濞塗卻私下裏去見鄭文公，對他說道：「申侯加意修築他的私邑，必是不懷好意，應當注意他些！」鄭文公見申侯本是自己的臣屬，卻一味巴結霸主，顯然不把自己看在眼里裏；虎牢又是個有名的險要所在，如果建築起堅固的城堡，對於鄭國就形成了威脅；想到這裏，越覺得齊國可氣，於是不聽大臣的勸阻，決意背叛齊國。那時赴會的諸侯，都帶領着有本國的護從；結盟的儀式眼看就要舉行，他不敢公然領了本國的人馬離開會所，於是自己私下裏逃回國去。這一種舉動，當然使霸主很難堪；大概是爲了避免同天王直接鬧起意見，事情不好處理，當時齊國方面並沒有作何表示。可是到了第二年，齊國就聯合了魯、宋、陳、衛、曹五個國家討伐鄭國。這時楚國因爲連同鄭國聯爲一氣，就出兵進攻鄭國南邊的許國，以爲鄭國聲援。諸夏聯軍果然捨了鄭國，去救許國，比及趕到，楚兵已經退去，聯軍也只好轉回。這次出兵，算是沒有什麼結果。

過了沒有幾個月，齊國又單獨出兵，攻打鄭國，一定要顯一顯霸主的威嚴。鄭文公

覺得齊國倒底是不能得罪的，於是派人到軍前請和，把罪過一籠腦推在申侯身上，只說都是他從中挑撥是非，致造成誤會，如今把他殺死，禍根已除，從此以後，鄭國仍舊服從霸主的命令就是。齊國見鄭國已經表示屈服，也就不問其他。爲了明白試驗鄭國的誠意，就在這一年——桓公三十三年——的秋天，齊國邀集各國在現今山東省魚台縣的北邊，當時名叫甯母的一個地方結盟。鄭文公終是三心二意，自己不去赴會，只派了他的太子名叫華的代表出席，其餘應邀到會的，還有魯、宋兩國的君主和曹國的太子。到得會上，管仲對桓公說道：「古人說過一種道理：要想領導旁人，須從禮節方面着手；要想遠方的人傾向自己，須在仁義方面下工夫，人家纔會懷念自己，心悅誠服。如果在這兩方面有所表現，自然沒有不歸心的。」桓公很以爲然，一切都依禮而行，以身作則，到會各國應當給天王進貢的物品，都由齊國代爲預備，這樣一來，果然皆大歡喜。鄭國既然派了太子到會，表面上總算又服從了霸主的領導；不過在這一次會上發生了一件事，卻使鄭文公真正傾向了齊國。原來鄭國的太子華，是個不安分的人，他和國內貴族

洩氏、孔氏和子人氏三家一向沒有好感，三家的勢力強大，總是和他爲難；這次他想利用機會，巴結上霸主，借刀殺人，替自己除去禍害，他私下對齊侯說，鄭國這次背叛齊國，都是他們三家的主意，如果齊侯強迫鄭國除去了三家，將來他拿到政權之後，一定誠心誠意追隨齊國，唯命是聽。他說這話，分明是想讓齊國壓迫文公去位，由他來做鄭國的君主。齊桓公一向對於鄭國不大放心，但也沒有好的辦法；現在聽了太子華的話，認爲是一個徹底制服鄭國的絕好機會，就想答應了他。可是管仲卻大不以爲然，他說：「主公身爲霸主，領導天下諸侯，標榜的是『禮』、『信』二字。從禮的一方面來說，做兒子的不許對自己的父親弄什麼陰謀；從信的一方面來說，代表國家出來辦事，應當謹守君主的命令；如果這兩方面都違犯了，就是叛國，那真是莫大的罪惡。主公如果答應他的請求，就是獎勵違禮背信的罪惡行爲，落得個言行不符，有始無終，豈不要失掉天下諸侯的信仰？這事是萬萬做不得的！」齊桓公道：「鄭國有心脫離諸夏集團，我們始終沒有想出一個徹底解決它的辦法，如今乘了他們內部不合的機會制服了它，豈不是

好？」管仲道：「主公如果表示出仁德的懷抱，再加上充足的理由，聲述鄭國的罪狀，然後率領諸侯的大軍，堂堂正正的前往討伐，那時鄭國自知理屈，實力又弱，豈敢抗命不服？如今利用它國的叛國奸徒來擺布它，它理直氣壯，再也不會屈服的。還有一層，我們邀請諸侯會盟，是以德義為主，如果參加了一段奸險的陰謀進去，又怎好昭示我們的後代子孫？每次諸侯的盟會，一切經過，各國的史官都要記載下來的；如果把公子華這樣的奸徒記入史冊，豈不是霸主的污點？依照史官的規矩，有事就要記載，不問是光榮還是罪惡，如果我國的史書上故意不記這件事情，那就是違犯了史官的規矩，也是有損於主公的盛德的。從各方面來考慮，都是不妥當的。主公還是不要答應他的請求！鄭侯將來得知這段事由之後，他一定會從心折服，俯首聽命的。像太子華這樣奸險狠毒的人，身爲一國太子，爲了鞏固自己的權位，想藉了強國的壓力削弱自己的國家，他絕對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鄭國現在正有賢臣輔政，一時是不能征服它的。」這一番話終於把桓公說服。太子華碰了一個釘子，滿懷熱望，卻像澆了一頭冷水，無精打彩的轉回

國去。過了沒有多久，這段情節就傳到了鄭文公的耳朵裏；鄭文公果然甚爲感動，就決心歸服，派遣使人前往齊國，請求結盟。就在這同時，周惠王死去了，改立太子的事沒有得到結果。王子害怕弟弟太叔帶和自己爭位，不敢立刻發喪，卻暗下派遣心腹趕往齊國，向桓公討主意。那時正是桓公三十三年的年終，過了年之後，齊侯邀請魯、宋、衛、許、曹、陳六國的君主，就在曹國屬下一個名叫洮的地方結盟；王朝的代表同時出席，鄭文公也趕來請求參加，表示重新歸順了諸夏集團。在這次的盟會上，大家正式宣布擁戴王太子繼承王位。會罷之後，王朝代表轉回洛京，傳達了諸侯的意思；太叔帶一黨的人聽了，也就不敢再動。王太子好像吃了定神丸，安安穩穩登上了天王的寶座，就是周襄王了。齊桓公這一次以鮮明的態度支持王太子，使他能夠繼承了王位，周室的禮法得以不受侵毀，這一舉動，說得上是堂堂正正、磊落光明，要算是霸政史上極光榮的一頁。同時多時以來反覆不常的鄭國，也因了齊國的正直態度而真心依隨了諸夏集團，這也是霸主的一大成功。齊國的霸主地位，因而達到了空前的鞏固地步。

再過了年，就是齊桓公在位的第三十五年，齊國的霸業正是紅日中天，桓公本人也已有年歲，想到自家平生的事業，也自有些躊躇滿志的樣子。他想召集一次大會，大擺一場場面，出出風頭。那一年的夏天，選擇了宋國屬下一個名叫葵丘的地方，就在現今河南省考城縣的東邊，作為集會的地點。到會的除了齊國以外，還有魯、宋、衛、鄭、許、曹六國，一共是七路諸侯。周襄王感念齊侯的好處，也派了宰孔前往，并且傳達旨意，把方纔祭祀文王和武王用的胙肉賜與桓公。桓公就要走下階去禮拜，宰孔卻忙擋着他，說道：「旨意還沒有宣達完呢！天王命我致意，說是伯舅的年紀大了，加賜一級，不必下拜！」「伯舅」是當時天子對於異姓諸侯的稱呼；不讓桓公下拜，乃是襄王有意擡高他的身分，藉以表示自己對他的感謝的意思。桓公那時得意忘形，倚老賣老，就要聽了宰孔的話，不行拜禮。管仲在一旁忙對他說：「這使不得！還是要依禮而行！」桓公聽了，醒悟過來，連忙答道：「天威不遠，就在面前，小白怎敢貪受天王的

恩命，廢棄下拜的禮節呢？」說了之後，疾步下堂，面對上方，恭恭敬敬行了拜禮，然後走上堂去，接受賜儀。他這一番做作，博得各國諸侯人等的稱贊，都說霸主果然是知禮守法，半點不肯含糊，稱得起是諸侯的典型。這次的會，總算開的十分圓滿。

就在同年的秋天，齊侯又約會了諸侯再到葵丘，舉行結盟的儀式；周天王又派宰孔前往監臨。這次的盟約上面寫着：「所有參加這項同盟的國家，即使有的彼此之間有過什麼誤會，經過這番結盟之後，大家要言歸於好！」依照通常結盟的儀式，是要殺一頭牛，把同盟書一齊埋在地下的；這次爲了表示與一般的結盟不同，只把那頭牛陳放在前面，卻沒有殺。會場上的空氣，好像也確是同往常有些兩樣，瀟灑着一團和氣。儀式行過之後，齊桓公以霸主的資格，當着各國諸侯鄭重申明周天王的禁令五條。那五條：一是不可壅塞水流，二是不可囤積糧穀，三是不可更換嫡子，四是不可把侍妾扶作正妻，五是不可讓婦女參預國家的政事。爲什麼要申這五條禁令呢？這有一一說明的必要。

先說壅塞水流，原來當時諸夏各國的經濟，前面說過，係以農業爲基礎的。農田不

能離開了水，可是天上落雨，沒有一定的時候，自然也不會完全適合於農田的需要；北方的天然河流又不太多，所以農民對於河水的利用，極爲重視，並且還到處挖掘了許許多多的溝渠，導引河水灌溉農田。當時的一般侯國，境土都是很小的，往往一條水道穿過幾個國家。像這樣的情形，如果上游的國家把水流截斷，下游的國家就要沒有水用，這是很顯然的。上游的國家壅塞水流，有的時候是純粹爲了經濟上的原因，只管自家用水方便，卻不顧計到別家的苦惱和損失，可也有的時候是由於政治上的動機，以此爲手段來向下游的國家施用壓力，強迫他人順從自家的意志。不管是爲了什麼緣故，這種行爲總歸是很容易引起國際間的糾紛。如果雙方都是私心太重，互不相下，同時上面又缺少一個主持公正來替他們排解裁判的人，結果勢必至於演成武裝衝突。當時諸夏各國彼此之間所以時常發生戰爭，這壅塞水流也確實是主要原因之一。霸主是以諸侯的領袖自居的，他以諸夏文化集團各國互相聯合作號召，自然要儘力設法避免各國彼此之間的爭鬥，所以特別用了天王的名義來標出這一條禁令，爲的是解除國際糾紛的一個因素。

再說國積糧穀，意義也同壅塞水流相仿。當時的社會經濟組織，還很簡單，各地在大體上都是自給自足的狀態，交易並不太發達，人民的生活，主要的是依賴自家的糧食的生產。不過農業是要靠天的，各地的天時，並不一致，所以田地的收成，也就有好有壞，而且是年年不同。最合理的辦法，乃是豐收的地方把多餘的穀子接濟歉收的地方，有無相通，彼此互助，大家就都能免去饑荒的威脅。可是事實上常常恰是相反，一般侯國大都是各自為謀，遇到豐收，把多餘的穀子囤積起來，準備自家荒年食用，不管旁的國家鬧饑荒。這樣做法的結果，勢必至於每年都有些地方感到缺乏糧食的恐慌；因為根據經驗，每年都有些地方歉收的，而同時另外一些國家，則又有大量的穀子白白囤在倉裏。霸主既然標榜團結，諸夏集團就應當像一個大家庭，一般侯國也就是一家人似的，自然要痛癢相關，患難相恤，不可一味自私自利，對於旁人的苦難袖手旁觀。如果各國能夠隨時互相救濟，饑荒就可以避免，大家都免去了饑荒的威脅，社會的秩序自然容易維持，國際間的糾紛也就減少發生的機會了。

至於其餘的三條禁令，則都是以家庭關係爲對象，而且是相互之間有聯帶的關係，可以合併來加以說明。本來封建制度是建築在家族關係上面的，國和家的關係往往是混淆不清。當時的社會是行多妻制的，尤其是君主和貴族，都是在正妻以外，還擁有許多的姬妾。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容易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正妻失寵，侍妾謀奪正妻的地位。當時的禮法對於嫡、庶之分看得極重，嫡是正妻所生的孩子，庶是姬妾們所生的孩子；因爲正妻的地位比侍妾高，所以庶生的孩子比起嫡生的來，地位也是下低的。每一國的君主和每個貴族的家長，照例是要把正妻所生的長子立爲自己的繼承人；嫡子的繼承權既已確定之後，沒有特殊的理由是不許隨便取消的。如果正妻沒有生下兒子，纔輪到庶生的兒子的頭上。不過事實上已經立定的嫡子，往往因了母親的去世，尤其是由於父親的某一個侍妾特別得寵，奪取了母親的正妻地位而被廢，代替他的自然是那個侍妾自己所生的兒子。廢立嫡子和更換正妻這兩樁事，大致總是聯帶發生的，中間形成了一種必然的因果關係。這種情形，雖然是違反封建社會的禮法，可是在當時很是普遍；前

面說周惠王要廢立太子的一段情節，就是一個例子。侍妾爲了謀取正妻的地位，爲了把自己親生的兒子立爲太子，自然是要聯絡黨羽，干涉政事的。這些事情，一方面容易促成內部的紛亂，另一方面也常常是國際衝突的根苗。因爲諸侯相互之間，常有姻親的關係，家庭之中發生變故，自然會牽涉到親戚的。周幽王因爲廢后，惹惱了王后的母家申國，申侯聯結犬戎毀滅了西周王朝，只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總而言之，由於家庭和女人的關係，往往釀成各國內部和國際間的糾紛；霸主以天王的名義申明這幾條禁令，卻正是針對病症、防患未然的辦法。在這一次的會上，齊侯把「尊王」的主張具體的表現了出來。到會的諸侯也都亦步亦趨，敬謹追隨，大家雍容禮讓，會場上充滿了和諧的空氣。諸夏各國真像是成了一家，在齊國的領導之下，同心協力維持原來的秩序，抵禦異種文化部族的攻擊。這就是那歷史上有名的「葵丘之會」，也正是齊國霸業的最高峯。

管仲



九二

第八章 齊國霸業的衰落

齊國雖是諸夏文化集團的領袖，不過它的勢力範圍究祇限於黃河下游一帶；洛京以西各國還不會受到它的影響。那時黃河上游比較強大的國家，一個是秦，一個是晉，都是在種種游牧部族圍繞之中。秦國距離文化中心地帶尤其遙遠，和東方各國很少發生關係，晉國則自從渡過黃河，吞併了虢國之後，已經接近中原，因此對於東方諸夏集團的活動，也漸漸注意起來。那時候的晉侯獻公，也是一個極能幹的君主，在位已經二十六年，早就聽到過多少關於齊國霸業的故事；這次葵丘之會，地點比較靠近西方，他就也趕去參加，想藉此機會瞻仰霸主的丰采，同時也觀察一下東方國際政治的形勢。只因距離遙遠，他還沒有走到，盟已結過，代表天朝出席的宰孔正好從會上轉來，兩下遇在路上。這宰孔在四年以前曾替周惠王拉攏過鄭文公，計畫背齊聯楚，另造一個政治局面，很像是一個政治陰謀家；這次雖然代表襄王赴會，慰勞齊侯，可是他那反對齊國的一貫

主張，似乎沒有改變。晉獻公向他打聽會上情形，他就說道：「你只管回去罷！齊侯不講德行，一味喜好經營四方；他北面討伐山戎，南面遠征楚國，如今又來到西邊結這次盟會，將來向東方還不知道要鬧什麼把戲呢！他現在是心高氣傲，得意揚揚，自滿的不得了，看來不會有什麼真正的作爲。反正在我們這西面，這次過去之後，料想他是不会再來的了。你還是回國，專心料理你自家的事情，纔是正經」。晉獻公知道已是誤了會期，於是聽了宰孔的話，轉回本國去了。齊和晉這兩個諸夏集團當中的大國，因爲相距遙遠，過去彼此一直沒有往來，這次本是個接觸的機會，卻又錯過去了。兩國直接發生關係，還是在一年之後。那時因爲獻公去世，晉國內部大亂，接連兩個君主被殺；齊桓公以霸主的資格邀會了幾路諸侯西征，大軍直推進到晉國的高梁地方，就在如今山西省臨汾縣的東北，壓制住亂黨的活動。這是齊國的威力向西方到達最遠的一次。那時秦國正要派兵護送晉國的公子夷吾回國，齊侯就派隰朋帶兵會合秦軍一同前往，擁立公子夷吾做了晉侯。晉國已定，然後班師而回。這是齊、晉兩國正式發生關係的開始，同時也

是齊桓公最末一次安定其他國家內部政局的舉動。

宰孔對晉獻公說，葵丘之會以後，齊侯不會再到西方，那個預言確是沒有應驗；不過他對於齊桓公的躊躇滿志的情態，卻觀察得相當準確。這位君主在位已有三十五年，年齡也已經有七十歲左右，經過幾十年的折磨和奮鬥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言出令行，威加四海，於是就漸漸的有些驕惰起來。同時因為上了年歲的關係，他的精神也確有些應付不來。那時在變化的時局，他好像是着重在虛榮上面，假想着野蠻部族的禍亂已經消除，天下從此再也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情了。其實夷狄的侵擾正是方興未艾，他們對於諸夏文化集團的威脅，不但沒有解除，並且反而越加嚴重。在葵丘之會的前一年裏，狄人曾經侵犯過晉國，那還可以說是在齊國的勢力範圍以外。結盟的第二年，太行山一帶的狄人就滅掉了溫國。溫國是直屬於王朝的一個小國，隔着黃河和洛京相對，也就是現在河南省的溫縣地方。溫國的君主蘇子，過去背叛了王朝，隨順狄人；卻又和狄人相處不來，發生衝突。狄人發兵去攻擊他；天王嫌溫國不忠，也不派兵赴救；國家就被狄人滅

掉，蘇子本人逃往衛國去了。這是王朝的領土直接遭受了遊牧部族的侵奪，可是齊國方面對於這事並沒有什麼反應。再過一年，更爲嚴重的事情發生了。前面說過，周惠王當初想立他的小兒子太叔帶做王位的繼承人，只因齊桓公出面聯結各國諸侯，一致擁戴原來的太子，所以沒有能夠實現。襄王的名位雖然已經確定，太叔帶倒底心下不服。他暗地裏同那盤據在洛京以西的伊、洛二水上游山岳地帶的戎人互相勾結，嗾使他們進攻洛京，打破了京城的外郭，把東門也放火燒毀。朝廷上下，一時頗爲慌張。按說王朝遭了危難，做霸主的應當馬上號召各國出兵救援；可是齊國方面竟然沒有聲響，倒是秦、晉兩國聯合出兵，進攻戎人的巢穴，纔算迫使他們將人馬撤回。隨後又由晉侯出面，替天王和戎人兩方調解一番，暫時停止了敵對的行爲。

襄王終究覺得太叔帶是個禍根，遲早必要除去的；過了一年之後，就拿勾結戎人侵犯王朝作爲罪名，下令討伐。太叔帶在王朝站不住腳，就逃往齊國去了。戎人原是和太叔帶一夥的，如今見他被襄王逼走，自然又恢復了原來的敵視態度，同時對從中調解的

晉侯也自不潔。一騰西方的政治形勢很是緊張，尤其是王朝的京城，隨時有受襲擊的可能。齊侯既是霸主，對於這事不能一味充耳不聞；而事實上齊國的勢力，又確是不儘支配西方；爲了勉強保持體面，只好採取一種息事寧人的政策。這一年的冬天，齊侯派遣管仲親自出馬，前往洛京，替王朝和戎人兩方進行調解；同時又使隰朋替晉國和戎人兩下說和。經過這兩位精明幹練的政治家的疏通，緊張的局勢暫時算是緩和下來。周襄王放下寬心，自然十分高興，就要依照招待上卿的禮數款待管仲，管仲是倡導霸政的人，最講求的就是遵守禮法，那肯違禮而行？他對天王說道：「陪臣雖然執掌齊國的政事，論名位卻是很低。齊國的上卿，乃是高、國二氏，他們是以前天王親加任命的，世世代代保有最高的貴族地位。假如陪臣這次領受了上卿的待遇，以後他們前來朝參的時候，朝廷又將用什麼禮數呢？陪臣萬萬不敢亂了王朝的禮法」。原來當時各國諸侯的臣屬對於天王自稱陪臣，所以管仲他自己這樣稱呼。襄王因爲自己能登王位，都是虧了齊國一力擁戴，而齊國的執政就是管仲，所以對他極力表示優待，只管叫他領受上卿的待遇，

更不顧到什麼禮法。管仲卻把持得住，任憑襄王怎樣恭維，他仍是堅稱不敢越禮，倒底以下卿的資格領受了天王的款待，然後轉回國去。他這一次堅守禮法以及他的謙遜的態度，很得到人的贊美。經過這次管仲的斡旋，戎人和王朝的衝突算是暫時停止，不過太叔帶還不會得到妥當的處置，問題仍是沒有根本解決。過年之後，齊侯派遣大夫仲孫湫前往洛京朝參天王，附帶着替太叔帶疏通，希望襄王准許他回去，弟兄二人言歸於好，這樣可以免去戎人再來騷擾，好算是釜底抽薪之計。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仲孫湫沒有把話傳到，只作了通常的朝參，就轉回國去。見了齊侯，只說天王的怒氣還沒有平息下去，看情形十年之內他是不會准許太叔帶回朝的。齊侯聽了，很是焦心，他深知道，太叔帶一天不得回朝，王朝也就一天要防備戎人的襲擊。爲了策畫王朝的安全問題，他跟着就邀請各國諸侯在衛國的鹹地集會了一次；商議的結果，由各國共同派遣軍隊去到洛京駐防。這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霸主的勢力眼看是不行了。

前面說到狄人滅掉了溫國，在黃河以北各地，他們差不多是到處橫行，十分猖獗。

過去一度曾被他們毀滅的衛國，雖然遷避到楚丘，但仍然時時受到威脅；在溫國滅亡之後，尤其感覺恐慌。就在戎人進攻洛京的第二年的春天，由齊國領頭，諸夏各國聯合派遣人夫前往，替楚丘城修了一道外郭，算是替衛國的都城加了一層保障。果然過了一年之後，狄人就來攻打；大概是多虧增築了一道城牆，總算是沒有受到多大的損失。諸夏集團對於狄人，始終是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如今的情勢更加狼狽了。

提到南方，情形也是越來越壞。當年齊桓公率領着八國聯軍南征，沒有經過戰鬥就把楚國懾服，總算是諸夏集團的一次勝利，至少在精神上是占到了上風。可是楚國的實力並沒有絲毫的損失；它那北進的野心，也不會因此而稍有收斂。召陵之盟剛剛過去不到一年，正在齊國忙着邀集首止之會的當兒，楚國就背叛盟約，出兵把弦國滅掉，弦國在如今湖北省蘄水縣的西北地方，也是一個諸夏系統的小國，因為距離中原太遠，同時鄰近楚國的勢力範圍，所以最初不敢公然追隨霸主。可是它和淮水上游的江、黃、道、

柏四個小國，慢慢的都有了親戚的關係，而這四個小國又都正和齊國要好。弦國的君主就聯想到齊國可以做自己的靠山。諸夏聯軍新近又大舉南征，對楚國示了一次威，這也給了他很大的鼓勵。於是他就改變了從來順隨楚國的態度，很顯明的親附北方集團；可是同時卻不知道自家努力充實自衛的力量，只一味夢想着遠方的支持；結果楚兵一到，全無抵禦的辦法，國家輕輕的就被滅掉，他自己也逃往黃國去了。

楚國滅掉了弦國之後，氣餒就又高張起來，把召陵的盟約完全棄置不顧，對北方的諸夏集團重新採取敵對的態度。弦國亡國的第二年，正是周惠王計畫着拉攏鄭國和楚國聯合共同抵抗齊國，鄭文公逃盟，諸夏各國起兵前去討伐的時候，諸夏集團顯示出內部分裂的跡象；楚成王認爲機不可失，立即出兵攻打鄭國南邊的許國，爲的是牽制諸侯的軍隊，使他們的視線轉移。諸夏聯軍果然捨了鄭國來救許國，楚成王倒底有些膽怯，不願同聯軍正面作戰，立即下令退兵。各國諸侯見楚兵已退，替許國解圍的目的已達，知道再向前進，也不會占到什麼便宜，便也收兵而回。雙方都有戒心，不敢輕敵。這就楚

國方面來說，倒也沒有什麼；但在諸夏方面，尤其就霸主的國家來講，卻有些丟臉。諸夏聯軍是各歸本國去了，楚國的大軍可是只退到本國的邊界上，大有相機再進的形勢。許國的君主僖公深深感覺到壓迫，同時料定聯軍既已退去，一時不會再來赴救的，眼前的禍難必須想法避免。那時蔡國仍然是依附楚國的，於是就由蔡侯帶同許僖公跑去武城——就在如今河南省南陽縣的北方，當時是楚國的大本營，在那裏參見楚成王。這一次的投降儀式，極為隆重。許僖公穿起罪人的衣服，反綁了雙臂，口裏銜了一塊玉石；隨去的許國的大夫們一個個披麻戴孝，一羣武士拖着一輛車，車上載着一口棺材，依照當時的規矩，在拜會一個生人的時候，必須同時呈獻一種東西，作為晉見的禮物。許僖公口裏的那塊玉石，就是這種禮物；因為雙臂倒縛了，不能用手來捧，所以用口銜着。車上載着個棺材，乃是表示許僖公自己承認犯了重罪，準備受死刑的處分，所以預備下棺材收斂屍體。許國的大夫們披麻戴孝，自然是替他們的君主送喪的意思。楚成王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款式，不曉得怎樣發落。還是他一個博學的大夫對他說，當年周武王征服了

殷朝，殷紂王的庶兄微子啓就是這樣表示正式投降的。武王親自替他鬆了縛，接受了他的玉石，行了一次解除凶災的禮，把車上載的棺材當場燒毀，對他本人以禮相待，叫他官復原位。武王的做法，是很得體的。楚成王果然依照這話表演了一番，把戰勝國的架子擺了個十足。可憐許國多年以來追隨齊國，雖然是個小國，卻是諸夏集團當中的一個中堅分子，如今竟落得這樣狼狽，霸主全不能加以庇護，實在是大大虧負了它。所幸許國的執政人深明大義，並不肯死心塌地依附楚國。過了不到兩年，在齊侯邀集諸侯在洮地結盟的會上，許僖公也前往出席，重新歸到霸主的旗幟之下。

可是又過了三年，也就是葵丘之會的第三年的冬天，楚國藉口黃國不去進貢，出兵討伐，黃國的執政一味信賴齊國，認定北方諸夏集團的實力優越，足以制住楚國，同時又以爲楚國的首都距離本國千里之遙，並沒有直接的威脅，因此對於楚國仍然不肯表示低頭。過了半年，楚國又派了兵攻打，齊國方面的救援不見到來，眼看黃國又走上弦國的命運，作了楚國北進的犧牲。

正在這北方的遊牧部族和南方的荆蠻國家鬧得十分猖獗的時候，東南方面又有問題發生，更替那個日形衰老的霸主國家增添了困難。原來在淮水的下游一帶，盤據着許多異種文化的部族，當時諸夏一方面的人統呼爲東夷，也稱爲淮夷。這些部族也擁有相當的實力，過去也會不斷同諸夏各國發生關係，一部分並且受了同化。在諸夏勢力強盛的時候，彼此還能相安無事；如今乘了齊國的霸業漸漸衰落，他們就又蠢動起來。

那時諸夏集團當中有一個杞國，國主據說是夏禹王的後裔，原來封在中原，就是現在河南省杞縣的地方，後來又遷到東方，大約在如今山東省的東部安丘縣左近。淮夷欺它弱小，不時前去騷擾，齊桓公雖然已到晚年，不大喜歡好事了，祇是杞國近在眼前，如果坐視不救，總是顏面上太覺難堪。正好同時王朝和戎人之間的情勢正在緊張，於是邀集了宋、陳、魯、衛、鄭、許、曹等國的君主，大會於鹹地，一半也就是協議援救杞國。對淮夷進攻是談不到了，各國祇是在原來都城以西不遠一個叫做緣陵的地方共同替

把國修築起來城池，遷都過去。大概是齊國方面對於這事表現的很爲冷淡，其他國家也自然是無精打彩，大家都是潦草塞責的態度，結果城也沒有鑿牢，池也沒有掘深，其他設備也都不完全，就各自散去了。

桓公四十二年

又過了一年，那是齊桓公的第四十一年，管仲就去世了。齊桓公的霸業本來就已經顯示了衰敗的樣子，如今又喪失了他這真正的導演人，就如同一個人丟掉了靈魂，再也不能有所作爲了。就在管仲去世的那一年的春天，楚國又興兵攻打徐國。徐國在如今安徽霍泗縣以北地方，是一個大部同化於諸夏的夷族國家；因爲它當時很有接近諸夏集團的傾向，所以楚國派兵去打它。這一次進兵，是楚國向東北方發展勢力的開始；淮水流域各地，差不多完全包羅在它的侵略範圍以內了。齊國雖然感覺吃力，終還不肯推諉霸主的責任；它跟着就邀請各國在如今山東省茌平縣東南方十里一個當時名叫牡丘的地方集會。應邀到會的有魯、宋、陳、衛、鄭、許、曹等七個國家，八國又舉行了一次結盟的儀式，同時協商援救徐國。當時諸夏各國彼此之間好像是意見不甚一致，所以整整過

了一個夏天，軍事方面並沒有什麼進展。楚國攻打徐國的軍隊，也似乎始終沒有撤退。到了秋天，齊國和曹國的軍隊單獨出動，進攻楚國的一個與國——厲國。厲國在如今湖北省隨縣的北邊，距離中原很遠，齊、曹兩國的遠征軍大概只是很小的一支隊伍，目的只在牽制楚國攻擊徐國的大軍。這次小規模的遠征，雖然到達的地方很是遼遠，可是似乎沒有發生效果；楚國攻打徐國的軍隊，好像並沒有因此而撤退。這次齊、曹兩國的遠征，是七月裏的事。到了十月裏，宋國大概是利用曹國出兵遠征的機會，突然進兵攻打曹國，諸夏各國的聯合陣線更呈現了顯著的裂痕。在這同時，楚軍卻急攻徐國；徐國因為過於依賴齊國的援助，沒有把局勢看得嚴重，結果被楚軍殺得大敗。齊國派往遠征厲國的軍隊，並沒有能夠得到顯著的勝利，白白地在外邊駐紮了半年的光景，落得無功而回；只是在回國的半路上，順便替徐國解了圍，楚國的軍隊算是撤了回去。總起來說，這次雙方爭奪徐國的鬥爭，齊國並沒有能夠占到什麼便宜。

信陽 X

小呂 X

X

X

自從楚國進兵攻打徐國之後，荊蠻部族和諸夏集團的衝突，就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方面。過去楚國北進，是以征服許、鄭兩國為第一目標；如今又採取東北方向的路線，沿着淮水向前，再準備沿着泗水向北推進。那時候的泗水，是一條很長的河流，從泰山的西麓往南流入淮水，大體上是沿着現在大運河的路線。楚國如今控制住淮水下游，再沿着泗水一直向北突進，就要直接侵入齊國本土了。鞏固泗水流域和經營淮水下游一帶地方，又成為齊國的新的負擔。這一帶地方正好鄰近灌夷，時常遭受這一種野蠻部族的侵擾。那時在如今山東省嶧縣的東部地方有一個鄆國，雖然是一個小國，但所占的地勢卻很險要，可以建成一個強固的據點。就在解救徐國的那一年的年底，齊侯邀請魯、宋、陳、衛、鄭、許、邢、曹等國的君主，在淮水下游的一個地方集會，商討經營東方的辦法，決定各國共同派遣丁夫修築鄆國的都城。霸主的話，各國不敢不聽，可是卻極其勉強；又加上正在年底，人人都想回家度歲，誰又甘願在這危險地帶替別的國家築城，所以越加無精打彩。恰好又趕上時疫流行，很多人受了傳染，生起病來，大家的精神更加

滅項

渙散。在某一天的夜裏，有人登在高處大聲喊叫：「齊國國內發生變亂了！」登時一唱百和，全體嘈亂起來；長官們制止不住，眼看着役夫們拋開了鐵鋤，四下散去，不消片刻，早都已無影無蹤了。鄆國的都城並沒有修築多少，就算完結。齊國對於這事，也只好眼睜睜看着，毫無辦法。只是齊侯終覺得前年援救徐國沒有能夠稱心如意，反而叫徐國吃了一場敗仗，這在霸主的面上很不好看，於是就在第二年——桓公第四十三年的春天，由齊國單獨出兵，替徐國討伐楚國的一個與國——英氏。這英氏國在如今安徽省六安縣以西地方，大概也是一個屬於異種部族的國家。齊國的軍隊居然渡過淮水，攻進楚國的勢力範圍以內。這次遠征，也總算是齊國霸業的餘暉；只是強弩之末，談不到什麼成就了。

前面說到，宋國乘了曹國派遣軍隊會同齊軍遠征厲國的機會，進兵前去襲擊，破壞諸夏各國的團結。這次在淮地大會，魯僖公親去參加；會事還未完了的時候，不知為什麼緣故，他卻暗地派遣本國軍隊襲擊項國，把它滅掉了。項國在如今河南省項城縣的地

方，也是屬於諸夏系統的一個小國。魯侯在標榜諸夏團結的會上，竟然滅掉屬於同一文化系統的國家，實在有些不成體統。齊侯在大怒之下，下令把魯侯拘留起來，後來還是僖公的夫人聲姜，也是齊國的娘家，親身去會見齊侯說情，纔把他的丈夫釋放回國。事情雖然平息，可是諸夏各國的團結，越來越現出鬆懈，同時異種部族的勢力，卻又一天強大一天。就在淮地大會以前不久，周天王又派人到齊國來，聲稱戎人又蠢動起來，洛京很受威脅，希望霸主設法援救。這位衰老的霸主沒有別的好辦法，只有仍舊徵發各國的軍隊屯紮在洛京，作為防守。齊國的霸業已是到了沒落時期的盡頭，就在這內部分離外患日亟的局勢之下，齊桓公去世了。三十多年以來轟轟烈烈的齊國霸業，在管仲死去之後已是喪失了靈魂，如今桓公又一死，索性連軀殼也沒有了。

桓公

他之前

644

年管仲卒

(四十二年)

643

年桓公卒

(四十二年)

第九章 管仲死後的齊國

從來政治上的領袖人物，大體說來，可以分爲兩個類型：一種領袖是具有特殊的聰明和才幹，對於一切事情，自己都能夠分析的清楚，判斷的正確，處理的妥當；他的左右的人只能充做他的助手，在他的指導下執行命令，聽候調遣。另一種領袖恰好相反，就一般來講，他並沒有過人的智慧和能力，甚而至於在這些方面，他還不如他的那些下屬；他必須有一個或幾個謀臣，替他籌謀畫策，決定大計，他的謀臣也可以說就是他的靈魂。他所以能夠當上領袖，只憑着對於政局的大勢有正確的認識，另外加上堅韌的意志和寬宏大量的品性，以及知人善任的本領。自然這裏所說的乃是兩個極端，事實上兩種類型的人物，都各有程度上的差異，這是不消說的。齊桓公正是屬於後一種類型的領袖人物，而管仲就是他的靈魂。桓公的一切舉措，差不多都要管仲來替他安排；也可以說，他一生的事業，都是管仲導演成功的。他的最大的長處，只是知人善任。他認識了

管仲的才能，就一心重用，把他當作師長看待，稱呼他爲「仲父」，推心置腹，言聽計從，能夠使他死心塌地替自己盡心竭力，做起一番事業出來。除此而外，桓公正有不少的缺點：他的私欲很重，虛榮心相當的強，喜歡奉承，又好女色，這都足以妨礙一個人的成功。可是他能夠認識清楚自己的短處，用理智克服情感，把正經事情全盤託付給可靠的大臣，不使受到本人私情絲毫影響，因此他的事業依然得到成功，這是桓公的過人之處。他能夠不讓他的短處妨礙他的事業。當管仲在世的時候，一切都沒有問題；等到他一死去，桓公就真像是失去了靈魂的一般，心中沒有了主宰；更加上年紀高邁，心性有些趨向虛狂，不知不覺的就把所有的短處都暴露了出來。

這位名震一世的霸主，是一個好色之徒；可巧他的三個夫人都沒有生下兒子，這更給他一個充足的理由，廣納姬妾。在他那許多姬妾當中，有六個是特別得他的寵愛，所享受的待遇，有如正式的夫人一般。而這六個「如夫人」又每人生下了一個兒子。因爲桓公沒有嫡子，所以她們個個希望着自己所生的兒子能作合法的君位繼承人。大家既然

競爭同一個目標，勢必至於演爲多角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又必然會對於國家的政治發生不良的影響。管仲當然明瞭這個問題，並且時刻掛心，想法加以解決。依照當時的慣例，每個國家的君位繼承發生問題的時候，執政的人往往是把自己心目中的繼承人預先託付給一個或幾個同盟的國家，準備將來能夠得到它們的支持。這主要受託付的國家，多半是那預定繼承人的外祖家，爲的是有血緣的關係，必定肯給出力，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些。在桓公的那六個兒子當中，一個名字叫昭的比較起來最好，管仲希望立他爲繼承人。桓公雖然也表示同意，只是他對於那幾位如夫人不能分出輕重厚薄，因而一時不便作明白的決定。同時那公子昭的生母，娘家是鄭國，而鄭國對齊國的態度又是始終曖昧，所以齊國方面就不能把公子昭託付給他。管仲爲了這事，也很掛慮。在葵丘之會的那一年的春天，宋桓公死了，臨終之前，他的太子曾極力請求把君位繼承權讓給一個賢能的庶兄；因爲那位庶兄堅辭不肯，倒底是太子繼承了君位，就是那有名的宋襄公了。管仲先就聽說這段事由，對於這位能夠讓國的君主頗有好感。更加上宋國自從齊桓公稱

霸以來，始終是謁誠追隨，齊國召集的盟會，每次都有他參加，要算是諸夏集團當中的一個忠實分子，這一個事實尤其加重管仲對宋國的信任。到了葵丘的會上，宋襄公本人出席，又給了管仲和齊桓公一個極好的印象。管仲就向齊桓公建議，決定把公子昭託付給他，襄公當時也就滿口答應。本來經過這次的決定，齊國的繼承問題應該算是已經解決了，可是那幾位如夫人仍然不肯甘心，她們看透桓公是年老無剛，雖說繼承的人已經決定，卻不是完全沒有更改的可能。他們利用桓公的這個弱點，一方面在他耳邊不斷的絮絮叨叨，替各人的親生兒子說話；另一方面就設法聯結桓公的左右親信，各自培植勢力。她們彼此之間的鉤心鬥角，形成齊國政治上的暗潮。

在這種暗鬥當中，有兩個重要的角色，是要特別提到的：一個是齊侯宮中的一個宦官，名字叫鬻，有的古書上也稱爲鬻，多年以來在桓公左右伺候；因爲他爲人伶俐，最善於察言觀色，先意承旨，所以極得桓公的寵幸，要算是桓公左右第一個紅人。另外一個名喚易牙，是一個出色的廚師，做得一手好菜，舉世無雙，同時又是桓公一位如夫

人衛共姬的私人。那衛共姬爲了替兒子培植勢力，知道桓公日常也很注重口腹的享受，於是就託賢刁把易牙推薦給桓公。桓公嘗了易牙所烹調的菜，十分可口，大爲高興；易牙因此也就很快的得到桓公的寵幸，與賢刁一同成爲宮中的驕子。這兩人既然和衛共姬扯到一起，自然要替她的兒子幫忙。衛共姬的兒子，就是從前衛國被狄人覆滅的時候，帶兵前往救援的那個公子無虧；賢刁、易牙二人在桓公面前極力稱贊他的賢能，勸桓公廢了公子昭，改立他爲太子。衛共姬個人方面的努力，更不消說。桓公正是年老昏聩，當不住他們內外夾攻，結果竟私下答應他們的請求。只因公子昭之立爲太子，是桓公和管仲共同的定策，並曾向列國諸侯正式作過聲明；同時君位繼承人不許隨便更換，又是桓公在諸侯的大會上特別標明的守則之一，自己當然不能立法犯法。爲了這種種原因，改立公子無虧的意思，只是齊侯宮廷裏面的一宗祕密，始終沒有對外宣布。只要管仲一天在世，桓公就不會任意行動，那般佞倖小人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胡作非爲。假使桓公死在管仲之前，齊國的政局很可能是風平浪靜的下去。管仲之先桓公而死，實在是齊國的

不幸，同時也是整個諸夏文化集團的不幸。管仲平日也明知道桓公的左右圍繞着一些小
人，只因他曉得桓公的脾氣，勸他把那人驅逐，即使他答應了，也絕不會認真實行，
或者即使真的驅逐出去了，跟着又會有另一批同類的人圍攔了來的。同時管仲顯然也自
信：那些小人無論怎樣包圍桓公，也絕不會影響到他的政策，因此他也就沒有過於注意
這個問題。可是他病倒了，他自知不起，想到他死去之後齊國的政局，不由得不能擔憂。
以桓公那樣的性格，又加上有了年紀，一般小人沒了忌憚，一定要施行包圍，胡鬧起來
的。如果他們那些人起來奪取政權，齊國一定要起內亂，霸主的地位也必然隨着喪失。
到那時候，多年以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諸夏集團，勢必至於瓦解，而且很可能是重新開
始相互之間的鬥爭，四方的夷狄部族更會乘機大肆活動，紛紛向諸夏各國進攻。在這種
局勢之下，諸夏文化的前途真將不堪設想。努力了一生，理想的實現還很渺茫，考慮到
身後，本國的政局又是險象環生，我們這位老政治家真是悲哀了。有一次，桓公親自去
看望他，在病牀前，他們君臣二人很親切的談論到齊國的將來。管仲諄諄叮囑桓公，一

定襄驅逐易牙、豎刁一流的小人，桓公當時滿口答應。管仲大概也明知道桓公以後不會依照他的話做去的，可是除此以外，他確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他可算是懸着一顆憂慮的心把眼睛閉上的。

齊國的運氣彷彿真正逆轉了。就在管仲去世的那一年裏，隰明也死了；鮑叔牙大約也是先就去世，輔佐桓公興建霸業的那些得力的元老大臣，到了桓公的晚年，差不多都已不在；圍繞着那位年老氣衰的霸主的，只是一些才具平庸的人物。這種局面，自然給了那般佞倖小人以儘情活動的機會。豎刁、易牙等人極力包圍桓公，替公子無虧部置場面，自不消說得；其他幾個公子也都各自努力培植勢力，明目張膽的廣結黨羽，準備爭奪齊侯的寶座。齊國的政局真是危機四伏，當時的情景很有些和桓公當國以前的時候相似，明眼人早已料到將有極大的混亂發生。就在討伐英氏國的那一年的冬天，這位在位已經四十三年之久的霸主終於死去了。豎刁和易牙因為出入宮內，消息靈通，他們見桓公已死，且不去料理入殮的事，卻立刻發動起早已預備好了的死黨武士，乘個冷不防，襲擊

那些屬於異黨的官吏，見着的便殺。臨淄城中頓時屍橫血染，變成一個恐怖世界。易牙等人就在這恐怖的局面之下，擁立公子無虧爲君。太子昭一時來不及抵抗，連夜逃往宋國去了。其他四位公子雖然也都是措手不及，吃了眼前虧，可是他們並不甘心退讓，各人集合起來自己的私黨，分頭向公子無虧進攻。這樣一來，整個齊國陷入於混亂之中，臨淄城更是成爲鬥爭的焦點，整天在戒嚴的狀態之下。經過兩個多月的混戰，其他四位公子倒底不會得手，敗了下去。臨淄城中暫時回復平靜，公子無虧纔得正式宣告即位。

等到那時，大家這纔想起死去的君主還未曾入殮。等到走進宮裏察看，到處是陰森森的，不見一人；桓公死去的那一座庭院的大門是緊閉着。宮門還不會打開，早看見無數臭氣冲天的蟲子從窗子門縫爬出爬進，很是怕人。再走進到屋子裏面，一眼望去，那位英雄一世的霸主仍然躺在原來的那個床上，只是屍體已是六十七天沒有人管，差不多完全腐爛，滋生了許多屍蟲，滿屋亂爬，一直爬到屋子外面來了。公子無虧只好叫人清除了屍體，把來殮入棺中，草草成禮，隨後派遣使人到國內外各方赴告。不覺殘冬過去，已是

三回
破殺

來年的初春。那時國內的武裝衝突雖然暫時中止，宋國的大軍忽又前來討戰。原來宋襄公是個很有野心的人，他早就想着模彷彿齊桓公，接着他做諸夏集團的領袖；如今桓公死去，齊國起了內亂，太子昭又是桓公和管仲當年親自託付與他的，這時正是興建霸業的一個絕好機會，不能輕輕放過。於是他就調起兵馬，只說太子昭是齊國的合法繼承人，公子無虧只是自立爲君，不能得到國際的承認，如今就由宋國出頭，率同各國的大軍討伐齊國的內亂，護送太子昭回國正位。宋襄公這次進兵，本來是名正言順，又加兵力雄厚，壓力確是不小。齊國的國力已經分散，又新經兩個多月的內戰，實力更加虧損；其他四個公子的黨羽又乘此機會向臨淄反攻；臨淄城內不肯服從新君的人，也同時活動。公子無虧再也控制不住眼前的局勢，做了僅僅三個月的齊侯，就被反對黨殺死了。那時一些大臣們就派人到宋襄公的軍前，報告齊國的人已經除去了僞君，如今迎接太子昭回去正位。齊國的君位繼承的鬥爭，到此本來可告結束；可是其他四位公子也不願意擁戴太子昭，乘他立足未定，突然對他施行攻擊；太子昭抵敵不住，又跑到宋國去了。宋襄

公二次出兵，打敗了四位公子的隊伍，眼看着太子昭卽了齊侯之位，一切布置妥當，然後收兵回國，齊國這纔算是真正安定下來。只是經過這次將近十個月的大混亂，國力虧損了許多，此後雖然依舊保持着強國的地位，但卻再也不能做諸侯的領袖了，我們可以說，齊國的霸業是與管仲個人相終始的。

管仲一手創立起來齊國的霸業，雖然齊國的霸業是隨了他個人的去世而終止了，但他所創立的「霸政」制度卻方興未艾，因應時勢，演爲一個長時期的國際政治的準則。全虧了這一種國際政治制度，諸夏各國纔得抵抗住外來的侵擾，避免了內部的分裂，諸夏的文化纔得繼續發展下去，沒有遭受野蠻部族的破壞和毀滅。我們讀史到這裏，就不能不承認管仲的功業，以及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孔子降生於管仲死後第九十四年，那時已是春秋時代的後半段了；經過一百一十年的霸政的推行，諸夏文化集團的力量，已能抵禦住夷狄的侵擾。孔子是一個具有歷史眼光的人，因此他對於管仲的功業知道珍

視，非常推崇。他說：「管仲輔佐齊桓公，使他成爲諸侯的盟主，一手扶正天下。假設當時沒有管仲，我們生在現在的人，一定都要披散了頭髮，只把左臂穿在衣袖裏，低聲下氣的遭受野蠻部族的統治了」。

管仲死後，他的家族的情形，以及他的後人在齊國政治上的地位和活動，關於這一切，史書上完全沒有記載。管氏在齊國似乎始終是個比較微小的貴族，管仲只是憑了個人的特殊才能取得了齊國的政權；依照當時社會和政治組織的慣例，他的家族的地位和勢力仍然不能夠怎樣的增進。在管仲死後一百六十七年，春秋左氏傳上記載着楚國的白公勝殺死了齊國的管修。據後人註解，管修是管仲的後人。這種說法是否確有根據，我們無從知道。反正管修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我們現在說，管仲死後，他的氏族無聲無臭，那總是不會錯的。

管仲



110

第十章 管仲死後的霸政

管仲去世的時候，齊國已經呈現出來虛弱的樣子，不過霸主招牌還沒有倒；等到桓公一死，諸子爭立，內闕一場，對外又吃了敗仗，原來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就真個喪失了。宋襄公倒是很有心接着負起領袖的責任，只是他心有餘而力不足；宋國的天然和人事的條件既不怎樣優越，襄公個人的才幹也着實不夠。他的手段很不高明，又加上那一種迂闊妄誕的性格，對於現實的情勢全不明瞭，而且是不肯明瞭，只憑着個人的幻想一意孤行；他全想不到創建霸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妄想霸主的資格可以唾手而得。他邀請諸侯集會，赴會的卻沒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國家。屬於諸夏系統的許多國家，在齊桓公死去之後，都害怕楚國的壓迫，不敢採取敵對的態度，這也是它們不肯依從宋國的一個原因。宋襄公異想天開，竟請求楚成王幫他邀集各國諸侯，一定要過一過盟主的癮。楚成王假意應允，邀了鄭、陳、蔡、許、曹幾國的君主在宋國境內一個名叫孟的地方和

宋襄公相會。宋襄公爲了表示霸主的風度，並不率領軍隊，只是帶了少數的從人前去赴會。那裏知道信義原不是這樣講法，那楚成王早已布下了天羅地網，只等襄公一到，就把他捉了，並發動大兵前去攻打宋國。後來還是魯僖公出來向楚王求情，宋襄公纔得釋放回國，算是討了一個絕大的沒趣。可是他的迷夢仍然不醒，過了沒有好久，他又因爲鄭國對楚親善，號召起來衛、許、滕幾個國家發兵前往討伐。楚王帶領大軍來救鄭國，這一次諸夏聯軍又和楚國對起陣來。宋襄公一心要表演霸主的脚色，雖然吃過一回虧，卻依然如故，口口聲聲是仁義道德，霸主的軍隊是要「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能施用詐謀，不能對敵人斬盡殺絕，一些迂闊的理論。全不想想，迎面的敵手正是一個凶狠狡猾、完全不講信義的蠻族酋長。像這樣雙方對壘的結果，不消說，是狡猾的一方占了上風。宋軍整個崩潰，襄公本人也受了重傷，只落得身敗名裂，傳爲笑柄。

就在這個時期，楚國的勢力越發膨脹起來。齊桓公去世的第二年，鄭國就歸附了楚國，鄭文公親自跑到楚成王那裏去朝參。過了四年之後，他看到宋國絕對不是楚國的對

手，諸夏集團當中，一時不會再有真正的霸主出來，爲了表示恭順，又親自去到楚國。宋襄公就是爲了這事與兵前往討伐，卻又被楚國的救兵所敗。楚成王收服了鄭國，擊敗了宋國之後，又藉口陳國對宋國親近，派兵前去攻打；陳國那敢抵敵，立即屈服了。楚國除奪取了陳國的一塊土地而外，又替陳國的一個懷有敵意的鄰國——頓國——修築城池，用來威脅陳國。到了這時，楚國北進的據點越來越向北推移，它已經能夠確實控制淮水流域，再進一步，就是泗水和濟水流域了。宋國正處在這兩個河的中間，自然首當其衝。那時宋襄公已經因傷致死，他的兒子成公爲情勢所迫，顧不得什麼殺父的仇恨，老遠跑到楚國朝見楚王，表示順隨。從宋國再往北，比較大的國家就是魯國了。魯國對齊國一向是保持着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度。偏偏齊孝公——就是前面說的那個太子昭——又是個沒有腦筋的人，卽位之後，不但沒想法恢復他老子的事業，設法團結諸夏各國，反而怨嫌魯國和衛、莒兩國親善，接連出兵加以攻擊，結果逼得魯國也跑到楚國旗幟之下。那曾被恭維爲懲罰荆蠻的英雄魯僖公，竟派遣大臣前往楚國，請求成王出兵伐齊。

楚國便乘這機會，率領楚、魯兩國聯軍攻入齊國境內，占領了齊國西南邊界上的穀城，卻把當初也曾參加齊國君位繼承鬥爭的一個公子雍安置在那裏，由原來公子無虧的死黨易牙輔佐着，更留下一員楚國的將官帶了一支軍隊駐屯在那裏；這樣算是替齊國製造了一塊心病，同時也是為楚國繼續北進的棋勢布上了一個遠子。就在那時，衛國又和楚國結為姻親，無形中也成為楚國的與國；這樣一來，楚國的勢力就伸展到大河的北岸，簡直和狄人的勢力銜接起來；諸夏集團當中的重要國家，大半都已處在它的控制之下了。

南方的楚國這樣的猖獗，北面的狄人也十分猖狂。當宋襄公討伐齊國內亂的時候，他們竟然前往赴救，很顯然是想混水摸魚。在那同一年的冬天，他們又進攻衛國。這一次最值得注意的，乃是邢國竟然和狄人聯合起來，採取一致行動。前面說過，邢國受狄人侵擾，被逼不過，由別的許多國家幫助，把首都從現在河北邢台遷到山東聊城左近，暫時得以苟安，算起來是和狄人有很大的仇怨的；如今卻反轉過來，聯結起仇人，攻擊

另外一個同樣飽受過狄人蹂躪的諸夏國家，真可說是毫無心肝。過了一年，衛國就與兵糧怨，去攻打邢國。那位同樣沒有心肝的齊孝公竟自出面和狄人結盟，計議怎樣援救邢國。狄人就藉口替邢國報復，出兵伐衛。可是異族的交情究竟是不甚可靠，過了沒有幾年，邢國倒底被衛國滅掉了。

從邢、衛兩國的互相攻擊上面看來，當時沒有了霸主的諸夏集團是怎樣的渙散。諸夏的侯國聯結狄人也鬆散了，周天王也竟自做出同樣糊塗的事情。原來那時鄭、衛兩國正在爭取滑國，襄王出而調解，卻碰了鄭文公一個釘子。他一怒之下，就派人去挑動狄人攻打鄭國；隨後又爲了狄人替他出了氣，心中感激，索性娶了狄人會長的女兒做了王后。前面說過，襄王的弟弟甘公帶因爲爭奪王位沒有成功，逃往齊國，後來襄王終於把他召回朝去。王后不知禮義，和他私通，被襄王知曉，把來廢掉，打入冷宮。甘公帶於是就和狄人勾結起來，攻擊襄王。襄王被殺得大敗，逃往鄭國，大臣們死難的很多。王子帶又暫時做了天王。那時一般諸侯彼此既不團結，又正在戰戰兢兢的注意着楚國的動

向，對於天王的遭難，竟個個袖手旁觀，諸夏列國真成了一盤散沙，大有被夷狄部族各個擊破的可能。局勢險惡達到空前的程度，時代的要求，仍然是要有一個霸主出來。

文公

總算是諸夏文化不應該滅絕，就在這極端危險的當口，出來了一個新的霸主，這就是那有名的晉文公。晉國在汾水流域，現在山西省的西南部地方，是周室同宗的一個國家。因為國境鄰近的都是些狄人的部落，多年以來經過鬥爭的磨鍊，國力很是充實；只是因當時國際政治的重心偏在東方，距離遠些，所以很少有參與活動的機會。晉文公原是個庶生的公子，爲了國內政局不定，躲到國外，走遍了列國，親身會過齊桓公、宋襄公和楚成王，對於當時的國際情勢與人物有深刻的瞭解，等到回國即位之後，就打定主意，在諸夏集團當中重新建立霸權，繼續齊桓公和晉仲的事業。那時周天王被甘公帶逼走，困在鄭國，沒有人理；文公於是出兵討伐甘公帶，將他捉着殺了，跟着就迎接天王回朝正位，自己親身跑去朝參。他這一出馬，就是「尊王」的節目，做的很漂亮。這個

節目過去之後，接着應當是「攘夷」了。那時恰好來了一個機會，原來宋成公隨順了楚國之後，倒底心中不甘；他看到晉文公的勢力很大，大有繼做霸主的可能，就又和他拉攏。楚成王就藉了這個理由，出動了大兵，同時調起鄭、許、陳、蔡等國軍隊，進攻宋國。諸夏系統的國家，如今竟集合在異族國家的旗幟之下來攻打一個同屬諸夏系統的國家，真是可憐！宋國當然抵抗不住這樣的攻擊，派人到晉國那裏求救。晉文公雖然有心爭取霸權，可是感覺到實力不夠雄厚，單獨出馬決鬥，沒有多大把握。那時北方比較強大一些的國家，東方只有齊國，再就是西方的秦國。恰好當時齊國失掉穀城，已經感到楚國的威脅，秦國又正在極力向外發展，剛剛和楚國發生過衝突，於是晉國就運用外交手段，把齊、秦兩國拉到自己一邊，這纔出動大軍，向楚國挑戰。楚國也帶同陳、蔡等國的軍隊迎上前來。雙方的隊伍在如今山東省濮縣境內當時叫做城濮的一個地方相遇，發生正面的決戰——這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城濮之戰。交戰的結果，楚國被殺得大敗，收兵回國去了。晉國大獲全勝，威震中原，以前歸附楚國的那些國家，立刻一個個掉轉

頭來向晉國表示恭順，其他諸夏各國更不必說，自然都來追隨。晉文公親自朝見襄王，獻上得來的楚國俘虜和戰利品；襄王也照從前給齊桓公的待遇，指派重臣，正式把「侯伯」的榮銜賜與了他。接着就由王室的重臣出頭召集一個大會，由晉文公主盟，晉國就此做了真正的盟主。

晉文公在位沒有幾年便死去了，可是晉國的霸權卻長久的保持下去。原來春秋時代的霸政，自然是齊國開創起來的；不過真正推行霸政的主體，卻是晉國。齊桓公雖然做了一世的霸主，對於諸夏集團的內部有什麼貢獻，這姑且不談，單就對付夷狄部族方面來說，除了一次遠征山戎而外，並不會有過很顯赫的武功。可是事實上諸夏集團必須在武力上面確保優勢，然後纔會抵制得住野蠻部族的侵擾。城濮之戰乃是諸夏和楚國雙方真正的實力拚鬥，楚國自從發動北進以來，在軍事上這還是第一次吃虧，而且是吃了大虧；經過這一次失利以後，它的鋒頭纔算是折了，對於諸夏集團不敢像從前那樣一味的輕視，北進的氣勢也就暫時低落了些。晉國在文公以前，雖然時常和鄰近的狄人發生衝

突，可是除了自力圖強、隨時抵抗而外，始終沒有產生諸夏各國互相團結起來、保衛文化、對抗野蠻部族的意識，反而採取了純粹自私的侵略政策，不分夷狄部族或是諸夏國家，只要有機可乘，就加以攻擊和吞併。單是同宗的國家就被它滅掉了不少。到了文公建霸之後，晉國就完全改變政策，絕對不再侵吞諸夏國家，同時對於狄人盤據地帶，則不斷的攻略。有的時候是憑着兵力向前推進，有的時候就利用狄人內部的不和，設法招降，有的時候也運用懷柔的手段同他們講究親善。這種種的策略相繼並用的結果，極爲成功；狄人的活動的範圍逐漸縮小，生活方式也逐漸和諸夏的人同化。到了春秋時代的末葉，差不多整個山西高原都歸入諸夏文化範圍之內；以前的遊牧地帶，如今到處都開墾了農田，建築起來城郭和村落。晉國的疆土膨脹了多少倍，國力也跟着大大的增強，在諸夏各國中，它保有絕對的優勢，因此它的霸主地位始終是穩固的。能夠同它對抗的，只有南方的楚國。楚國早已發展成爲一個大國，實力雄厚，雖然一時失利，卻並沒有放棄北進的野心。從那時起，一直到春秋時代的末葉，前後一百年的長時期裏，整個

國際政治舞台上形成晉、楚兩大國對立的局勢，雙方常常發生正面的衝突，互有勝負，勢力也隨着時消時長。只是苦了夾在中間的一般小國，左右做人難，受盡壓迫，吃盡苦頭。不過諸夏的文化倒底仗了晉國的長期的霸權得以保持下來，而且是更擴展了。

前面說到，北方狄人的活動範圍，大部分變成了農業地區。楚國最初向北蠶食，極為順利，自然對於諸夏的文化不免輕視；後來因為中原產生了霸政制度，諸夏各國團結起來，實力很是可觀，原來想要加以征服的迷夢就慢慢覺醒。由於對於諸夏的武力的認識，對於諸夏的文化也就由輕視逐漸改為重視和欣羨，最後更進而採取了接受的態度。到了後來，一般楚國人在意識上已經自認為同屬於諸夏系統了。至於那些和諸夏雜居的戎人以及東方的夷人部族，實力比較弱些，在霸主威臨之下，沒有再敢亂動，慢慢都嚮諸夏國家同化或征服。歸納起來說，在這個長時期裏，諸夏文化在空間上比起以前擴展了一倍以上。文化必須用武力來保持，這個道理在這裏得到了確實的證明，霸政就是一種團結力量、運用力量的政略，這種制度確實得到了成功。

第十一章 從春秋到戰國

晉、楚兩國相持不下，除了正面衝突之外，楚國就聯絡西北方面的秦國一同對付晉國，晉國也就極力培植長江下游新興的吳國，叫它牽制楚國；這樣一來，國際間的局勢就越趨混亂。論說起來，楚國拉攏秦國，倒也無所謂是非，而晉國一力扶持吳國，卻是很有一問題。吳國的君主雖然號稱是周天王的宗親，可是事實上那個國家不能說是屬於異族；諸夏的霸主既然標榜「攘夷」，又怎能和異族的國家聯合，幫助它發展勢力呢？話是這樣說，真正講起來，卻也沒有什麼可怪的。前面說過，到了春秋時代的後半期裏，楚國人在意識上已經漸漸自居為諸夏，而一般諸夏的國家也不再把楚國看作野蠻部族。同時晉國因為吞併了許多狄人的部落，向北面開拓疆土，晉侯的臣民當中已經加入了狄人的成分。在列國諸侯的眼裏，晉、楚只是彼此爭奪霸權的兩個強國而已，它們相互之間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區別。列國諸侯是這樣的看法，晉國自己在意識上也不知不覺的混

滅了以前的觀念，只求壓倒敵方，確保霸權，除此以外，再也不想什麼別的問題。所以說，到了春秋時代的後半期裏，諸夏文化的基礎已經極穩定，而且在空間上更是大大的擴展了。以前諸夏的人所感覺到的野蠻部族的威脅，如今已經不復存在；一般人所直接注意的，只是霸權的爭奪。換句話說，攘夷的觀念和理想，在一般人的心中已經變得淡薄；代替這個觀念的，乃是一種以國家利害為前提的、單純的對於勢力的權衡。因此當時的政治形勢另換了一種樣子。如今已經不復是諸夏文化集團聯合起來抵野蠻部族的侵擾，而是擴大了諸夏集團本身當中一些比較強大的國家的相互衝突。這個趨勢自然發展的結果，就是各國都極力加強力量，開擴疆土，為的是能夠在新的國際局勢之下站得住腳。攘夷已經談不到，尊王的口號因為失去作用，也沒有人再提。霸政制度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的使命，如今應該告退了。

自從齊桓公創霸以來，直到晉國第八代霸主平公的時候，為了保持霸權，和楚國鬥爭，也不知道發生過多少大戰事，流過多少血，殺過多少人；只苦了一般小國，飽嘗了

兩面壓迫的滋味，自然滿心希望和平。在晉國第六代霸主厲公的初年，宋國方面也會發起過一次國際和平運動；但結果只賺得三年的和平，戰事就又起來。後來傳到平公的時候，晉國保持霸權已經是將近百年，看看進入了衰老時期；同時那一向和晉國爭霸的楚國，也因為被後面的吳國拖住，連年用兵，弄得筋疲力盡，又趕上國內政局頗有困難，北進的意志不免消沉下去；那時宋國的執政向成就抓住了這個時機，舊事重提，向它們兩國呼籲和平。這一次果然成功，由宋國出名，邀請晉、楚和其他八個國家在宋國地方集會，訂立盟約；大家消除了過去的仇怨，從此不再互相侵犯，共同維持和平。經過這一次盟會，晉、楚之間長期的鬥爭算是告了結束，不過晉國的諸夏領袖資格也就從此慢慢的喪失了。

這次盟會之後，一連四十來年的長時期裏，中原的國際關係，大體上總算是維持住了和平狀態。不過這種局勢卻並不是真個靜止的性質，並不是真個就這樣停滯下去；國際之間雖然沒有什麼動靜，每個國家的內部卻都在向一個新的方向演變着。只是這種演

變的趨勢，一般人都不自覺得罷了。正是因為每個國家都忙着內部的演變，所以國際間纔能維持住相當平靜的局面。

提到各國內部的演變，須得從頭說起。原來封建時代初期裏的所謂國，只是一個城圈，另外再加上四周圍的一些田野，範圍是小的很；因此在當時諸夏文化區域以內，就能有二百來個國家。那時候一個侯國的重心，是在一個城圈裏面，侯國的君主、宮庭、政府、貴族、官吏、武士、以及工匠、商人，統統是在那裏的。爲了防禦外來的攻擊，城圈外面另行建築一道圍牆。在城圈裏面，經常儲存着多量的糧食、兵器、以及一切用具，爲的是遇到被敵人圍攻的時候，自己能夠守衛。至於四外的地方，很多極其空曠，居民很少。後來人口滋生越多，國際間的衝突也時常發生，互相吞併的結果，國家的數目越來越少，同時每個國家的領域則越來越擴大，一個國家的領域之內就會有幾個或者很多個城；除了自己原來的領域以外，其餘的就是被吞滅了的別的國家，如今卻分給了

本國的貴族作爲采邑了。除此之外，還有特爲分封貴族新建築起來的小城，據說依照當時的規定，一個侯國的首都以外其他的城，最大的不能大於首都的三分之一，小的只等於首都的九分之一。在封建制度還不會發生動搖的時候，大家一齊遵守禮法，自然沒有什麼問題；到了後來，天王失去了制裁的權威，原來的紀綱漸漸不能維持。最初是天王沒有力量干涉一般侯國，以後每個侯國的君主也漸漸不能控制着本國的貴族。管仲倡導霸政，只因看到當時的危機是野蠻部族可能毀滅了諸夏的文化，爲了防制他們的侵擾，遂須諸夏各國互相團結；爲了聯合各國，只有打出天王的旗號；爲了推崇天王，就又不能不維持原來的封建制度。所以霸政的對內部分，就是保持現狀，不容許有人破壞封建的禮法。以後晉國繼承了霸權，表面上仍然是推行原來的政策，可是實際上卻慢慢的演成了恰恰相反的趨勢。

各國的卿大夫都各自有他們的采邑，一個個加修城圈，極力培養實力，儼然成了獨立的小國。他們彼此之間也是鉤心鬥角，黨同伐異，爲了爭取政權，往往也發生武裝衝

建 改 的 冲 一 此 都 還 可 以 相 安 無 事 ； 等 到 他 們 經 過 長 期 的 互 相 兼 併 ， 只 剩 下 少 數 實 力 特 別 雄 厚 的 幾 個 貴 族 的 時 候 ， 君 主 的 地 位 就 要 不 穩 起 來 。

爽，全不把君主放在眼裏，就和一般侯國對待周天王的態度差不多。本來封建制度的精神，就是一個親族的關係，一般諸夏都是天王的子弟親戚，每個侯國的卿大夫又都是侯國的君主的子弟親戚，合算起來，所有天下各國的大小貴族，大都屬於同一個血統，彼此都有親族的關係，按說應當是可以和睦相處的。可是親族的關係究竟壓不住利害的衝突，而且世代越傳越遠，血統的關係也就越來越淺，最後自然就彼此相視如同路人了。同時因為依照封建制度的規定，侯國的政權根本並不是集中在君主的手中，而是分屬於各層貴族的，這一來就給予貴族們操持國政的機會。在一般貴族實力還不太大的時候，

齊國的政權老早就在少數貴族的手裏，多年互相兼併的結果，最強大的貴族漸漸都消滅了，最後卻給一家外來的貴族——田氏——造了機會，獨攬了大權。再說晉國，最初也是貴族專政；到了獻公的時候，因為防制內亂，下了個毒手，把所有同宗的貴族一

齊消滅掉了。並且立下誓文，此後除了預定繼承君位的嫡子之外，其他公子一概不准留在本國。從此晉國就沒有了「公族」，而政權就轉到異姓的貴族手裏去了。這異姓的貴族大都是出於歷朝的功臣，誰家能夠建立功業，誰家就執掌大權；大家爭着努力表現，所以晉國霸業能夠維持很久。不過到了後來，這些異姓的貴族也是漸漸彼此互相兼併起來，得到勝利的自然也就越加強大；他們當中每一家所擁有的實力，都太過普通的一個侯國。上面的晉侯只保留着一個虛名，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控制政權的力量。其他像魯、宋、鄭、衛等國，始終沒有脫離貴族爭權的局面，而且形勢也是越來越糟。自然發展的結果，封建制度眼着是不能再維持下去；一般國家都要從內部發生變化，如今正是醞釀時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國際間的交涉衝突反而減少了。

就在這四十來年的和平期間，晉、楚兩國都顯出衰老的樣子；尤其是晉國，因為國內幾家貴族暗鬥的厲害，對外不能有所作為，只翻了一個霸主的虛名，諸侯對它慢慢的

都離心了。齊國那時正當景公在位，就想利用時機從晉國手裏奪取霸權，於是聯合鄭、衛、魯、宋四國，結成一個新的集團，反抗晉國，並且和晉國的一部分貴族勾結，攻擊其他的幾家貴族。這樣一來，中原又陷入混戰的局面。晉國的霸權實際上已是喪失了，齊國雖然一度努力，也沒有復興起來。楚國因為內訌腐滑，差一點沒有叫吳國滅掉了。吳國有一個時期很是強盛，想要向中原發展勢力，接着晉國做霸主；可是它的後面又興起了一個越國，把它征服，楚國纔得緩過氣來。越國的根據地是在現在浙江省的北部地方，原是一個異種文化的部族，如今卻後來居上，成了當時最強盛的國家。越王勾踐滅掉吳國之後，立刻就向中原伸張勢力，號召各國諸侯齊集結盟，自己做了霸主，連晉、齊等一般大國也都對他甘拜下風。勾踐決心建立霸業，首先派遣使臣到周天王那裏去進貢，表示尊王；周天王也依照以往的成例，給他加上「侯伯」的名銜；於是他真就成了合法的霸主。其實到了那時，周天王在一般諸侯的眼裏，更比以前減少了尊嚴；尤其是東方的諸侯，看到越國的強盛，一個個都十分的敬畏，因而大家聯名進表，共尊勾踐為

「霸王」，在他們的心目中，勾踐就是諸侯的共主，原來的周天王如今不算數了。

越王取得霸主的資格之後，野心更大起來，決意要經營中原，統治當時整個的文化世界。只因自己的國家偏在東南，距離中原地方太遠，諸多不便，於是就遷都到如今山東南濱海一個名叫琅琊的地方。不過勾踐雖然有心統治諸夏集團，卻並不是要用武力征服各國，而是想自己完全加入諸夏集團，以純粹諸夏國家的資格來做集團的領袖。他的理想大體上還是齊、晉兩國的霸業，而不是像楚國的向北方進行侵略。可是他沒有看到管仲倡導起來的霸政的主要意義是在攘夷，如今形勢已經變遷，攘夷不再能算是一個題目，自然霸政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只因越王沒有能夠認識清楚當時的局勢，一味追慕古人，所以他經營了許多年，到底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國都仍然從北方遷回原地。等到他死了之後，國勢就又漸漸衰弱，再傳過兩代下去，反而被楚國吞併了。

越王勾踐的曇花一現，只是霸政制度的迴光返照。原來的封建制度再也不能繼續維持下去；各國內部都在醞釀劇烈的變化，國際間的形勢也同樣在逐漸改觀，整個的世界

都在蛻化。上邊雖然沒有了領導，可是各國的演變卻都奔往同一個方向。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一般人的注意力如今轉到另外的問題上面，許多觀念也和以前不同了。誰是諸夏，誰又是夷狄，已經沒有人再提；什麼禮法，什麼信義，也沒有人再講究和尊重，實力是一切，超越一切，決定一切。在過去的時代裏，無論如何，大家總還戴着一副主持公道的假面具，有的時候也還不好意思胡來；可是在這新時代裏，連這副假面具也都被拋棄了。每個國家只有依賴自己的力量，同時也各自儘力奔赴自私的目的。因為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所以每個國家都是努力圖強，充實國力；因為各國都是一味自私，設法損人利己，所以國際間的衝突無法避免，而且是越來越加厲害。那些小國，以前有霸主庇護，大體上還能夠過安生的日子；如今沒有了保障，只有一個跟一個的做了強國兼併的犧牲。經過幾十年的淘汰，剩下來的只有十來個國家。

不過在這同時，那稱霸多年的晉國，卻由一個國家化為三個國家；原來韓、趙、三家貴族消滅了其他貴族，接着又瓜分了晉國，各自獨立起來。楚國吞併了越國之後，

統一了整個的南方，依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宋國向東方伸展了勢力，也還不弱。西方的秦國因為地勢占的好，始終沒有受到什麼外方的影響。東方的齊國卻換了主人，那家異姓的貴族田氏篡了位，只是國號沒有更改。這兩個國家也都能保持着歷來的實力。東方的燕國因為距離國際政治中心區域很遠，不大被人注意，所以也能維持下去。燕國的南邊興起了一個中山國，是狄人建立的，大概是很受了諸夏的同化，在當時也還算是一個相當強大的國家。再就是夾在中間的魯、衛、鄭三國了，這三個國家都是典型的封建國家，一向由貴族把持政權，內部時常發生變亂；又因為地位處的不大好，很少有向外發展的機會。以前列國數目很多的時候，比較起來，它們還算是強大一點的國家，等到那些太小的國家統統消滅之後，它們也就漸漸走上同一的命運。鄭國不久就被韓國滅掉了；魯、衛兩國本來就很小，大部分領土又都被人削去，簡直不能再算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上，是絲毫不發生作用了。事實昭示的非常明白：在一個劇烈競爭的世界裏，一切都是力量的拚賽；而在這弱肉強食的局面之下，根本不容許二等以下的國家存在。

管仲

命運的抉擇是冷酷的，你如果不能強，就只有亡！



第十二章 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

只因封建制度根本就是一種鬆散的政治制度，政權是分屬於上下幾個階層的，並不集中在君主的手裏，所以上下階層之間常常會爲了爭奪權利而發生衝突。這種衝突的結果，自然削減整個國家的力量。宋、鄭、魯、衛等國所以始終沒有能夠振作起來，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晉國稱霸有一百年之久，要算是春秋時代的第一個強國，可是實際上領導政治的並不是晉侯，而是幾家貴族的協議合作。晉侯固然可以利用貴族彼此之間的衝突而擴展一些權力，但是幾家貴族的密切聯結，也常常把君主推翻。這種情勢越往後越是厲害。正因為政權不集中，所以晉國的國勢到了後來漸漸趨於衰弱，不能再和楚國爭衡。那時晉國的幾家貴族都把注意力轉移在內部，個個想法擴展自家的勢力，分別勾結，明爭暗鬥，完全不再顧到整個的晉國，晉侯只還保留着一個君主的虛名。到了後來，就連這個虛名也都保不住了。多年兼併的結果，貴族只還剩下韓、趙、魏三家，它

他們瓜分了晉國的軀體，蛻化成爲三個獨立的國家。齊國的演化情形也是一樣；不過那裏剩下來的是田氏一家，他廢掉了原來的齊侯，另行建立起一個新的齊國。這韓、趙、魏、齊四國都是新興的國家，它們的君主都是原來的封建貴族出身，他們當然知道自家的來歷，同時也自然看的清楚，封建嫡系的國家只因政權不集中，所以一個跟一個的走上潰敗的路上去；在另一方面，南方的楚國不是純粹封建制度的國家，可是國勢很強。吳國和越國也都同楚國是一樣的情形，所以能很快的強盛起來。這樣比較考慮的結果，它們感覺到改弦更張的必要。它們認識出來，要想在一個劇烈競爭的世界裏能夠立足，必須努力圖強；要想國家強盛，必須政權集中；要想集中權力，也就必須擺脫舊日的封建制度，建立適合時代的新的制度；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變法」。「變法」成爲當時各國政治上的一種潮流，不但中原幾個新興的國家是如此，就連那封建色彩比較淡薄的秦、楚兩國，也都在向同一個方向努力。變法成功或失敗、進行的猛緩、成就的大小，直接決定每個國家的盛衰或存亡。戰國時代的前期就是充滿了變法的故事，那

的確是一個富有教訓意義的時期。

其實說來，當時各國的政治社會早就在那裏開始轉變了。大部分的封建貴族漸漸的腐化，只是一味的講究享受，再也沒有什麼作爲；可是一些少數有野心的貴族卻極力的擴充勢力，爭取政權。他們在自己直接管轄的範圍以內，不再依照封建制度的辦法分封臣屬，而是畫分爲若干區域，分別派人治理。這種地方行政長官並不是世襲的，他們是受主人的直接指揮，隨時可以更調，因此他們所治理的那塊地方，並不屬於他們私人，他們只從主人那裏領到報酬，不像過去的貴族，直接向自己的佃戶徵收地租。農人繳納的租稅，如今是由地方長官轉交給上面的主人的。以前種田的人只是貴族的奴隸，與君主並不發生直接的關係，如今他們成爲自由人了。而且因爲那時的戰術漸漸改變，軍隊的主力不再是貴族武士們駕駛的兵車，而是徒步的兵丁，所以打起仗來他們也就成爲軍隊的主體。這是春秋時代末年的一般情形，尤其在齊、晉兩國是這樣的。

以後這類貴族建立起來獨立的國家，仍然採取這種辦法。這般新興的君主，對於當

時的政治形勢都很明瞭，知道國家的政權必須統一，萬萬不能分散。可是他們究竟是從封建社會當中長成的，一時還不能完全擺脫原來的制度；舊的貴族雖然漸漸淘汰盡了，新的貴族又生出來。這般新的貴族雖然不像舊日貴族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那樣的盤根錯節，卻仍然擁有很大的勢力，對於君主多少總是有些威脅。爲了抵制他們，君主需要輔助的力量，因而就和平民階級聯絡起來。那時的農人是漸漸自由了，同時因爲工商業漸漸發達的緣故，這方面的人也代表着一部分勢力。還有那些舊日貴族的子孫，如今沒落了，只好紛紛改行，維持生活。他們當中，有的做了行政上的官吏，有的經商，有的講學，有的就憑了本人的口才或者武勇去到處投靠，做有勢力人家的清客或爪牙。所有以上這種人，都是屬於平民階級，其中很有些是極有才幹的，君主就極力提拔他們，重用他們，爲的是對抗貴族的勢力。

本來封建社會是一種金字塔的形式，從上而下，是一層層疊累起來的。貴族對於君主，也像下級貴族對於上級貴族的關係，相差只是一格，中間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距離，

事實上許多君主就是從貴族當中選升上去的。因為這個緣故，君主在貴族的眼裏並不是怎樣的尊貴，而做君主的看着貴族也就總是感覺到威脅。平民是社會的下層，對於高高在上的君主，自然存着敬畏的心，因而也就不容易生妄想；君主和他們聯絡，比較起來是可以不必有什麼顧慮的。戰國初期各國的變法，大體上就是這種意思。到了後來，各國貴族當中比較有眼光的，也都極力收攬平民階級當中的人才，用來培植自己的勢力。君主和貴族這樣爭取平民階級，結果自然是把這一階級的地位漸漸提高；平民的活動一天天的加強，影響到社會和政治的組織上面，最後終於淹滅了整個的封建制度。

晉國是春秋時代第一個強國，因為一向是幾家異姓貴族在功業上彼此競賽，所以造成了注重人才和急功進取的傳統；如今雖然分爲三國，舊日的傳統還仍然保留着。繼承晉國的三個國家當中，是魏國首先強盛起來。原來魏國獨立以後的第一個君主文侯，是一個出色的人物；他認清了時代的大勢，知道無論消極的爲了維持國家的存在，積極的

要想爭取霸權，都非重新確定立國的方略不可。當前所亟於需要的，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充實國力。國力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人力，一是物力。因此魏文侯就朝這兩個方向努力設法。他一力的求賢，尤其是平民階級當中的優秀分子，他廣為延攬，一個個量才任用，所以當時魏國的人才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

在那許多的賢才當中，要數李克的成就最大。李克這個名字，有的書上寫作李悝，原是孔子的弟子卜子夏的門徒，學問極好，可是他的思想並不和儒家相同。他認識了當時的政治趨勢，主張國家權力集中，君主直接治理全國的人民；全國的人民在法律上要受同等待遇，不再分什麼等級；換句話說，也就是「法治」。原來在封建制度之下，社會上的人是分爲許多等級的，上層的貴族和下層的庶民在法律上並不平等。用來制裁庶民的律條，並沒有什麼明文規定，一般庶民是根本無從知道的。到了春秋時代的末期，鄭國已經首先公布過刑律；不久之後，晉國也採行這種辦法。這在思想保守的人看來，雖說是革命的舉動，可是同時也證明了封建制度確確實實是在走向崩潰的路上。只是那

時的做法究竟還不徹底，只算是未來趨勢的先驅罷了。魏國是從晉國蛻化出來的，自然繼承了原來的制度；如今再經過李克這樣徹底的推進，法治的基礎於是乎就確立起來。

李克不只倡行法治，他同時也極注意增加生產。那時的主要生產自然是農業，他就極力督促農民工作，並且提倡更為精密的耕種方法。在他的督導之下，魏國的農業在當時要算首屈一指。除此之外，他更推行平定糧價的政策。因為農業是要靠天的，可是天時沒有一定，所以農田的收成也沒有準頭。歉收的年頭自不消說；遇到豐年，卻又因為供過於求，糧價又要跌落，農人仍然沒有什麼好處，李克定下一種辦法，豐年多餘的穀子統由政府收買，存在倉庫裏面；遇到荒年，就把來取出，賣給人民食用。這樣就能使糧價常常保持平穩，農人和其他的人都不會吃虧。魏文侯重用李克，採納了他的一切主張，果然魏國很快的強盛起來，開拓了許多的疆土，奠定了日後稱霸的基礎。魏國是戰國時期第一個變法成功的國家。

魏文侯任用的許多賢才當中，還有一個吳起，也是當時一個實行變法的政治家。他

曾跟孔子的大弟子曾子讀過書，在這一點上，他是同李克相似。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事天才，在魏國立過很多戰功；後來文侯去世，繼位的君主武侯有些不喜歡他，因此他就跑到楚國。楚悼王知道他是個人才，就用他執掌國政，十分信任。吳起過去在魏國多年，也是主張變法的。他對楚王說：「楚國現在所以不能振作起來，主要是由於貴族太多而且專權；他們對上威脅君主，對下欺壓庶民；長此下去，君主的地位既不穩固，一般庶民過於受苦，也不能安居樂業，結果國家自然要越來越加貧弱的」。他建議：貴族傳下三代之後，國家就把爵祿收回；楚國的領土廣大，有的是空曠地方，就把那遠支的貴族分發到這些地方去開墾，可以增加生產。所有不十分必要的官職，也一概裁撤，把節省下來的財物用來供養兵士。照這樣做，君主不但免除了威脅，同時還能夠增加糧食的生產，而且國家並不須格外增加開支，就可以訓練出來精強的隊伍了。楚悼王接受了他的建議，任他放手去做；他就改定法度，雷厲風行，整個楚國立刻緊張起來。沒有幾年的功夫，果然大見成效；虛弱了多年的楚國，忽又振起精神，接連打了幾次勝仗，領土也

擴大了許多，重新恢復舊日的威風。吳起是成功了，楚王對他當然更加信任。可是楚國那些貴族卻把他恨入骨髓，等到悼王一死，他們就乘機作起亂來。吳起到底是異鄉人，勢力孤單，抵敵不住，就被他們殺害了。他是當時變法的第一個犧牲者。不過他雖然死了，他所改定的法度似乎並沒有完全被廢除，楚國從此仍舊保持住頭等強國的地位。

吳起死去十年之後，魏武侯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惠王繼位。那時魏國的國勢已經很盛，惠王又恰好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君主，他就憑藉了上兩代遺留下來的基礎經營新的霸權。他把首都從河東的安邑遷移到東方的大梁，就是現在河南省的開封地方，占有當時國際中心的地帶，準備四面迎擊敵人，真有目空一切的氣概。事實上魏國當時也確是最強的國家。魏惠王以繼承晉國的正支自命，他首先要吞併韓、趙兩國，恢復當年晉國的規模，到了那時，魏國自然可以同當年的晉國一樣，成為列國的領袖了。他的攻勢很是猛烈，韓、兩國被他逼的無可奈何。正在這個時候，東方的齊國也強大起來，纔把魏國的氣焰壓了下去。

前面說過，原來的齊國從一開頭就有一稱尊重賢能、崇尚功業的傳統，聰明幹練的人比較容易出頭。不過那時的政治、社會究竟處於封建制度之下，能夠得上進的機會的，仍只限於貴族；至於平民，縱然有過人的本領，到底不容易提高自己的身分。等到田氏建立了新齊國的時候，封建制度已經漸趨瓦解，舊齊國遺留下來的傳統也就對於平民階級發生效用，平民當中特別能幹的人一個個活躍起來。同時那般新貴族也都向建功立業的上面努力，不肯落後。本來齊國到春秋時代的末期，已經顯露出來衰老的樣子；如今經過一次君主宗族的改換，正如衰老的軀體裏注入了新的血液一樣，培養起新的生機，因而表現了返老還童的氣象。關於戰國初期新齊國的變法情形，史書上並沒有流傳下具體的記載。不過在齊威王時候當政的那個鄒忌，顯然是平民出身，新齊國也就是那個時候強盛起來，硬敢出頭和魏國爭奪霸權，而且到後來還占了上風。它所以能有那種力量，必是鄒忌那一般人當時也有過變法的舉動，發掘出新鮮而旺盛的力量源泉。後來魏國因為處在各國的中間，四面受敵，國勢漸漸衰弱下去，齊國就成爲最強的國家。

自從魏、楚等國因為變法而強盛起來以後，當時各國的君主都認識清楚，變法確是走向富強的不二法門。那時遠在西方的秦國，多年以來閉關自守，並沒有向外發展的意圖，東方的國家也不大注意它，國際舞台上一直沒有它的戲唱。到了魏惠王遷都大梁，開始經營霸業的那一年，秦孝公繼承了秦國的君位，纔是一個重大的轉機。這位君主一登了位，就下了決心，要設法富國強兵，提高秦國的國際地位。爲了走向這個目的，自然就必須先把秦國的政治改造一番。秦國政治的封建色彩雖然比較起來不太濃厚，但是貴族階級的勢力究竟不小。這個階級自然是主張保持現狀，反對一切改革的。孝公要想變法維新，非從別的方面去找助手不可。就在這個時候，在魏國做小官的一個公孫鞅，原是衛國的沒落貴族的子弟，聽說秦孝公招賢納士，就來到了秦國。他也和吳起一樣，把那魏國創始的變法運動隨帶了去，一席話說動了秦孝公，跟着就拿到了秦國的政權。他的作風比起吳起在楚國來還要厲害。他當政之後，馬上接二連三的頒布法令，而且是

雷厲風行，絲毫沒有通融餘地。所有的政令，都是本誓三個目標：一個是集中政權，一個是增加農產，一個是充實武力。他改組了秦國的行政組織，全國的地方和人民都直接歸主君統治。他不顧貴族階級的利益，取消了舊日封建的地產制度，准許人民自由開墾土地，占為私有，為的是刺激他們努力生產。他極力提倡戰功，凡是作戰立功的人，不分貴族平民，一律重賞，按照功勞的大小給他加官晉爵。他是一個徹底主張法治的人，在法令之下，人人都是一律看待。政府公布的法令，全國上下必須一體遵守；遇有違犯的，就嚴加懲罰，並不問犯法的人是屬於那一階級。為了貫徹法令，他**不惜採取斷然的處置**，他是本着鐵面無私的精神用鋼鐵般的手腕執行嚴酷的法令。秦國經他治理了沒有幾年，果然大大強盛起來，居然能和當時第一強國的魏國對敵，而且還連打勝仗。就在同時，魏國在東面也接連吃了齊國的虧。在這樣東西夾攻之下，魏國的霸權終於完了，秦國和齊國成為東西並立的兩個頭等國家。秦孝公後來把公孫鞅封為**商君**，所以人家也他為商鞅。不過為了變法，他**不免得罪了很多人**；等到孝公一死，他的對頭就把他殺

害了。他的結果正同吳起一樣。不過他替秦國定下的種種法令，依然維持了下去；秦國的國勢因而也越來越強，最後成爲最強的國家。變法運動在秦國算是得到最大的成功。

就在商鞅替秦國變法的同時，韓國也有類似的舉動。原來韓國獨立後不久，就滅掉鄰國，把首都從汾河流域的平陽遷到那裏，也是想要在中原站住脚步，再圖發展。只是魏國已經跑在前面，一直把它壓住，始終不得翻身。魏惠王正在稱霸的時候，韓國尤其感覺威脅，幸而東方的齊國出頭和魏國爭勝，纔算少遭了些騷擾。那時正當昭侯在位，也想變法圖強，就用了一個平民出身的官吏名喚申不害的做宰相。申不害也是一個極有才幹的政治家，把韓國治理的很好。只是韓國所占的地勢實在太壞，境土以內多是些山嶺，地裏的出產很少，人民都窮，加上四鄰都是強國，所以不能有什麼大的發展。不過反過來說，韓國所處的環境那樣不利，仍然能夠維持的住，究竟是虧了申不害的本事。

還有那黃河以北的趙國，也和韓國一樣，自從獨立以來，一直是受魏國的壓迫，不得出頭。在成侯的時候，連首都邯鄲也一度被魏國的軍隊攻破了，占領了兩年，纔給退

回。東鄰是齊國，正在極盛時期；西方的秦國也剛剛變法圖強，國勢蒸蒸日上，相形之下，趙國當時只算是個二三等國家。趙國的東北方是中山國，雖然並不強大，卻也輕視趙國，乘着機會侵犯過它的邊境，兩國因此結下了仇怨。到了魏惠王的晚年，趙國出了一位英武的君主，就是那有名的趙武靈王。武靈王即位之後，國勢仍然沒有變化，和別的國家打過幾次仗，都是吃虧。他本是個極聰明的人，看到別的國家一個個變了法，跟着就強盛起來，因此他就下了變法的決心。他的變法特別着重在軍事方面。他深知道向中原方面伸張勢力，一時是不可能的，因為齊、魏等等國家都還很強；他必須先向北方發展。趙國的領土大部分是原來晉國的疆界，和狄人做鄰居。那時狄人也稱為胡人，都是些剽悍好鬥的遊牧部族；他們穿着短裝，舉動靈便，上陣騎馬，往來如飛，一邊跑着一邊射箭，真是有如生龍活虎一般。武靈王認為要想戰勝他們，非要採用他們的作戰方法不可；因此他就決定主意，命令全國的人都改變裝束，一律穿着短服，和胡人一個樣子，並且練習騎馬射箭。他的命令立刻引起全國的反感。尤其是那般貴族，本來是自

命爲文明人，一向看不起異族的，如今叫他們改穿野蠻人的衣服，自然認爲不合。可是武靈王的意志非常堅決，自己首先以身作則，改了裝束，並且強迫一般貴族大臣一律穿着胡服。大家不敢違抗，只好依從，官廷裏面立刻景象一新。正是上行下效，過了沒有多久，全國的人都換了短裝。騎馬射箭也提倡起來，沒有幾時，就訓練出無數精強的戰士。武靈王帶領了這種隊伍出去打仗，果然每戰必勝，把中山國滅掉了，向北進兵到如今綏遠省的南部，陝西省的北部也歸入趙國的版圖；北方的胡人部族，有的稱臣納貢，有的逃去遠方。趙國就這樣很快的成爲一個強國，和秦、晉等國不相上下了。

正當趙武靈王發憤圖強的時候，東方的國際局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宣王繼位，正是齊國最強的時期；那時魏國的霸業已是完了，齊國成爲東方的霸主。宣王的兒子湣王繼一登位，又利用燕國內亂的機會把燕國滅掉，只是沒有能夠吞併下去，兩國卻因此結下深仇。後來湣王又和楚國聯合，滅掉了宋國，勢力膨脹的可怕，所有的國家都感到威脅。燕國就乘此機會，由大將樂毅聯合秦、趙、魏、韓四國

一齊出兵，將齊國打的一敗塗地，幾乎亡國。以後雖然恢復失地，可是元氣已經喪失，永久失去了強國的地位。那時魏、韓兩國接連受秦國的騷擾，對於應付外侮，感覺非常吃力。楚國也顯出衰老的樣子。燕國雖然打倒了齊國的霸權，只算是一鼓作氣，因為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充足，到底不能振作起來。

就當時的國際形勢來說，秦國是最強的國家，東方只還有一個趙國和它抗衡。那時秦國統一天下的國策已經確定，接二連三的出兵攻打其他國家，戰事越來越慘烈。趙國勉強挨了幾時，終究是讓秦國占了上風。趙國既然不能支持，其他國家更加抵抗不住，結果一個跟一個的被秦國滅掉，戰國時期也就至此結束。秦國的成功，主要是由於它的變法徹底。商鞅以後，秦國的幾代君主都是本着原來的路線，極力聯結平民階級，排斥貴族，努力集中政權，推行法治，因而國力能夠不斷的增強。在其他國家方面，貴族在政治上始終占有很大的勢力，平民階級難得擡頭，政權不能充分集中，因而也就沒有法子和秦國競爭，結果就只有滅亡了。

第十二章 法家的學說和著述

從春秋時期演化到戰國時期，乃是中國歷史上極重大的一次轉變。原來的死板板的封建社會瓦解了，貴族的勢力慢慢減小，平民階級逐漸擡頭，一般人的活動比起以前來是自由多了。在政治方面，則是君主集權的國家代替了以前封建時代貴族分權的國家。歷史是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法度，因此各國都紛紛的變法，以便適應新的局勢。於是當時就有許多學者著書立說，鼓吹法治的思想。另有那班實行的政治家就到處找尋機會，求取政權，實現他們的法治主張。因此有一些人就那些實行家的言論和行事記載下來，再附會上許多性質相近的故事，攪雜上他們本人的見解，編在一起，就題名為某某政治家的著作。後來的人替這些人起個總名，叫做「法家」。屬於這一派的人物當中，論時代先後，頭一個就要數到管仲。

我們現在還能看到一部叫做「管子」的書，裏面都是些管仲的言論和關於他的許多

事蹟，大約是戰國初期齊國的人寫下的。因為那時新齊國剛剛建立，憑着一股朝氣，正在需要改變法度，加強行政組織，開發產業，充實武力，用心的人很容易聯想到舊齊國當年創建霸業的故事，因而藉管仲的名字來號召，實際上是替當時的齊國設計出來許多現實政策。那本書的內容很豐富，成為以後談論行政組織和政策的人們的第一部經典。書裏面最有名的兩句話是：「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意思是：老百姓必須吃得飽、穿的暖了，纔好治理。後來的法家都是注重開發經濟，就是本於這個道理。

其實說來，管仲當時只是在富國強兵上面着想的，他並沒有企圖改變封建制度，只是就原來的社會組織加以整理罷了。那個時代還不須要徹底的變法。真正的變法乃是整個的改革社會和政治制度，在當時也就是革除貴族階級的特殊權利和地位。像這樣的改革，直等到春秋晚期纔在鄭國初次顯露些徵兆。那時鄭國的執政大臣名叫公孫僑，也就是有名的大政治家子產。他雖然是貴族出身，可是很有歷史的眼光和開明的思想。當時

鄭國處在晉、楚兩個爭奪霸權的大國中間，外交上很難應付；內政方面又是貴族當權，經常在那裏明爭暗鬥，因此國家的局勢極爲危險。子產看清楚了這種情形，除非改變法度，是難以維持下去的。根據這種認識，他就毅然決然的改革舊法，推行新政。果然不過三年，就大著成效。他所完成的改革事業很多，最重要的是鑄造「刑書」。

前面說過，封建社會裏最重尊卑貴賤的等級差別，一個貴族和一個平民雖然犯了同樣的罪，卻並不受同樣的處分。並且政權是操在貴族的手裏，用來制裁平民的法律，並不公開；實際上也就根本沒有什麼固定的條文，貴族對於犯了過失的平民，是可以任意處置的。子產鑄造刑書，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的法令。法律條文既然公開的宣布了，自然要人人遵守，不再分別什麼尊卑貴賤。這是封建制度正式沒落的開端。因爲封建制度建築在親族的感情上面，依照親族關係的遠近而分別尊卑貴賤的等級；如今不再計較等級的差別，也就是不再顧慮親族的感情，到這時候，封建制度自然要開始發生動搖了。

不過鄭國是一個小國，它的這次改革舉動，對於整個的封建世界並沒有發生怎樣大的影響。過了二十幾年之後，晉國也鑄造「刑鼎」，把法律條文鑄在鐵鼎上面，意思也和鄭國的刑書是一個樣子。晉國是多年的霸國，這樣一來，發生的影響也就大的多。以後晉國和繼承晉國的韓、趙、魏三國，就成爲法治主義的策源地、主張變法的人的大本營。

戰國時期中幫助魏文侯首先變法的李克，曾參考當時各國的刑典，作過一部法經，是古代一部極完備的法典。那裏面有許多規定私人財產和保障個人生命的條文，都是表示封建制度的沒落和平民階級的擡頭。只是原書早已散失，現在我們只能從別的書裏找到一些傳述，知道一個大概。漢書藝文志裏面，法家部分有李子三十二篇，註明是魏文侯的宰相李克所作，似乎是法經以外的另一部書，如今也見不到了。吳起是個變法的實行家，並沒有留下什麼著作。藝文志裏面還有一部申子，也列爲法家，不知道是不是申不害的手筆，也是早已失傳了。現在我們卻還能看到一部商君書，內分二十四篇，有的

是敘事，有的是議論，又有的好像是奏稿和法令，都是關於商鞅變法的文字；當中也許有一部分是商鞅當年的記錄，大部分似乎是他以後的人假託了他來發揮的意見。

大體上說來，以上提到的那些人，都是實行的政治家，他們不見得親自著過書。至於後來的人假託他們的名義著書，也不一定是有意作偽；可能是當時的一種風氣，假託一個行事近於自己理想的名人來表達自己的主張，回來把這類的文字蒐集起來，編成一部書，就用那個名人的姓字作為書名，只是叫人一望而知書裏面所代表的見解，並不是騙人誤信那部書就是那個人著的。而且那些書中所記載的，大部分是關於治國的方略，純粹關於法治的理論很是有限。當時純粹研究法治理論的，是另外一些學者。他們看到了那班政治家的功業，認識了時代的要求，因而從理論上去研究法治問題，並且漸漸建立起法理學的基礎。他們可算是理論的法家。

大約就在戰國前期各國紛紛變法而且大著成效以後不久，趙國出了一個私家學者名

叫慎到，著書立說，鼓吹法治思想。他以為人是有知覺的，因此也就總不免有主觀的見解，也就不能沒有私意；根據自己的私意去處理事情，自然就不會十分公正的。要想對事情處理的公正，人們就只有完全放棄主觀的態度，最好是像石塊一樣的沒有知覺。譬如量長短所用的尺，稱輕重所用的秤，都是沒有知覺的，可是它們永久是正確的、公道的、可靠的，沒有人對它們的裁斷加以非議，表示懷疑。又譬如用拈鬮的方法來分派財物，因為沒有人的主觀攪雜在內，所以無論結果如何，誰也不會抱怨，只有認命而已。由此看來，為了處理事情公正，使得人人心悅誠服，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定一個沒有知覺的客觀的標準，一切行為的是非，一切事情的好壞，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裁斷，自然任何問題都沒有了。這是慎到的基本觀念。把這種觀念引用到政治上，就是法治主義。在政治上，如果專靠人來治理，賞罰全由人來決定，壞人自不必說，就是好人，也不見得一點私意都沒有，至少他的一切處置是不會使每一個人都心悅誠服，因為感覺他的處置對於自己不利的人，總是要說他有偏向的。但是如果立定一種法度，公開宣布，作為處

理一切事情的標準，規定出來，那種行爲是要受獎賞，那種行爲是要受懲罰，那就沒的抱憾了。法度的功用，正是與尺和秤是一個樣子。有了法度，就可以免去人與人之間無謂的紛爭；當政的人不必多操心，只管放任大家安分守己的去努力做自己的事，國家自然平靜，可以很快的向富強的路上邁進了。更進一步來說，一個國家立定法度之後，就不一定需要賢能的君主；只要法度定的合理，一切依了法度去做，政治自然走上軌道；君主就是平庸一些，也會把國家治理得很好的。

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體上是這樣的。他是第一個把當時那些實行變法的政治家所代表的見解從理論方面發揮出來。漢書藝文志裏面有慎子四十二篇，歸在法家，原書也早已不見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只是後人從別的書上輯起來的片斷議論；不過從那些議論上面，也可以推想到他的主要見解。

還有一個名喚尹文的，和慎到差不多是同時人，也是一個主張法治的學者。不過他的見解，卻與慎到不同。慎到主張立定沒有知覺的法度，尹文則是主張從正名着手。正

名就是確定名分，所謂「善有善名，惡有惡名」；只要替一切事情、一切行爲都起下一個適當的名字，然後再立定法律，規定出來，那種名字是受那種的裁處，這在政治上所發生的作用，也就如同用尺來量長短和用秤來稱輕重是一樣的。尹文所著的書叫「尹文子」，我們現在還能見到。漢書藝文志裏面把他列入名家，那是錯了；尹文雖然主張正名，卻並不是名家，而是真正的法理學家。

現在有兩種「尸子」書都是後人從許多書裏面輯起來的。原作者名叫尸佼，古說相傳，他是當年商鞅門下的一個學者，商鞅死後，他逃亡到蜀國去了，不知道是否確實。他的書裏面有許多關於法治的議論，因此他也算是當時的一個理論的法家。

上面說到的幾個主張法治的學者，只是在這一方面彼此意見相同；在其他方面，則是各有各的見解。因此有人認爲在春秋戰國時代所謂「九流」、「百家」當中，並沒有什麼法家，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爲當時的確沒有整個一派專一鼓吹法治主義的學者。他們乃是各有一種見解，而從他們的基本思想推論到政治上，大家都得到法治的結論，

只算是殊塗同歸。反過來說，關於政治方面的主張，大家是相合的；可是每個人的思想的淵源，卻又大大不同。論起那個時代思想派別來，所謂法家的學說，要算是比較後起的；聲勢最大的儒家、道家 and 墨家，都早已成立了很久；後來的新派思想，卻多少受了他們的影響。這些主張法治的學者，自然也不會例外的。道家主張無爲而治，一切都有個天道在那裏暗中支配；人應當是無知無慮，同傻子一樣，不必自操心，自然一切都沒有問題。慎到也是認爲人應當如同石塊似的沒有知覺，因爲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他主張治理國家要立定純粹客觀的法度，避免當政的人的主觀。有了法度，一切依照法度而行，也就是上了軌道，無須乎再加以干涉了。其實這種無爲的思想，儒家也是有的。孔子就贊美天道，贊美天道也就是主張無爲。因爲依從天道，最是妥當不過，更不須人來操心的。只是儒家認爲無爲而治有一個前提，就是「正名」；必需人人的名分都確定了，每一個人^e都守着自己的名分，然後整個社會國家纔算是走上軌道，然後君主纔能夠無爲而治。尹文的見解，顯然是受了儒家的影響，可以不必多加解釋。前面說到，最初

實行變法的李克和吳起，就都是儒家大師的弟子；就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來法家和儒家的淵源。不過儒家主張由正名來實現無爲而治，雖比道家空提出無爲的理想而沒有具體的辦法要強一些，但卻過於重視名的形式，相形之下，不免忽略了名的實質，結果就會流於祇顧虛名，不管實際，那自然是不能實現無爲而治的理想。法家提出來法治的辦法，認爲只要立定了法度，全國上下一齊奉守，一切都有軌道可以遵循，爲君主的就能夠無爲而治，這總算是比儒家要切實一點。法家主張立定法度，自然也是正名的意思；只是法家不講虛名，而是要求名實相稱，這一點卻是受的墨家學說的影響。還有墨家的「法」的觀念，也是法治思想的一個主要來源。原來最初法字的意義，只是模範；後來經墨家加以引申，成爲整齊畫一的標準，含有強制的成分，因而就和刑律發生了關係。以後鼓吹法治的學者們就接受了這一個觀念，所以他們主張立定法度，強制執行，作爲治理國家和管理人民的標準。此外法治思想的一個主要成分，就是平等的觀念，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沒有差別的待遇；這個觀念，也是墨家首倡的。儒家是主張在人

羣當中分別尊卑貴賤親疏遠近的，上層和下層階級的人在待遇上根本不能相同；譬如同樣的罪過，貴族犯了，就用禮法糾正，平民犯了，就用刑法制裁。墨家提倡「兼愛」，主張一視同仁，自然包含了人人平等的觀念在內；從這個觀念再往下推行，就是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了。由此看來，當時的法治學說，所謂「法家」，實在是儒、道、墨三家思想共同孕育出來的。法家的無爲觀念是得之於道家和儒家，他的正名主張是受儒家和墨家的影響，他的平等觀念也是從墨家的學說推衍出來的。當時一些學者從各家的思想當中尋得了一個法治的基本觀念，然後又特別加重了法度的客觀性質，因而推衍出一派新的學說。不過方纔說過，上面提到的幾個主張法治的學者，法治思想只是他們每個人的學說當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們都不能算是純粹的「法家」。比較起來專一鼓吹法治思想的要算是最後起的韓非，他是集古代法治學說之大成的一個人。

韓非是韓國的一個公子，又是儒家大師荀卿的學生，是一個貴族出身而受儒家薰陶的學者，他生在戰國的後期。韓國的國勢，始終沒有能夠十分振作，等到秦國強盛起來

之後，韓國因為和它離的最近，所以遭受侵犯也最厲害，接二連三的折兵割地，實力越來越弱，眼看離亡國不遠。韓非研究國家衰弱的原因，認為最大的弊病是政治的不合時宜，國家所尊養的人，絲毫沒有用處，而真正需用的人才，國家卻不知道培養。原來那個時候和君主有血統關係的貴族，已經不大得勢；不過另有一種士人，專會高談闊論，到處遊說，憑了伶牙俐齒，博取高官厚祿，其實並不見得個個都有本領，反而是常常播弄是非，敗壞法度。韓非看到這種情形，心裏着急，就寫成文字，痛加指摘，同時提出變法的主張，要國家加重刑罰，整頓政治，講求效率，裁汰冗官，拿出大刀闊斧的精神來推行嚴酷的法令。可是他的建議沒有被韓王採納，這使他更加憤懣。以後秦王看到他著的書，極為稱賞，就想要收用他。後來他果然到了秦國，向秦王陳說，讓韓國繼續維持獨立，是對秦國有利的。那時秦國的當政大臣李斯，本是韓非的同門弟兄，卻在秦王面前說他的壞話；秦王信以為真，就把他提了關到獄裏，但還沒有意思害他。後來李斯再下毒手，派人送去毒藥，逼他自殺了。他著的書稱為「韓非子」，現在仍可看到，不

李斯
害殺
韓非

過裏面有一大部分是後人偽作的。

韓非的法治理論是綜合了以前主張法治的學者們的見解，不過他發揮的最為透徹！同時他也另有獨到之處。他生在一個國際鬥爭極端慘烈的時代裏，他的祖國卻是一個比較弱小的國家，偏偏所占的地勢又很不利，和那最強暴的秦國是緊鄰，因而也是當時第一個被侵略的對象。那時國際間有一種人，原也是看到天下各國兵爭不息，生靈塗炭，懷着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到處宣揚仁義，反對戰爭；他們口口聲聲的贊美上古時代的政治情形，認為如果依照那個時代的方式來治理國家，就可以使人民安居樂業了。他們這般人的論調，倒也博得許多人的同情；各國的君主也就把他們看作名流學者，十分敬重。韓非卻大大以為不然，他認為人類的歷史經常是在演變之中；時代不同，環境也就跟着改變；環境既然改變了，應付的方法也應當跟着改變。因此他對於當時一般學者口口聲聲稱贊上古時代的聖君賢相，應當效法他們來治理國家的見解，表示反對。他有一個極有名的寓言，說一個人正在耕田，忽然從遠處跑來一隻野兔，不知爲了什麼緣故，

守株待兔

管仲

一七二

一頭撞到那人面前的一顆樹上，登時死了。那人平空檢到一宗便宜，非常高興，他就不再耕田，只呆坐在那顆樹的旁邊，等着再有野兔跑來撞死。韓非的意思是：想用古代治國的方法來治理當前的國家的人，都是和那農人是一樣的糊塗。原來那些主張效法古代治國的方法的學者，都是贊美古代的君主用禮義道德來感化人民；天下的人都成爲安分守己的老誠君子，政治自然就清平了。韓非卻以爲：古代的風俗醇樸，人事簡單，用德化的方法治國，倒也未爲不可；如今社會已經複雜多了，人情趨於險詐，萬萬再不能專靠禮義道德來感化，非用法律來維持不行。如今治理國家，必須認定一個原則：不要信賴人民自動的作好事，而是要使他們不敢做壞事。自動做好事的人，一個國家裏而並沒有幾個，可是如果國家立定法度，防止人民爲非作歹，就能夠治理得國家太平。舉個例來說：箭是要筆直的木桿來製造的，如果一定要找到天生筆直的木桿纔造箭，恐怕永遠造不成一根。車輪是圓形的，如果一定要找到天生圓彎的木材纔造車輪，也是永遠不會身那一天的。我們只要有了製造箭和車輪的方法與規矩，那兩件事物就能夠要多少有多

少；縱然有天生筆直的木桿和天生圓彎的木材，在木匠看來，也並不希罕的。

所謂使人民不敢作壞事，也就是替他們定下種種規矩，依照他們的行為是否合乎規矩，分別給以獎賞或加以懲罰。韓非的意思：每個人都知道計算的利害，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可以說是再親密也沒有了，但是做父母的總是重男輕女，生了男孩就高興，生了女孩，有時就忍心把來害死，可見就連至親骨肉之間，也還是冷酷的計算。執掌政權的人應當根據這種趨利避害的人情來治理人民，自然能使人人遵守法度，服從命令。君主不能依仗實行仁義來感化人民，正如同做父母的不能靠一味的慈愛來希望兒子自動的學好一樣。何況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間，並沒有骨肉的關係，那能希望人民自動的向善呢？天生良善的人雖然也有，究竟是占極少數，大多數的人是需要督責的。治理老百姓是這個道理，督察國家的官吏也是這個道理。做君主的只消立定法度，依照法度裁斷一切，應賞的賞，應罰的罰，大小官吏自然會各自盡職，政治也自然會趨於清明。

更進一步說，國家對於臣民，不但是要賞罰分明，而且應當加重分量；賞要重賞，

罰要重罰。必須如此，纔能夠得到法治的效果。實且不提，單就罰來講，如果刑罰定的輕，人就容易犯法；狡猾的人曉得冒着很小的危險而能夠取得很大的利益，他們是會甘心犯法的。如果對於很輕的過失也都加以很嚴厲的刑罰，犯法就沒有什麼好處，狡猾的人不能再存僥倖的心理，犯法的人自然就少了。刑罰的重，並不是對人民苛酷；恰恰相反，刑罰定的太輕，事實上等於引誘人民犯法，那纔是真正於人民不利呢！總而言之，治理國家必須採取嚴厲的態度，所謂法治，正是如此。實行法治，是先苦而後樂；實行德化，則是先樂而後苦。試用普通家庭來做比喻：做家長的平日對於家裏的人工作督責的很嚴，同時還限制他們的衣食費用，生活自然比較苦些；可是遇到荒年，這一家卻可不受飢寒的威脅。另外一家，平日生活的比較舒適，工作起來也不大努力；遇到年景不好，一定是要遭殃的。

以上只是就老百姓一方面來說；再就君主一方面來說，也要實行法治。所謂法治，不就是要人民守法，治理人民的人也是一樣要守法的。換句話說，替整個國家制定出固

定的法規，上上下下一齊遵守，纔是法治。主張以德化民的人，總是把君主個人看得很重，希望君主是聖明的。可是希望只是希望，誰又能保證做君主的都是聖明？那般鼓吹仁義的人，都是贊美唐虞和虞舜，唾罵夏桀和商紂，他們的認識原是不錯的。不過像堯和舜那樣的聖君，乃是上千年纔出來一個，像桀和紂那樣的暴君，也是上千年纔出來一個。這兩種人都是例外，普通還是中常的人占大多數。中常的人雖然沒有堯、舜那樣的聖明，卻也不像桀、紂那樣的昏暴；我們只消立定一種健全的法度，做君主的依照這種法度來治理國家，就會使政治清明，國泰民安。如果不制定法度，僅僅盼望堯、舜那樣的聖君出世，就必須等上千年，纔能享受一次太平的清福。從另一方面來說，像桀、紂那樣的暴君，縱然有了法規，也不能阻攔他們任意胡行，可是那也是每過上千年纔有一次。在絕大部分時期當中，中常的君主依照合理的法度來行使職權，國家總是會治理得好的。合算起來，等待聖君，必須每上千年纔有一次太平，其他時期都是紊亂的；實行法治，卻只每上千年纔有一次禍亂，其他時期都是安定的。所以實行法治比起信賴聖

君，是要把穩的多多了。

韓非主張法治，同時又極注重實效，注重功用。當時國際競爭十分劇烈的形勢，使他迫切的追求近功速效，一切的學說主張，只有那樣收實效、能生功用的纔算是真理，纔有價值。當時是一個兵爭的世界，立下戰功是受重賞的，可是政府偏偏又獎勵仁愛的行爲；耕田需要農夫，打仗需要兵士，可是政府偏偏又尊崇文弱的書生；像這樣子，不但是鼓勵了人民趨向於無用的職業，白白耗費社會的供養，而且是表示出國家根本沒有一個是非的標準，人民的意志無從集中。一個國家養着許多無用的人，人民的意志又不集中，自然是不會強盛的。國家所需要的，乃是鮮明的政策，再就是根據這種政策制定的法度，而這種法度又必須是簡單明白，使一般人都容易明瞭；所有的國民認清楚了目標，齊心努力，去奔一個方向，國家必然趨於富強。那般聰明的學者所講說的，乃是微妙的議論，高深的道理，儘管多末高明，普通的人卻不能領略。可是君主所治理的，絕大多數還是普通的人；爲了治理這般普通的人，自然是用不着那種微妙高深的理論的。

既然用不着，就是無用；既是無用，就應當拋開，應當禁止。

從上面這些議論看起來，韓非的法治主張，確是十分徹底；可是他的方法卻也十分冷酷，而在着重功用一點上，他顯然是走向極端。他是一個想要實際從政的思想家，韓國當時的政治情形，實在給他的刺激太大，使他心焦，使他冷酷，使他注重近功速效，使他主張意志集中。他的理想沒有能夠在韓國實現，可是他的同門弟兄李斯卻拿來在秦國實現了。秦國自從商鞅變法以後，早就樹下法治的傳統；就是憑了這法治的精神和制度，終於漸漸強大，吞併了六國，統一了天下。不管當時諸子、百家的學說是怎樣的精彩與妙，在政治上到頭來還是法家獨成大功。天下統一之後，情形原是變了；李斯卻把韓非的思想整個搬了出來，硬要統一思想，「別黑白而定一尊」，造成了焚書坑儒的大劫，那真是不識時務了。

話說回來，法家的思想雖然在秦朝闖了一次大禍，可是後來仍然常常擡頭。原來這一派的思想家和實行家，大都是出在國家衰危或者政治需要轉機的時代，這一派的主張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

潘公展
印維康

主編

勝利出版社印行

第三輯 學術先進	第二輯 歷代賢豪	第一輯 民族偉人
老墨孫屈司 子子武馬 遷原子子	管仲 句踐 班超 諸葛 諸亮 祖逖	黃帝 夏禹 孔子
張默張 羅根 楊杰 游國 汪辟疆	王毓賢 衛聚賢 黃文弼 祝秀俠 易君左	錢含英 張含英 黎東方
班昭 韓愈 玄奘 王守仁 徐光啓	鄭和 文天祥 岳飛 王安石 王則天	秦始皇帝 漢武帝 唐太宗
朱長俊 李長 蘇淵雷 段天燭 方豪	陳嘯江 鄧廣銘 王夢鷗 鄭鶴聲	顧頡剛 繆鳳林 羅香林
顧炎武 曾國藩 梁啟超 章炳麟 其餘書目不及備載	陳其美 林則徐 洪秀全 鄭成功 戚繼光	成吉思汗 明太祖 孫總理
譚其驤 蕭一山 吳昌裳 許壽裳	潘公展 魏應麒 羅爾綱 鄭德坤 蔣天樞	張聖奘 吳晗 羅香林

國家圖書館



003150534

重慶市圖書館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一六六六號

